新建設

第四卷 第四期

慶祝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特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陳雲
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聶榮臻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李維漢
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紀念 徐特立
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工商業政策 千家駒
怎樣學習「實踐論」 李達
「實踐論」與民政工作 謝覺哉
「實踐論」的基本精神 華崗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 郭沫若
武訓生平的介紹和批判 謝興堯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 者 舍·李付林等
共產主義原理 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一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千元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下）……蘇達里可夫（五三）

譯文

共產主義原理（上）……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五九）

新編哲學史（續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六一）

學術問答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雅可賓專政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當時對反革命分子是如何鎮壓的？後來雅可賓專政是怎樣覆滅的？（高放答）……（六五）

有人說，老子是古代中國具有唯物論概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道家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屬於唯心論的，這兩說是否矛盾？（馮友蘭答）……（六六）

批判的馬列主義貨幣理論與資本主義（名目主義與金屬主義）貨幣理論有何不同？與貨幣數量學說又有何不同？（王烈望答）……（六七）

書評

評「政治經濟學教程」……趙靖（六八）

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楊耳（七〇）

貫澈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諸基本原則……王亞南（七一）

中國人民大學「系」的工作……何戊雙（七二）

學術文摘

學術簡訊

蘇聯「哲學雜誌」刊文闡述毛澤東思想——美英兩國共產黨雜誌刊載「實踐論」譯文——泰國雜誌譯載「實踐論」全文——中國科學院編審中國科學論著叢刊——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分組討論歷史問題——蘇聯學者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蘇聯「歷史問題」雜誌討論關於蘇聯史分期問題——蘇眞理報發表專文介紹魯迅文集的俄譯本——尼古拉也夫批評吉尼荣夫的法律著作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爲紀念黨的三十週年而作

陳雲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三十年的奮鬥，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革命勝利以後又領導着國家的建設。

要考察新中國一年半以來國家建設的措施及其進展程度，首先必須明白這種建設是在什麼舊基礎上進行的？就是說，賴以建立新中國的舊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國土廣大，物產和蘊藏豐富，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有五千年歷史，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是近一百年來，我們國家處在這樣一種境況中：第一、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超過了一百年，日本帝國主義把東北侵佔了十四年。中國的封建主義和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人民的工具，人民長期處在這三者的壓迫之下。第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派的長期統治，我國經濟情況是落後的，新式工業的生產總值僅佔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左右。這個數字，雖然來自一種粗略的推算和估計，在作了更近似的推算和估計或者在比較精確的計算之後，可能有若干修正，但是新式工業的比重很小，農業和手工業的比重很大，這是確定的。僅僅說明比重，還沒有完全說明嚴重的情況，嚴重的情況在於：很少的新式工業中有很大的部份是被帝國主義控制的。東北是中國重工業的首要地區，但是那裡的工業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帝國主義依靠武裝侵略和經濟侵略，在中國直接間接地控制了許多工業。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既佔很大比重，中國又號稱農業國，照理，農業生產品應該可以自給了。但是正相反，過去我國每年有大量糧食和棉花的入口。第三、我們國家經過了二十五年的軍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以後，又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使我國經濟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一九四九年是遭受水災的年份，其農業總產量，僅達抗日戰爭以前的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四九年工業生產如與最高年份的一九四三年比較，則比農業情況還要壞。最近的十二年戰爭，又把城鄉、內外之間物資交流的商業關係，大大地破壞了。這些就是舊中國的概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在這樣一個舊基礎上進行新中國的建設。

× × ×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一年半中，所做的工作，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經濟文化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工作，重要者是下列各項：

一，自中央、省、市、縣直到鄉村，建立了統一的人民政府。

二，剿滅了成百萬潰兵土匪和國民黨的殘餘武裝，剩下的少數散匪，不久將全部肅清。

三，在四萬萬農業人口中，有二萬萬九千萬人口實行了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農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除一般少數民族地區外，明年可以全部完成土地改革。

四，在全國範圍內，鎮壓了特務、匪首、惡霸等反革命份子，逮捕了一大批，有一批被判處死刑；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些不論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國民黨統治時代，日本佔領時代都能騎在人民頭上，毒害人民，血債累累，而又在人民政府時代拒不改悔、繼續破壞的分子。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將放在勞動中加以改造。

五，自去年六月美國帝國主義進攻朝鮮、侵略我國領土台灣以來，在我國人民中掀起了偉大的愛國運動，我國人民組成了抗美援朝的志願部隊，在全國各個階層、各個地區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

在經濟方面我們進行了下列各項重要工作：

一、接收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一切工廠、礦山、鐵路、輪船、銀行，把這些企業變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國營企業。在國營企業中依靠工人羣衆，團結技師、職員，變官僚主義的企業爲人民的企業。由於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國家對於職工福利的關心，工人、技師、職員的勞動積極性大

慶祝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特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陳　雲（二）

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聶榮臻（四）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李維漢（九）

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紀念……徐特立（一二）

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工商業政策……千家駒（一三）

學習「實踐論」

怎樣學習「實踐論」……李　達（一七）

「實踐論」與民政工作……謝覺哉（二三）

「實踐論」的基本精神……華　崗（二六）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郭沫若（三二）

武訓生平的介紹和批判……謝興堯（三八）

學術討論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老舍　蔡儀　王瑤　李何林（四六）

關於「國語語法綱要」……繆一之・李　榮（五〇）

再論古代中朝關係……常元敬（七三）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下）……蘇達里可夫（五三）

譯文

共產主義原理（上）……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五九）
新編哲學史（續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六一）

學術問答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雅可賓專政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當時對反革命分子是如何鎮壓的？後來雅可賓專政是怎樣覆滅的？（高放答）……（六五）
有人說，老子是古代中國具有唯物論概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道家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屬於唯心論的，這兩說是否矛盾？（馮友蘭答）……（六六）
批判的馬列主義貨幣理論與資本主義（名目主義與金屬主義）貨幣理論有何不同？與貨幣數量學說又有何不同？（王列望答）……（六七）

書評

評「政治經濟學教程」……趙靖（六八）

學術文摘

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楊耳（七〇）
貫澈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諸基本原則……王亞南（七一）
中國人民大學「系」的工作……何戊雙（七二）

學術簡訊

蘇聯「哲學雜誌」刊文闡述毛澤東思想——美英兩國共產黨雜誌刊載「實踐論」譯文——泰國雜誌譯載「實踐論」全文——中國科學院編纂中國科學論著叢刊——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分組討論歷史問題——蘇聯學者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蘇聯「歷史問題」雜誌討論關於蘇聯史分期問題——蘇眞理報發表專文介紹魯迅文集的俄譯本——尼古拉也夫批評吉尼森夫的法律著作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爲紀念黨的三十週年而作

陳雲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三十年的奮鬥，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革命勝利以後又領導着國家的建設。

要考察新中國一年半以來國家建設的措施及其進展程度，首先必須明白這種建設是在什麼舊基礎上進行的？就是說，賴以建立新中國的舊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國土廣大，物產和蘊藏豐富，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有五千年歷史，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是近一百年來，我們國家處在這樣一種境況中：第一、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超過了一百年，日本帝國主義把東北侵佔了十四年。中國的封建主義和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人民的工具，人民長期處在這三者的壓迫之下。第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派的長期統治，我國經濟情況是落後的，新式工業的生產總值僅佔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左右。這個數字，雖然來自一種粗略的推算和估計，在作了更近似的推算和估計或者在比較精確的計算之後，可能有若干修正，但是新式工業的比重很小，農業和手工業的比重很大，這是確定的。僅僅說明比重，還沒有完全說明嚴重的情況，嚴重的情況在於：很少的新式工業中有很大的部份是被帝國主義控制的。東北是中國重工業的首要地區，但是那裡的工業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帝國主義依靠武裝侵略和經濟侵略，在中國直接間接控制了許多工業。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既佔很大比重，中國又號稱農業國，照理，農業生產品應該可以自給了。但是正相反，過去我國每年有大量糧食和棉花的入口。第三、我們國家經過了二十五年的軍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以後，又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使我國經濟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一九四九年是遭受水災的年份，其農業總產量，僅達抗日戰爭以前的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四九年工業生產如與最高年份的一九四三年比較，則比農業情況還要壞。最近的十二年戰爭，又把城鄉、內外之間物資交流的商業關係，大大地破壞了。這些就是舊中國的概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在這樣一個舊基礎上進行新中國的建設。

× × × ×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一年半中，所做的工作，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經濟文化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工作，重要者是下列各項：

一，自中央、省、市、縣直到鄉村，建立了統一的人民政府。

二，剿滅了成百萬潰兵土匪和國民黨的殘餘武裝，剩下的少數散匪，不久將全部肅清。

三，在四萬萬農業人口中，有二萬萬九千萬人口實行了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農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除一般少數民族地區外，明年可以全部完成土地改革。

四，在全國範圍內，鎮壓了特務、匪首、惡霸等反革命份子，逮捕了一大批，有一批被判處死刑；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些不論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國民黨統治時代，日本佔領時代都能騎在人民頭上，毒害人民，血債累累，而又在人民政府時代拒不改悔，繼續破壞的分子。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將放在勞動中加以改造。

五，自去年六月美國帝國主義進攻朝鮮、侵略我國領土台灣以來，在我國人民中掀起了偉大的愛國運動，我國人民組成了抗美援朝的志願部隊，在全國各個階層、各個地區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

在經濟方面我們進行了下列各項重要工作：

一、接收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一切工廠、礦山、鐵路、輪船、銀行，把這些企業變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國營企業。在國營企業中依靠工人羣衆，團結技師、職員，變官僚主義的企業爲人民的企業。由於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國家對於職工福利的關心，工人、技師、職員的勞動積極性大

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般地超過了日本和國民黨時期的標準。

二、制止了十二年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其辦法是：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管理，實行由國家銀行管理國家機關的全部現金，整頓收入，節約支出，使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由於制止了通貨膨脹，國營貿易代替了投機商人在市場上的統治地位，金融穩定，這就大大地安定了人民生活。

三、增加農業產量。由於土地制度的改革，國家實行扶持農業的政策，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提高，氣候條件一般的正常：一九五〇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比水災年份的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四。拿全國說，還未恢復戰前產量，但是大部老解放區達到了戰前產量。一九五〇年棉花產量雖然還比一九三六年中國歷史上僅有的產量最高的年份爲低，但是已經超過了戰前其他各年的年產量。只要沒有災害，今年我國棉花產量將超過一九三六年。糧棉增產對於我們國家的重要性，不但因爲我國的農業經濟比重大，而且因爲歷來依靠大量糧食棉花進口。在糧食方面，不但克服了一九四九年嚴重水災而來的困難，而且今年度已有可能爲援助鄰國印度的缺糧人民，而與印度政府訂立了五十一萬六千噸的出口合同。美國帝國主義者實行經濟封鎖，不讓我國人民以自己的生產品去交換外棉，但是我們確信無疑：我們將像處理糧食問題一樣，以自己的棉花充分供應人民的需要。糧棉自給後所節省的外匯，將大大增加我們購置工業裝備的能力。

四、促進城鄉內外物資交流。農民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在舊中國曾經是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和帝國主義實行壓價收購的對象，『豐收成災』、『穀賤傷農』，是中國農民歷來的痛苦。由於人民政府以合理價格大量收買農產品，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護。農民的副業產品，一般地不低於農民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所以副產能否脫售，是有關農民生活的大事，國家以極大力量協助農民脫售。被十二年戰爭停滯的城鄉、內外的商業聯系已經恢復了。一九五〇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總値超過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被佔以後的任何一年，而且是七十三年來的第一次出超。一八四二年來人民渴望的海關自主，已經完全實現。帝國主義者正在封鎖我國的對外貿易，但佔我國對外貿易主要比重的國家，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各國，而是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

五、恢復經濟中的國家投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未到兩年，財政情況還不可能有大量的國家投資。雖然如此，但是，無論是一九五〇年度的或是一九五一年度的國家經濟投資的總値，超過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的任何一年。我們投資的重點是鐵路、水利和重工業。大陸上的鐵路除百分之九以外都已修復通車，新的鐵路已在修築。四川人民四十年來流血奮鬥未達目的的成渝鐵路已經修通了一百三十公里。中國農民苦於水旱災荒，兩年來農田水利的國家投資和貸款的總値遠遠超過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整整二十二年用在這一方面的全部總値。重工業部門正在恢復。中央人民政府兩個年度的經濟投資，使全國人民普遍地有了一種感覺：僅僅這個政府才是爲人民服務的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領導我國人民走向幸福。

隨着國家經濟的恢復和文化的發展，學生畢業中那種『畢業就是失業』的恐慌，已不復存在。高中以上的畢業學生已經不是多餘，而是不足；大學、專科的畢業學生，遠遠低於經濟、文敎、行政部門的需要，國家可以保證每個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土地改革和農民生活改善的結果，小學和成人補習學校的數量也大大增加。美國帝國主義在僞善掩飾之下爲了侵略而在中國所辦的學校、醫院，都已由國家接管，並拒絕了美帝國主義的津貼。目前我國文化建設的工作之一，是要以一種簇新的文化建設計劃來適應國家今後經濟建設的需要。

上述各項，是新中國一年半來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概況。這些工作，對於國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它標誌着國家建設的鉅大成就。但是，所有這些還只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開始。我國人民百年來奮鬥的目標，是要把被帝國主義侮辱的中國，變爲獨立、富強的中國。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僅僅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鬥爭的一部分。這個目標的全部實現，必須變農業國爲工業國，國家必須經過一個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還未到來，目前還處在準備階段。過去一年半所做的工作，像鞏固人民政權，改革土地所有制度，恢復國家經濟，抗美援朝運動等等，在一定意義上說，統統是爲大規模國家經濟建設準備條件。準備階段還未結束，還需相當時間。但是，我們將勝利地完成準備工作，迎接大規模的國家計劃經濟建設的到來。

× × × × ×

我國人民對於經濟建設抱有無限的信心。我們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勤勞的人民，我們的國土內蘊藏着無數富源，領導我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的是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是富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大智慧的毛澤東同志。人民相信：像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一樣，也將勝利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目前我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低的。但是人民知道，其來源是由於百年來

帝國主義的侵略、長期反動統治和連續不斷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使我國經濟停滯和緩進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我國人民將繼續刻苦並加倍努力來填補這個空白。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統一，在國內再不會有戰爭了，只要我們能夠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保障世界的和平，在若干年後，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將要提上並在以後還要超過帝國主義國家。

我們國家向前發展的最後目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最美滿的社會制度，我國人民將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實現而努力奮鬥。但是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不是跳過而必須走過目前的階段——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政權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階段的經濟結構：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同時存在，而又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我國目前的階級關係和經濟關係需要而且也可能這樣處理。因此，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階段，實行國家經濟建設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就是說：必須使五種經濟發揮各自的力量，又必須不是抵觸而是服從國家制定的全國公私主要經濟部門的總計劃。毫無疑問，由於企業所有制度的不同，不協調是必然會發生的。但是兩個有利條件是存在的。首先，我們國家不僅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上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國家經濟建設的進展將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強國營經濟。因此，我們深信在經濟上將與政治上一樣，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將有充分的力量來領導其他經濟協同動作。其次，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感覺到，還將繼續感覺到，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不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國內市場之廣闊為前所未有，他們的發展機會，比之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不是減少，而是大大增加。因此，他們也擁護這個政權，並在適當的條件下能夠服從國家的經濟計劃。

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必須依靠我國人民自己的努力。這當然不是說不需要在技術和其他方面的國外協助，我們是需要這種協助的，可是這種協助，不能來自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許多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是同情我們的，但是決定他們國家政策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帝國主義分子是仇視我們的。所以中國人民知道：能夠援助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是別人，乃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新民主主義的兄弟國家。世界的兩條陣線分得很清楚，我們站在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奮鬥的一邊。我們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是這個陣線的鬥爭的一部分，國家經濟建設又是這個鬥爭的繼續。

有三十年歷史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二十八年半的奮鬥，領導我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又領導着國家建設為時已經一年半。國家經濟建設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新的工作，我們需要努力學習，但是深信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將像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一樣，勝利地建設我們的國家。中國人民為了解放自己、建設國家，在一百年中找遍了各條道路，考驗了一切領導集團，中國人民是最後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

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三十週年——

聶榮臻

「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間，經過了極端艱險、曲折和複雜的鬥爭道路，進行了英勇的勝利的抗日戰爭，最後配合盟國特別是蘇聯的對日作戰，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從這一偉大的愛國戰爭中，動員、組織與教育了廣大人民，大大地增強了人民民主的力量，為以後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強的基礎。

偉大的抗日戰爭，對於中國人民是一個嚴重的歷史考驗。戰爭不僅鍛鍊了

人民，鍛鍊了人民軍隊，並且也鍛鍊了中國共產黨。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與豐富了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關於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的經驗，在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在組織上更加壯大起來，成爲在全國人民中最有威信的卓越的領導者。中國人民根據切身的經驗，完全懂得：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一切。

（一）

抗日戰爭使中國革命中的敵、友、我的陣線及其力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改組。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死敵。抗日戰爭的八年間，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日寇的屠殺與摧毀，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無恥的侵略，却得到了美英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鼓勵。美英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一方面企圖綏和對日矛盾，使日寇成爲進攻社會主義蘇聯的東方的前哨，另一方面則支使蔣介石反動政府加緊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以便達到通過蔣介石反動政府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當時帝國主義操縱的「國際聯盟」所派遣的「李頓調查團」，就是以要求「國際共管東北」代替日本獨佔，來結束它的調查報告的。美帝國主義除「勸中國政府採取安協步調」外，並在錦州事變之後發表無恥聲明，宣稱「（一）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州合法的權利；（二）不擬過問日本解決任何事件，惟此項事件，不得破壞美國權利」。美英帝國主義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爲奸的面目，是早已暴露無遺了。

當時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軍事進攻，採取了可恥的不抵抗主義，並且宣佈「攘外必先安內」，又訓令他的軍隊說：「有言抗日者殺無赦」而集中力量繼續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紅軍進攻。

但是，嚴重的民族危機，却使中國人民日益革命化了。不但中國工人和農民羣衆，日益覺悟起來，與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鬥爭，也不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積極投入了革命的隊伍，在各大城市中開展了學生羣衆的反日示威運動；而且在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內部也發生了新的動搖分裂和衝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和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有矛盾的地方統治勢力，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或參加、或同情、或採取中立。廣大的人民羣衆都從切身的經驗中，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失望，逐漸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政權和人民革命軍隊。

（二）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和勝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組織東北游擊隊，並且提出停止內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三個條件，希望與國民黨中願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但是蔣介石反動政府却以進攻紅軍和鎮壓抗日運動來回答了這個宣言。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主力人民紅軍，以十二個月的時間，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戰勝了蔣介石的長追，突破了歷史上軍事遠征的紀錄，勝利地到達了抗日前線，與西北人民紅軍會合。這一卓絕的英雄業蹟，成爲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保存了鐵一般的中堅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擁護，並迅速成爲以北平「一二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爲開始的普及於全國各大城市的人民愛國運動的綱領，還得到一部分國民黨軍官的贊同。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抗日，就使蔣介石所指揮的「剿共」前線部隊——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和楊虎城所部西北軍，拒絕蔣介石的「剿共」亂命，而與人民紅軍聯歡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人民和士兵的支持下，逮捕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爆發，一方面說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銳化，另一方面也說明：蔣介石多年來的反動賣國政策，不僅遭到廣大人民的痛恨和唾棄，並使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發生了劇烈的分化。但是時局的危機，並未過去。當時國民黨中的反動派，正企圖以營救蔣介石爲藉口，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日寇則窺伺機會，乘虛而入。因而正確地解決「西安事變」，成爲扭轉危急局勢和舉行抗日戰爭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採取了明確堅定的方針，力主和平解決，以結束蔣介石的「安內而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實現國內和平，爭取全面抗戰。我們批判與說服了一些人們的「左傾」冒險主義，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托洛斯基匪徒擴大內戰的陰謀，從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爲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就，証明了毛澤東同志偉大的戰略預見。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中日矛盾的發展，改變了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的關係。帝國

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爲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殖民地化與獨佔中國的侵略政策，使其他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擴大了裂口，把這些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在國內，資產階級也因爲日本的侵略使他們發生了生死存亡問題，因此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不能不改變其政治態度。雖然國內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但民族矛盾逼使它降到次要的與服從的地位了。

（三）

但是，國內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仍然是貫串於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的。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不願意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不願意進行澈底的政治改革，不願意清除國民黨及其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勢力，這樣就使得當時的抗日戰爭，潛伏着失敗和中途妥協的危機。爲了克服這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中國人民和人民的武裝力量，站在鬥爭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爲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並用極大的力量，放手發動抗日的羣衆運動，組織千百萬人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主權利，使抗日戰爭不僅具備鮮明的民族的性質，並且具備深刻的人民的性質。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指出爭取民主的重要性。他說：『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爲民主即爲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爲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爲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民主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發生之後不久，毛澤東同志即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的文章，明確地指出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前途，批判國民黨不要人民起來的錯誤措施及其危險前途，要求將抗日戰爭發展爲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並且緊接着宣佈了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動員全國人民爲實現這一政治綱領，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奮鬥。（十大綱領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抗日的外交政策，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抗日的民族團結。）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恪守這一政治綱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根據這個綱領，一到達抗日的前線，就和廣大人民緊緊相結合，以連續不斷的勝利戰鬥，打擊日寇，並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開闢和創建了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爲堅持抗戰的重心。在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兩條路線下，形成了抗日戰爭中兩個迥然不同的戰場，即國民黨區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針對着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願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並將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僞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此時起，國民黨政府更明顯地開始了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對外逐漸轉移到對內。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進步組織，打入地下，並剝奪了抗戰初期所給予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監獄和集中營裡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和民主人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有名的『解散』新四軍及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餘人的事變，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內。他們對於抗日戰爭已公開採取了消極政策，保存軍事實力，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解放區，並以國民黨的精銳胡宗南部隊包圍、封鎖與進攻中國共產黨抗戰後方的陝甘寧解放區。國民黨的政府除指令其軍隊不斷向解放區軍隊進攻外，並有組織地指派其軍隊投降日本侵略者，以配合日本侵略者進攻解放區。此外，國民黨政府同日本侵略者之間，談判妥協投降的秘密信使往來，是從沒有間斷過的。這就使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解放區不能不肩負起抗戰反投降的全部重任。

（四）

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人民，是怎樣堅持對日抗戰和反對投降的鬥爭呢？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游擊隊，在北起內蒙古，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進行着積極的廣泛的對敵武裝鬥爭。經常抗擊着敵軍半數以上（多至百分之六十四）和幾乎全部的僞軍，像利刃一樣，插進敵人的心臟，成爲對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脅。但是解放區軍民的對敵鬥爭也是在極爲嚴重和殘酷的環境中進行的。佔領武漢以後，日本侵略者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就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侵略刀鋒，主要地指向解放區戰場，進行殘酷的『掃蕩』。每次掃蕩經常是十萬人左右的兵力。其『掃蕩』辦法是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敵人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在僞滿邊境及山西五台等地區更製造了長數百公里、寬數十公里的『無人區』，企圖消滅人民軍隊的生存條件。並對我解放區進行分割、封鎖、蠶食。僅華北解放區一九四四年的統計，在面

積八十三萬平方公里，八千三百餘萬人口的地區上，敵人除鐵路公路外，還修築了一萬多個據點、三萬多個碉堡、一萬多公里的封鎖溝、六百多公里的封鎖牆。在殘酷的鬥爭中再加上災荒，解放區軍民有時不能不以樹葉草根充飢。

但是日本侵略者所有這一切毒辣陰謀都失敗了。中國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强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進攻之下，依然屹立，並一天一天地發展，縮小了敵佔區，擴大了解放區，壯大了人民軍隊和人民武裝力量，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一九四五年，解放區人口達九千五百五十萬，人民軍隊發展到九十一萬，民兵發展到二百二十萬。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對敵戰鬥大小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僞軍九十六萬名，俘擄敵僞軍二十八萬名，敵僞軍投誠和反正者十萬名，敵僞軍共損失一百三十六萬餘名。

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爲什麼能取得這樣的勝利呢？這是因爲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人民戰爭的正確方針和戰略指導原則，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種政策。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連續發表了兩個輝煌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在前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戰爭經驗（這在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六年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精闢的總結），和抗日戰爭的新形勢，把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爭，由戰術範疇提高到戰略的範疇，並具體規定了游擊戰爭的戰略指導原則。毛澤東同志指出：『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國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而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强的國家所攻擊，但這大而弱的國家却處於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裡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佔地甚廣的現象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佔地甚廣，但它是個小國，兵力不足，留了許多空虛的地方，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的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它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從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等等一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的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爲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是與時代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毛澤東同志並反覆說明『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最中心的問題』。毛澤東同志預見地指出，假如敵人對於頗爲新鮮的游擊戰爭缺乏估計，『它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後來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個英明預見。在後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針對着國內一些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從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明確地提出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指出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即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階段。他指出取得勝利的條件是中國人民大聯合（這是主要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和日本國內人民及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他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嚴正地指斥了國民黨內部的妥協與腐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歷史也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這些論斷的正確。

依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全國各個解放區，在政治上實行了民主改革和民生改革，實現了全國總動員和鞏固的民族團結，造成了人民戰爭的眞正基礎。解放區普遍地經過民主選舉，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三三制政權』——地方的人民民主政府，因此鞏固了各階級的團結。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和保證交租交息的政策，因而大大地發揚了農民參加抗日戰爭和生產的積極性，並保證了農民與地主之間在抗日戰爭中可靠的團結。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生產和節約政策，組織了農民的勞動互助（變工隊、換工班等），軍隊參加生產並幫助農民生產；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負担；實行節約互助以救濟災荒，因而能夠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戰勝敵災和天災所造成的嚴重困難，支持了長期的戰爭。解放區的軍隊與人民普遍地實行了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政策，因而鞏固了軍隊與人民間的團結，並提高了軍隊的鬥志。解放區實行了動搖敵軍和瓦解與爭取僞軍的政策，向他們開展全面的政治攻勢，因而大大地動搖了敵軍的士氣，並爭取了大批僞軍的投誠與反正。而最中心的，是依靠農民的問題。殘酷的抗日戰爭，沒有廣大的農民的支持，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再一次地證明了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愈澈底，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亦將越强大越有力量』。這也証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就是農民鬥爭』。

在軍事上，全國各個解放區堅持以主力部隊、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民

兵和人民自衞隊）的相互配合，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實現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方針。這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動員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這就是人民軍隊在解放區戰場所實行的戰略戰術的出發點，由此創造了抗日的人民戰爭的全套戰略戰術。人民軍隊由於獲得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配合，得以靈活地進行內線和外線作戰，力爭戰役和戰術指揮的主動權，不斷粉碎敵人之『掃蕩』、『蠶食』，殲敵致勝。人民軍隊由於指揮統一，各個根據地得以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因而能夠抓住敵人兵力不足的弱點，粉碎敵人對某一地區的合圍『掃蕩』。人民軍隊，由於重視開闢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能夠積極地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縮小敵佔區。人民軍隊常常派遣武裝工作隊深入敵佔區活動，以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人民軍隊，由於重視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建立和發展的工作，能夠積極地幫助其教育訓練並給以必要的幹部和武器，因而能夠獲得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的密切配合，增強對敵困擾打擊的力量。同時久經戰爭鍛鍊的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又成爲人民軍隊兵員的來源，保證了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解放區的地雷戰、聯村作戰、破襲敵人交通，圍困敵人碉堡，以及平原地區的地道戰等，都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羣衆運動，使敵寸步難行，在軍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和威脅。

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另一方面的鬥爭。這就是爲反對國民黨投降、分裂、倒退逆流而進行的堅決鬥爭。這一鬥爭是非常必要的，因爲如果在存在着國內戰爭的情況下，要同強大的敵人日本侵略者作戰，是不可想像、至少是極端不利的。爲了擊敗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聯合一切抗日的力量。但是當時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這個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固的、不可靠的，因而對於國民黨必須是既有合作，又有鬥爭。鬥爭的目的，是爲了利於合作，使階級鬥爭服從於民族鬥爭，利於長期的民族革命戰爭。因而鬥爭必須是講求策略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必須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鬥爭的主要方法，就是放手發動羣衆，組織廣大羣衆，發展壯大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權，使人民羣衆根據自已親身的政治經驗，去認識國民黨當局的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這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領導權，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發動之後，就一直堅持着同國民黨的投降、分裂、倒退逆流作鬥爭，並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適時地明確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以之動員人民，有力地打退了國民黨在此後一個時期所發動的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抗日戰爭中的內戰投降危機。而蔣介石、國民黨由於它自己的倒行逆施，更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動面目，在政治上大爲孤立了。

解放區戰場的勝利，終於有力地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妥協投降陰謀，爭取了全國抗日的勝利。

（五）

當然，對於中國人民命運攸關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和蘇聯的援助分不開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國際上主持正義，唯一斥責日本侵略者的只有蘇聯。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正是美、英帝國主義大量運售戰略物資給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並驅逼國民黨政府對日議和，製造東方慕尼黑的時候。蘇聯不僅寄予中國抗戰以無限深厚的同情，且給中國人民以各方面的實際支援。蘇聯人民的『志願航空隊』，援助了中國對日作戰。多少英雄的蘇聯兒女，把鮮血灑在中國的長空。在中國八年抗戰中，蘇聯的強大軍隊始終堅守遠東邊境，牽制了日寇號稱『皇軍之花』的一百萬關東軍，這就大大的減輕中國抗戰的負担。一九四五年蘇聯擊敗德寇，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定勝利之後，爲了使中國迅速解放，立即對日宣戰，全殲日本關東軍，迫使日寇投降，幫助中國早日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在謀求民族獨立解放的長期艱苦鬥爭中深刻地知道：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中國革命沒有社會主義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已勝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說：『十月革命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人民成百年的沉睡，把他們捲入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並且說：『在中國近旁，有蘇聯生存着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促進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及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一百餘年中國革命的歷史証明：只有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只有在十月革命給中國革命作了榜樣，指出了中國人民謀求獨立解放的正確道路，使它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以後，中國革命才得到發展和勝利。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時，只有這時，中國人民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三十餘年來，蘇聯與世界無產階級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給中國人民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鼓舞了中國

革命的前進，成爲中國革命勝利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對於自己這種忠誠無私的偉大國際主義友誼。

同時，經過八年殘酷的抗日鬥爭，從苦難中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更永遠不能忘記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下的血海深仇，絕不能容忍日本侵略勢力的再起。當着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在遠東遭受了連續的失敗之後，它們就一次又一次地撕毀了他們過去所簽訂的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並正陰謀進行對日單獨媾和，重新武裝日本，企圖以日本爲基地，以日本人民爲砲灰，進一步擴大侵略亞洲的罪惡戰爭。但是美帝國主義這一陰謀，必將在中國、亞洲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致反對之下，遭受可恥的失敗。

中國人民是偉大而不可戰勝的，它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經過四年國內解放戰爭，已經在中國大陸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並在將近兩年和平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由於中國人民的勝利並與蘇聯結成鞏固的同盟，進一步地改變了世界和平民主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力量的對比。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已經變得無比強大了。這個力量足以捍衛世界和平，足以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深信任何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都一定要在這個力量面前被打得一敗塗地。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三十週年

李維漢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三十年來偉大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亦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勝利。在此長期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其中最主要的經驗之一，是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强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强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正因爲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也就一直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從自己成立的時候起，就從事於新民主主義革命亦卽人民民主革命，就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口號，並爲組織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一戰線而努力。大家知道，歷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革命戰爭時期的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都是共產黨發起的。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主要由於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强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和發展曾經遭遇過許多嚴重的困難和波折。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曾經兩次被迫參加統一戰線，又叛變出去。統一戰線中的中間力量，曾經發生過嚴重的動搖以至分裂，例如民族資產階級卽經過參加、分裂和再參加的過程。這些複雜而嚴重的鬥爭教育了廣大人民，首先教育了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在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大革命和人民解放戰爭逐漸發展到行將在全國範圍內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也卽獲得空前壯闊和空前鞏固的規模。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及其所產生的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旣完備地總結了人民大革命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又爲人民民主中國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開闢了無限光輝的前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不到兩年中，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全中國人民獲得了更加明確的方向和堅强的意志。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無論從階級關係、黨派關係和民族關係來看，亦卽是從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和力量來看，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並在繼續鞏固和發展中。隨着工人階級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的迅速提高，工人中的勞動模範正在不斷湧現，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和國家建設中的領導作用正在日益增强。今冬明春卽將完成的土地改革計劃，使數萬萬農民得以翻身並從政治上組織了起來，從而加倍地擴大與鞏固了工農聯盟，亦卽擴大與鞏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礎。隨着人民革命運動的深入和學習運動的開展，廣大知識分子的面貌也在逐步改變：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影響之下轉到人民方面來，從舊民主主義改變爲新民主主義，從反動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改變到進步的宇宙觀和方法論。進步的知識分子日漸增多，他們歡迎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樂於爲人民服務。隨着共同綱領中財政經濟政策的正確實施，舊的社會經濟的逐步改組，不但國家經濟已

經逐步地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同時民族工商業也逐步轉入健康和正常的發展。廣大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已經自覺地進入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來了，他們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積極性，都在發揚中。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共同綱領宣佈廢除民族壓迫，實行民族平等，並經過一年多的工作之後，國內解放了的各兄弟民族已經在祖國民族大家庭中團結起來了。歷史上遺留下的各民族間的隔閡、猜忌、歧視和不信任，正在逐漸消逝或減少。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正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在中央及上級人民政府領導之下按照各民族大多數人民的意志，經過他們所願意採取的形式，去管理本民族自己的事務。各民族雜居地區，則正在推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制度，按照人口比例派出代表，參加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更就國家能力所及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並普遍而大量地培養各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以便逐步地消滅由長期的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各民族間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各民族都須經過民族民主革命，在政治平等已經實現之後，各少數民族人民將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自願，逐步地進行本民族內部的民主改革。當民族形式和新民主主義內容適當地結合起來時，就將為各少數民族的發展展開寬闊光明的前途。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空前廣泛和深入的發展，最集中地表現在當前偉大的愛國主義高潮中。這個運動正在普及到每處和每人，一切社會階層和一切社會職業的大多數人民都團結在愛國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旗幟下。各種宗教信徒，一切遙遠的邊疆人民，那些從來不過問政治的人們，也逐步轉到這個旗幟之下。這運動又具有如此深刻的內容：『中國人民今天的愛國主義並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的內容，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就是保衛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實，就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就是擁護進步，反對落後，就是擁護勞動人民，就是擁護中國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國際主義聯盟，就是爭取社會主義前途。』（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經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的教育，中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更加顯得無比的鞏固和堅強。在此偉大革命運動和偉大革命團結之中，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都盡了光榮的責任。

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都曾有過不同程度的光榮奮鬥的歷史。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後，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大家又從各方面都盡了自己的努力。無疑義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都將繼續担負着光榮的歷史任務。為適應歷史任務的需要，各民主黨派已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先後決定繼續發展自己的組織，並確定以各自所聯系的社會階級與階層的中下層為主要發展對象。這無疑地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就將使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獲得必要的和一定的群衆性，從而能夠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對於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總方針，是幫助他們團結、進步和發展，並力求在人民革命運動和國家建設事業中，彼此竭誠合作，大家作出成績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總方針，同時也鞏固了各民主黨派和各民主人士之間的團結與合作。

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的革命實踐，特別是近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亦即人民民主革命的實踐，都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即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史上，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曾經充當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總結孫中山四十年革命的失敗原因時所精闢指出的：『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眞正的革命到勝利。』（『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領導者的原因，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同上）。因此，『中國革命發起者和領導者的角色，中國農民領袖的角色，應該不可避免地落到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手裡。』（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已經成為各民族人民和各民主黨派所公認的政治領袖。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獲得如此光榮的成就，首先要歸功於我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他在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創造了和領導着中國共產黨，同時也創造了和領導着中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創造了和領導着由工農紅軍發展壯大起來的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這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支柱，沒有人民解放軍，即不可能設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

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曾經經歷了各個歷史時期的嚴重考驗，每一次歷史的巨變都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對革命的科學預見，同時也證明了他對統一戰線的科學預見。毛澤東同志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看作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看作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明確地指出：沒有一個包括全

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不可能取得勝利。所以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革命戰爭後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時期）對於當時我黨領導機關內的冒險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爲冒險主義者主張打倒一切，不要統一戰線，使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同時毛澤東思想中的這個佔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必須以工農聯盟爲基礎，而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强的領導之下，才能獲得勝利的。所以毛澤東同志曾經對第一次革命戰爭後期（一九二七年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分子和抗日戰爭初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時期）的投降主義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不倚靠工農聯盟爲基礎，是放棄工人階級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以及在統一戰線中『既團結又鬥爭，鬥爭爲了團結』的原則，不久以前，又明確地指示了：『要達到鞏固統一戰線的目的，必須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我們應該善於領會和運用毛澤東同志所提供的這些輝煌的武器。

中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規模，已經發展到如此廣闊的程度，除掉反動勢力外，即將包括全體人民。中國共產黨在繼續努力增强工人階級的領導，擴大和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的時候，將用一切方法去爭取與團結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愛國分子在內的一切中間階級或中間力量。統一戰線中最容易被忽視的階層和人們，正是那些比較落後的階層和人們，但他們既是中國人民的組成分子，就不容被忽視。而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在落後的階層和人們中進行工作，必須以積極態度對待他們，並善於教育他們，引導他們前進。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內容又已發展到如此豐富的程度，它關聯到我們國家的全部工作，關聯到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活動，因此不但各級人民政府和各個民主黨派要注意統一戰線政策；要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每一個人民團體也都要注意統一戰線政策，都要進行統一戰線工作。

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所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對於懷着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共產黨人來說，還只是新的起點，還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的序言上，恩格斯曾經指出，貫澈在宣言裡的基本思想是：工人階級只有同時解放全人類，才能獲得自己的解放。中國工人階級要達到澈底解放自己的目的，首先要不斷地改造和提高本階級，以便於同時解放和改造其他各民主階級，首先是解放和改造農民階級。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的土地制，這只是農民解放的第一步。只有在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並幫助農民從個體經濟逐步地轉變爲集體經濟，即實現了工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農民才能獲得完全的解放。對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他們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或限制之下解放出來之後，應該在長期過程中，用民主方式向他們進行必要的教育和改造。特別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工人階級既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爲領導，就一定能够担當起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任務，以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氣魄來對待其他民主階級和全體人民。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劉少奇同志曾經指出：『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到了那種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要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協商並共同地加以決定。中國共產黨在將來也願意和一切願意進入社會主義的人一道，共同地進入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將不但影響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命運，並將影響東方和西方其他一切民族人民的歷史命運，中國人民的勝利進一步地改變了世界兩大陣營即帝國主義侵略陣營與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對比，鼓舞了全世界勞動人民和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鬥爭意志和勝利信心。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的聯合，就使全世界的和平獲得了最有力的保證。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渴望在和平環境中從事於偉大的國家建設工作；但中國人民知道：不能等待和平，必須去爭取和平。當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鬥爭，是保衛我們的勝利，保衛我們祖國免於侵略的鬥爭，也就是最有效地保衛世界和平民主的鬥爭。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反侵略鬥爭的旗幟下，已經結合成全體人民的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鞏固，它具備了戰勝任何敵人和克服任何困難的堅强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開幕詞。）帝國主義如果不停止它的侵略陰謀，就一定要在團結起來的中國人民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加速它自己的死滅。中國人民則將在偉大的毛澤東旗幟下，從勝利走向更偉大的勝利。

在毛澤東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一道前進！

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紀念

徐特立

我們的黨三十年來的光榮的歷史，乃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歷史；乃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取得勝利的歷史。

三十年來，我們的黨領導了中國人民，主要的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領導了全中國各個革命階級，各個民族從百年來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之下解放了出來，獲得了民族的獨立。

第二件大事，就是把全中國的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之下解放了出來，消滅了中國的封建主義。

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革命問題上，添上了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迫切需要的新的成份，帶上了東方的特點，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指導中國革命和建國的理論綱領和政策。

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是他發揚了馬克思所著的「費爾巴哈論綱」裡面的創造世界的宇宙觀，列寧所著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裡面的能動的反映論，發展成爲指導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論」的思想，在貧困落後複雜矛盾的中國環境中，創造出一套完整的如何進行中國革命的理論綱領和政策，推動了革命的前進。

例如毛澤東同志在軍事方面所發明的戰略戰術，把游擊戰術提到了戰略地位的高度，把軍事鬥爭和根據地的建設密切地結合而爲一。作戰的部隊同時也就是建設的部隊。能動的反映論和創造的宇宙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武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有了這種武器，竟在「小米加步槍」的基礎上戰勝了强大的敵人。「困難」二字，從此在中國的字典中被刪去了。

在文化技術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的人民就是把能動的反映論和創造的宇宙觀去戰勝一切困難，用革命去創造一切。

毛澤東同志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創造了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創造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權的形式。由于時代的變化的複雜性，由於東方殖民地革命的特點，階級關係的複雜性，敵我關係的變化非常之迅速，毛澤東同志把握與發揚了列寧的和資產階級關係的兩個策略的理論，發展成爲在統一戰線中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旣聯合又鬥爭的原則。這種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基本理論，不僅是中國之所必需，不僅在中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它適合于一切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包括被美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日本在內。因爲在凡是被壓迫的國家內，除了少數的民族投降主義者外，這種統一戰線，是能有廣泛羣衆基礎的。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落後的殖民地附屬國的燈塔。

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的歷史，是走着曲折複雜的道路的歷史。在這裡有眞正的馬克思主義，有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的「左」傾的敎條主義，有狹隘的經驗主義。因此，在我們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曾經經歷過許多次的錯誤和失敗的。在這裡，革命的領導者能否正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三十年來一直是正確的，而他担任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却是在遵義會議以後。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發展，毛澤東同志思想的正確，不僅已爲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公認，而且已經爲國際所公認。毛澤東的道路成爲情形類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也是國際所公認的了。

廣泛的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敎育，尤其是敎育担負建設新中國光榮責任的靑年一代，是在紀念黨的三十週年紀念當中及今後極端重要的一個任務。

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工商業政策

——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

千家駒

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工商業的方針政策與原則是基於毛主席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主席說：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的，不是後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在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動力，有時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份大資產階級的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着帝國主義與封建獨佔。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扶助私人的中小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

共產黨為什麼不但不害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呢？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而說什麼一下發展到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國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反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

但是在新民主主義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可能變成歐美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必然是社會主義的前途，這裡面也還是用毛主席自己的話來說明：

『因為既然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一般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中國革命又是處在二十世紀四十與五十年代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即處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中，處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與第二次世界革命的前夜，那麼中國革命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沒有疑義了！……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當然，不容否認，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會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權。所有這一切，便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可能性了』！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毛主席這番話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間發表的，那正是抗日戰爭最緊張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的時期，那時候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要說對中國革命的

勝利沒有信心，即對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也沒有信心，然而毛主席已指出了中國革命勝利以後，資本主義經濟會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其發展的前途卻不是舊式的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毛主席這一天才的預見，已爲中國革命偉大勝利的實踐所完全証實，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是完全依照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由此可以明白，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並不是在中共解放了大城市以後才開始的。「保護民族工商業」之所以成爲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著名講演「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所規定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正是當然的事情。毛主席說：

『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的；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的這一思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又寫進了他所著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說：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要實現經濟上的眞正的獨立，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依賴外國了，才有全部的眞正的獨立。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現在還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現代工業不過只佔全國國民經濟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具體地表現在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上，「共同綱領」第二十六條上規定：『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三十條上又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

「共同綱領」是中國共產黨的最低政治綱領，『共產黨的當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實現自己的最低綱領，這個最低綱領，既已全部爲人民的政治協商會議所接受，因此，中國共產黨擁護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爲實現它的共同綱領而奮鬥。』（劉少奇在人民政協第一屆會議上的講話。）爲了使「共同綱領」中這一保護私營經濟事業的政策具體化，也就是說，爲了使中國共產黨這一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最低綱領變成了具體的條文固定下來，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佈了一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這一條例雖然還是「暫時」性的，但已明顯地指出了中國私營企業所應該發展的正確途徑。

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有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便是如何使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獲得發展，即如何發揚它們的積極性，第二，如何使私營工商業按照新民主主義的軌道而不是按照普通資本主義的軌道發展。這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一方面爲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同時又要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

如何發揚私營工商業的積極性呢？我們知道私人經營工商業的主要目的是在取得利潤，如果在這方面不能滿足投資人的要求，那就必然會削弱他們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在私企條例上着重規定了企業盈餘的分配方法，在廿五條上規定：企業『如有盈餘，除繳納所得稅，彌補虧損外，先提百分之十以上作爲公積，以爲擴充事業及保障虧損之用。提存公積後的餘額，先分派股息，股息最高不得超過年息百分之八。公司無盈餘或有虧損時，其應發的股息，得於有盈餘的年度彌補虧損後酌情補發。經過提存公積，分派股息後的餘額得依下列各款分配：一、股東紅利及董事（或執行業務的股東）監察人經理人廠長等酬勞金（一般應不少於百分之六十）；二、改善安全衛生設備基金（工礦企業一般應不少於百分之十五）；三、職工福利基金及職工獎勵金（一般應不少於百分之十五）；四、其他。』我們知道：公積，股息，紅利三者都是歸資本家所得的。依照我們的計算，一個企業，假定資本是一千萬元，平均利潤率爲百分之十五，就是盈餘一百五十萬元，如按上述規定的分配比例計算，公積，股息，紅利三項合計爲一百二十八萬元，約合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比例不能不說是相當高的。資本主義生產所獲得的這種利潤，無疑地是工人階級辛苦勤勞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但是爲了刺激工商業家投資生產的積極性，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是容許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實行這種有限度的剝削的。在資方執行了合理的工資制度、勞動保險制度、安全衛生制度、及其他勞動法令之後，應該承認資方有權

利獲得盈餘的最大部份，作爲他們合法的利潤。毛主席說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當中國今天社會上還有大量游資脫離生產，一些人對投資生產事業還不無顧慮的時候，保障他們的合法利潤，使能把大量游資吸收到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生產事業上去，這是完全符合於人民利益的，這樣的「勞資兩利」政策，也是符合於工人階級的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

除了確實保障私人投資經營企業的合法利潤之外，爲了解除投資人的思想顧慮，條例第八條上規定：『企業的財產和營業受充分的保護，經營管理權屬於投資人』。第二條上規定：『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對公司負其責任』；前一條肯定了經營管理權屬投資人所有；後一條解除了有限責任股東負無限責任的顧慮。又第九條規定：『企業經營的業務，如應國家迫切需要，或在技術上有重要的改進或發明，而在短期內不能獲利者，得經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在一定期限內予以減稅或免稅的優待』。這就使得那些應國家迫切需要，或在技術上有重大改進或發明而在短期間不能賺錢的企業可以得到鼓勵，第二十六條上規定：『公司組織的企業如於設立登記後需要二年以上的準備始能開始營業者，在不影響該企業的財務計劃下，經中央私營企業局的核准，得以章程訂明在開始營業前酌派股息給股東。』這是用來鼓勵那些需要比較長期準備始能獲得利潤的投資事業，所有這些規定，目的祇有一個，就是要達到毛主席『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

但是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一定要按照新民主主義的軌道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軌道發展。劉副主席說過：『中國工業化的結果，如果不使中國走到社會主義去，就要使中國變爲帝國主義的國家，這是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不能允許的。』在革命過程中，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它們受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的壓迫，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即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 ，所以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因此，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時期，又可以跟在大資產階級後面，作爲反革命的助手。正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樣，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亦表現了他們進步的一面與落後的一面。即一方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是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我們要從新民主主義穩步前進到社會主義，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但另一方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又具有它先天性的盲目生產與唯利是圖的特性。此外，它在中國還帶有投機性、買辦性與封建性。我們要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成份，但是必須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首先它必須接受國家經濟的領導。「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第一條中卽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鼓勵並扶助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特製定本條例』。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私人資本不僅不能從事壟斷和投機的事業，而且應該避免資本主義的盲目競爭。因此，在私營企業條例第十一條上規定：『爲配合計劃生產，保護投資人利益，避免盲目發展，新創設的企業應依法令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營業，方得籌設』。『企業不得經營核准範圍以外的業務。』已登記創設的企業，如須變更營業範圍，亦須經主管機關的核准。這些規定的目的是什麼呢？這些規定的目的就是要避免私營企業互相盲目競爭，以造成新中國人力財力不應該有的浪費，這種規定，不僅對國家有必要，對投資人也是有好處的。條例第六條上又規定：『爲克服盲目生產，調整產銷關係，逐漸走向計劃經濟，政府得於必要時制定某些重要商品的產銷計劃，公私企業均應遵照執行』。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中央財經部門曾經召集了一系列的有公私雙方代表參加的專業會議，根據『以銷定產』的原則，製定了某些重要商品的產銷計劃，克服了去年生產中的一些困難，並改善了某些產業部門的無政府狀態，事實証明：這樣的辦法，對私營工商業是完全有利益的。

自然，加強國營經濟的領導，僅靠這種專業會議的產銷計劃是不够的，這種產銷計劃祇有當私人企業經營有困難時他們才願意執行；一旦經營條件有利時，他們就不一定願意遵守了。因此，要加強國營經濟的領導，還必須實行「共同綱領」上所規定：『國營經濟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領導。但要能够實行這樣的領導，首先必須壯大國營經濟的力量，使國營經濟佔絕對的優勢。以目前新式工業中公私關係的比重來說，在重工業中，國營經濟所佔的比重較大，約爲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甚有達百分之百者，但在輕工業中，則一般僅佔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祇有極少數（如棉紡織業）佔百分之四、五十。在這種情況下，要國營工業的比重超過私營，在最近三、五年還是不大可能。這裡，我們一方面就是要改造私營工商業，使它把過去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服務的性質轉變爲面向人民、面向農村、爲廣大的工農大衆而服務。另一方面，就是要用各種方法，使私營企業朝着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們目前所採

取的主要形式，可分爲下列三種：（一）從加工訂貨到統購統銷，自一九五〇年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以後，政府已開始有計劃地用加工訂貨方式來幫助私營企業克服困難，並加强政府對私營工業及市場價格的領導。但自去年八、九月間市場情況開始好轉後，私商對加工訂貨不很感到興趣。不過祇要政府繼續掌握着某些重要工業原料，同時國家訂貨在工業品市場上仍佔極重要地位的條件下，加工訂貨依然有擴大的可能。祇要這種加工訂貨給予私商以合理的利潤，私商是樂於接受國家的領導的。在某些工業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爲着保證軍需民用，限制暴利，穩定市場價格，政府不妨在保證私廠合理利潤的條件下，實行統購統銷。例如政府對於棉紗的統購統銷，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是國家經濟比加工訂貨又進一步的領導形式。（二）聯營，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聯營組織，是便於政府領導分散的私營企業的一個重要方式。聯營的好處很多：在資金方面，可以積少成多，便於運用；如聯購原料，易於統購統配，價格不致因搶購而暴漲，又可以減少中間剝削。且因聯合採購，品質易於鑑定，中小廠家不致因零星採購吃虧，有些原料，亦可彼此互通有無。聯合生產，可以避免盲目競爭，大家易於共同製定產銷平衡計劃，合理地分配產量。對於產品複雜，種類繁多者，可以分工合作，大量生產，生產效率，將因分工明確，相互觀摩而提高。聯合營業，可以統一調劑式樣，適應市場需要，而且產量集中，易於承接訂貨或委託加工任務。這些都是聯營的優點，但聯營必須在政府領導之下，否則可能引起相反的結果，即可能聯合抬價壓價，爭取暴利，還可能引起各種公營與私營之間、批發與零售之間、聯營與非聯營之間的矛盾。（三）公私合營，這是國家經濟領導私營經濟最可靠的方法，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較鞏固的形式。『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共同綱領」三十一條）但公私合營方式，還剛剛開始，我們尚未取得必要的經驗。同時，爲了避免私人資本家的疑慮，今天政府的方針，還不是積極提倡公私合營，除非出於私方的要求及國家財力所許可的條件下。但無疑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私人資本主義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而最後否定了自己。自然這是將來的事情，不過這一條歷史發展的規律，民族資本家是應該有所認識的。

除接受國家經濟的領導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新中國所應該接受的另一個限制是必須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即必須實行私營企業條例第七條的規定：『企業應切實執行政府一切有關勞動法令』。首先，是合理的工資，其次，是必要的福利和必要的安全衛生設備。在這方面，政府都已製定或將製定專門的法令。工礦企業必須有一定的安全衛生設備，職工福利（勞動保險）亦必須有一定的保證。這兩項開支是不管企業有無盈餘，都應當列入經常開支之內的。此外，在經常開支以外，私營企業還應該提出一定的盈餘來照顧職工們的共同利益，因此，私營企業條例第二十五條上規定企業盈餘在提存公積分派股息之後的餘額中，除派股東紅利及董監經理人廠長酬勞金一般應不少於百分之六十外，尚應有百分之三十用於下列兩個方面：一、改善安全衛生設備基金，其中工礦企業應不少於百分之十五；二、職工福利基金及職工獎勵金等，一般應不少於百分之十五，這兩者合計爲百分之三十。必須說明：職工經常的安全衛生設備支出以及經常的職工福利事業的支出是應列入經常開支之內，與這裡的「基金」是兩回事。企業家不能以此爲藉口，認爲企業必須有了盈餘才來改善安全衛生設備或舉行職工福利事業。私營企業條例所規定的「基金」，意思是說：除了經常的安全衛生設備及必要的職工福利之外，在盈餘中還應提出一部份來作爲職工共同利益的支出，私營企業的盈餘，既然完全是工人羣衆們辛苦勤勞所得到的結果，那麼提出一部分盈餘來用於職工方面，顯然是天經地義的事。私營企業條例第八條上又規定：凡『勞資雙方利益有關者，應由勞資協商會議或勞資雙方協商解決之』。過去經驗亦已充分證明：這些勞動法令和勞資協商制度，是有利於生產發展和勞資關係的調整的，它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特色。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毛澤東思想在經濟政策上的具體表現，要『公私兼顧』，必須加强國家經濟的領導，要『勞資兩利』，必須執行國家一切有關勞動的法令，這是私營企業所必須遵守的原則，也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至發展成爲舊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商業政策，不僅表現在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的經濟政策上，而且已變成了具體的條文固定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上，這一條例正因爲它對於國家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利益以及對於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作了這樣正確的調整，所以，對於我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會起着一定的推進作用，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上的民族工商業政策，不可不對這一個文件加以認眞的研究並堅決爲它的實行而努力。

一九五一，六，九日北京。

怎樣學習「實踐論」？

李達

一 為什麼要學習實踐論？

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人民的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人民所服膺與學習的對象，我們要很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必需學習「實踐論」。「實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科學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總結。我們學習「實踐論」，就是要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立塲、觀點與方法，用以深刻地認識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作為實踐的指導。

在我們新中國，當前有兩大基本任務，要全國人民担當起來。第一，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祖國安全與世界和平，把革命進行到底，即完成土地改革、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鎮壓反革命。第二，是加強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國防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等等。要完成這兩大基本任務，這就要求全國人民站穩立塲，大家把意志統一起來，集中起來，提高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隨時隨地認識國內外的環境及周圍事物的變化，好好掌握政策，照政策辦事，這就必須學習「實踐論」。

自從我們新國家成立後，全國人民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方法，來改造自己，成為新人。成千成萬的工作幹部和青年，都學習了「共同綱領」、「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和時事政策，一般說來，大家都懂得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共同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的大憲章，也懂得了勞動創造人類世界的大道理，也認識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創造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尤其是抗美援朝運動開展以來，一般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政治學習也非常普及了，現在正是應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一步的時候了。毋庸諱言，有許多人的政治學習是有缺點的，最嚴重的缺點，是政治學習不曾改變他們自己的思想。有的思想雖然改變了，而對於實際問題的看法，却感到茫然。就許多人對於電影「武訓傳」的稱讚與歌頌一事舉例來說：武訓雖是滿清末年一個行乞興學的乞丐，但仍是乞丐。乞丐在經濟上失掉了生產手段，脫離了生產活動的實踐，靠行乞來過寄生蟲的生活；在政治上，是歸屬於反動陣營的。所以，乞丐的通性大都是：擁護私有制、剝削制，崇拜豪紳地主、功名富貴，服從統治，忍受壓迫，不但不革命，而且有時反革命。「武訓傳」中所描寫的武訓，對於乞丐的通性是兼而有之的。他極其奴顏婢膝之能事，並且做出非人性的行為，例如挨打一拳得二文，挨踢一脚得三文，喝髒水，吃瓦片之類。他把這樣乞得的錢存入豪紳地主之家，放債生息，還買過很多的田出佃，去剝削人民。他容易使人迷糊的地方，就是拿錢去辦「義學」。但他辦「義學」的目的，是要使窮小子讀書可以「出人頭地」，可以「坐八抬大轎」，做大官，騎在人民的脖子上，做滿清皇朝的幫兇。他這個「義學」是交由達官貴人去辦的，「義學」中所『唸的書，還不是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嗎』？（張學人語）。像武訓這樣行乞興學為封建階級文化服務，當然能博得統治階級的嘉獎，所以當時滿清皇朝「欽賜黃馬褂」，封為「義學正」，並給造大牌坊，後來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也都嘉獎他。這種為反動統治階級所嘉獎的人，值得我們人民的稱讚和歌頌嗎？歷史上的人物值得我們人民稱讚和歌頌的，必須是反抗壓迫階級的革命領袖、保衛祖國的民族英雄、以及人民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像武訓那樣的人，在今天應當是在勞動中被改造的人，他是社會的寄生蟲，並不是「勞動人民」；他為封建階級及其文化服務，並不曾為人民及其文化服務。不料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把武訓其人其事揑造一番，歌頌「大哉武訓，至勇至仁」，稱讚他的「勤勞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忘我精神』，說『讓我們把武訓做榜樣』。此外還有人說『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董渭川語）。像這樣的稱讚和歌頌，是不能承認或容忍的。否則『就是承認或者容忍

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爲正當的宣傳」（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像那樣的反動思想的宣傳：要我們人民學做武訓那樣興學的乞丐，好讓窮人得到讀書機會，也污衊了人民革命與人民的國家。這樣的宣傳，若果是故意的，那便是把反革命的思想僞裝爲「爲人民服務的思想」，企圖敗壞人民革命建設的鬥志，我們必須對它做無情的鬥爭；若果是無意的，那便是做了敵人思想的俘虜，是政治學習未能改變自己的舊思想，或者思想雖然改變而對實際問題感到茫然的表現。又如抗美援朝運動發生以後，一般人對於崇美親美思想雖已相當克服，但有些人總覺得美國比中國强，物質文明好，仇美抗美的情緒高漲不起來，這也是政治學習未能聯系自己思想實際的表現。爲要克服這種缺點，就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即學習「實踐論」，用「實踐論」把自己頭腦武裝起來，提高對實際的認識，改造主觀世界（自己頭腦）和客觀世界。

幾百萬參加革命建設工作的幹部，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革命建設的實際鬥爭中，已經表現出空前偉大的成績。然而，却不能說每個人都能正確地領會了毛澤東思想，在我們幹部中，有些犯了官僚主義的偏向，自己坐在辦公室裡訂計劃製表格，以此爲滿足，而不去檢查。上有官僚主義，下面就有命令主義。有些人犯事務主義的毛病，對主管工作掌握不住中心，東抓一把，西抓一把，整天忙忙碌碌，可說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還有些人犯左傾急性病，也有些人犯右傾慢性病。無論那種錯誤，對革命工作都會發生或大或小的損失。這些錯誤的根源，基本上是主觀主義。主觀主義表現爲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老幹部容易犯經驗主義的毛病，即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硬性運用自己的片面經驗。新幹部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祇知死啃教條，滿足於文字上的理解，不聯系實際，不聯系政策。爲要克服這些錯誤，減少工作上的損失，就必須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來提高理論水平，研究如何預防和醫治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毛病。大家都要學習，才能懂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科學、哲學和文藝工作者，也要學習「實踐論」。在這偉大的新時代中，科學、文藝、哲學工作者，都能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但部分地還存在着缺點。有些自然科學工作者，對發展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不重視，有的則爲科學而科學，爲研究而研究。學社會科學的，有的思想落後於實際，不能用科學的觀點，去認識和解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歷史等問題。研究政治學的，還留戀於資產階級的民主。研究法律的，還不能完全肅清六法觀點。根據共同綱領，自然科學工作者必須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因此，不論自然科學工作者或社會科學工作者，都必須學習「實踐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去認眞研究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問題，創造出理論。這樣創造出來的理論，才能與實際聯系，才能爲建設服務。

說到文藝工作者，有些作家的作品，還是用各種方式，掩飾其生活上的空虛，所描寫的人物是虛構的，臆測的，因爲他們沒有深入工農羣衆中去體會工農生活，而是坐在家裡寫工農作品，自然創造不出好的東西，這是犯了教條主義的毛病。另外，還有些人僅是到工廠去看看，便自以爲有了經驗，便以此代替理論學習，而把這片面的經驗誇大起來，這又是犯了經驗主義的偏向。爲要克服這些毛病，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實踐論」，把「實踐論」作爲學習和工作的最高標準，從而能够更好地以實踐爲基礎，創造出眞正的人民的文學來。

最後，說到哲學工作者，也有不少缺點：對辯証唯物論的宣傳不够，沒有建立起哲學戰線，對資產階級的煩瑣哲學及各種反動學派沒作革命的批判的鬥爭；不能把這偉大時代豐富的革命經驗用科學方法總結起來，去指導革命實踐。我們必須避免唯物論的空談，好好學習「實踐論」，用科學方法，去考查革命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對一切流派的唯心論作無情的鬥爭。

總之，如果我們能够深入地鑽研「實踐論」，把它的觀點和方法，正確地運用到各方面去，新中國的學術界必能開闢新的一頁。

二　怎樣學習「實踐論」？

「實踐論」是論證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學說。它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應用馬列主義的理論，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綜合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鬥爭，開闢了革命眞理的鬥爭道路，把馬列主義作了精闢的分析和光輝的補充。

「實踐論」發展於一九三七年，是毛主席在抗大作的講演。當時，離黨的誕生有十六年之久，毛主席總結了十六年的革命鬥爭經驗，才寫出了「實踐論」。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時，是個小孩子，大家對馬列主義還懂得少，還不能把馬列主義的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

踐聯系起來，因此犯了許多錯誤。譬如一九二四——二七年，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爲甚麼一個無產階級的黨要同資產階級的黨合作呢？陳獨秀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以爲必須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才能有無產階級革命，因而在同國民黨的聯合中，放棄了黨的領導權，致使革命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那時，兩湖有組織的農民達幾千萬人，他們迫切要求土地，毛主席到湖南調查情況收集資料主張土地改革。但是，由於當時的黨是在陳獨秀派領導下，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僅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開了個座談會，請一個印度專家同國民黨人研究，毫無結果，還有武裝問題，當時，陳獨秀派主張祇要民衆，不要武裝，他們以爲祇要組織民衆罷工，革命就能勝利。農民覺醒了，但沒能及時地把他們武裝起來，因而招致了革命的損失。到一九三一——三四年，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得了勢，毛主席的意見不被採納，以致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當時，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事，是不會失敗的，毛澤東思想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它是百戰百勝的革命理論。所以，劉少奇同志說，依照毛澤東思想，革命就一定勝利，否則，革命就要失敗。這一點，中國革命的事實完全証明了。

在一九三七年發表了「實踐論」，就是要提高黨的理論水平，使黨員能夠運用馬列主義的眞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實踐論」本身，也正是在反敎條主義經驗主義、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又重新發表，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爲現在是翻天覆地的時代，是歷史的偉大轉折點，在這種情勢之下，必須把我們全國人民的意志思想統一起來、集中起來，認淸發展前途，才能把國家搞好。這也就是說，必須把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統一的意志，用馬列主義的哲學，把頭腦武裝起來。這一次發表「實踐論」，雖然距離第一次有十四年之久，然而，它是一種具有永久性的眞理。所以，現在全國人民必須用它來武裝頭腦，來搞好建設工作。

我們要怎樣才能學好「實踐論」呢？我以爲應當採取下列的方法：

第一、要端正學習的態度。我們學習「實踐論」，首先要站穩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立場。「實踐論」特別强調辯証唯物論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它的階級性，它是爲工人階級與革命人民服務的，它是工人階級與革命人民的實踐的哲學。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科學、文藝和哲學，都不能不貫串着階級性，即『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學習「實踐論」，爲要堅決站在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立場，就必須克服客觀主義的態度。客觀主義，是資產階級哲學的一種傾向，一種虛僞的隱蔽的表現方法。資產階級企圖把自己階級的思想散佈於工人階級之中，來毒害、欺騙與分裂工農大衆，他們否認理論的階級性，宣佈自己的理論是超階級超黨派的，是對於全世界人類都適用的。這樣的客觀主義，是歪曲現實的，是資產階級理論的僞裝。有些人受了客觀主義思想的影響，當認識問題、分析問題時，不從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立場出發，自以爲是超階級超黨派的，完全以第三者或旁觀者的姿態出現。他們還抱着作客思想或純技術觀點，對於空前未有的革命建設的新局面，他們熟視無覩，漠不關心，或者姑且站在傍邊觀望觀望。他們對於抗美援朝運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民主建政等一連串轟轟烈烈的運動，不感興趣，或者把這些當作戲劇來看，這是客觀主義的十足表現。我們要想學好「實踐論」，必須克服客觀主義的態度，堅決站在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立場，才能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

第二、要在實踐中去學習。「實踐論」强調辯証唯物論的另一顯著的特點，是它的實踐性，它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知識從實踐發生，並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實踐中求得的知識，是爲了用那些知識在實踐中得到証明，並拿來指導實踐，發展實踐。所以『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例如科學是科學家在實踐中得到的知識，我們學習它，必須在科學的實驗中去學習，並且爲了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而學習。同樣，「實踐論」是毛主席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鬥爭中，運用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所鍛鍊出來的理論，我們學習它，必須在革命建設的具體工作中去學習，並且爲搞好革命建設的工作而學習。這即是說，我們是爲實踐而學習「實踐論」，不是爲學習而學習「實踐論」。最近，有個朋友問我：『眞理報社論說毛主席的「實踐論」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這所謂發展究竟是什麼意思』？我說：『「實踐論」是毛主席運用馬列主義認識論的根本原理，總結了中國人民革命的經驗，解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實踐中所發生的矛盾和問題，克服了敎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的偏向，並把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做了系統

的嚴密的分析和光輝的補充。所以說，「實踐論」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在這裡，所謂發展，是意味着它的延長、繼續和補充，而這種延長、繼續和補充，又必定符合於實踐。倘若有人不是這樣理解，而專在「實踐論」中尋找那些章句是馬列主義認識論中所沒有的，那便是鑽牛角尖式的學習方法，那顯然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來學習「實踐論」。是爲學習而學習，不是爲實踐而實習。我們必須克服這種爲學習而學習的鑽牛角尖式的方法。堅持爲實踐而學習的方法。我們要從「實踐論」學習認識運動的唯物辯証法，來理解新國家的革命與建設的各種具體問題，以便很有效地從事於革命建設工作的實踐。

第三、從實際出發，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共同綱領」是毛澤東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具體表現，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以求共實現的綱領。中央人民政府所發佈的政策，都是根據「共同綱領」，從廣大的實際出發來制定的。一切參加於革命與建設的工作者的唯一任務，就是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使政策能够有效地順利地轉化爲實際。了解情況是認識世界，掌握政策是改造世界。要掌握政策，必先了解情況，要了解情況，必須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從實際出發，就是從感性認識的材料出發。所謂實際，就是千百萬羣衆的實踐的具體情況，任何工作者，必須調查與自己工作部門有關的一切實際的資料，吸取羣衆的意見和經驗，調查各階層的生動的生活狀況，即是說要『詳細地佔有材料』。然後根據這些材料，依據辯証的方法，施以論理的操作，引出論理的結論。毛主席說：『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樣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即是說，一切工作者當執行政策時，必須從實際出發，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才能『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才能把政策轉化爲實際。倘若『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就犯了教條主義的偏向，結果必招致失敗。

第四、總結經驗，『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爲理論』，這也是學習「實踐論」的方法之一。任何工作者，不僅要熟悉本崗位的工作情況及其發展趨勢，而且要了解其他有關部門的工作情況及發展趨勢。在工作過程中，要不斷地總結工作經驗，上升爲理論，即使它由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特別是哲學工作者，要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世界勞動人民革命的經驗，總結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經驗，還要吸取科學上的新發明和成就，藉以豐富辯証唯物論的內容。但是經驗的總結，『必須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要在那些經驗之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指出貫串於那些經驗之中的規律，作爲工作的指南。像這樣的總結，才是科學的總結。若果總結經驗而不應用「實踐論」中所說的方法，而祇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眞切的內容』（「反對黨八股」）。像這樣總結經驗的方法是形式主義的方法，還不能說離經驗主義的偏向。

第五、堅持眞理，修正錯誤。千百萬羣衆的實踐活動的實際情況，是變化的，發展的，有時發展得很快，我們的思想必須與實際保持一致，才能指導實際，使實踐向前發展。「實踐論」指示我們：根據對於某一階段的某一具體過程的認識所構成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把它應用於同一過程的實踐，若能實現預想的目的，這一認識便是眞理。但是實踐中若果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發現了前所未料的情況，『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部份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這便是說，修正錯誤，得到眞理，再堅持下去。所以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如果犯了錯誤，遭遇失敗，就要吸取失敗的教訓，研究錯誤發生的原因。從失敗中學習，從錯誤中學習，不因失敗而灰心，不爲錯誤所嚇倒。再認識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改正錯誤，就能够變失敗爲勝利。

思想要與實際相一致，才能促進實際的發展。一切工作者，對於新鮮事物要有敏銳的感覺，隨時針對實際情況，改進自己的工作方針。若果實際情況早已向前發展而自己的思想還停頓在舊階段，工作方針還是老一套，必然引起工作的失敗。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偏向，必須防止。但是思想遠遠超過於實際，離開了當前千百萬羣衆的實踐，就會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也應竭力避免。

毛主席說：『工作要實事求是地深入調查研究，按照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解決問題』。我們新國家的建設事業，突飛猛進，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其次，各省區的經驗與文化的發展水平也不一樣。所以，今年擬定的工作方針，

到明年必有所改進。對於某一政策的執行，在條件欠缺的地方，仍須創造條件，才好推行政策。一切決定於時間、地點與條件，工作者祇有學習「實踐論」所指示的思想與實際相一致的方法，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

第六、我們學習「實踐論」的目的，是在於提高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實踐論」是以說明認識世界進而改造世界爲任務的科學理論，我們學習它，是學習怎樣認識世界以及怎樣改造世界的方法，學習怎樣改造主觀世界以及怎樣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所以，學習的第一步，是學習怎樣認識世界，怎樣改造主觀世界即怎樣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這改造主觀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的問題，即是學習「實踐論」來改造自己思想的問題。由於「實踐論」的學習，我們能否採取人民的立場、唯物的觀點、辯證的方法去理解一切實際問題？這就要採用自學與集體學習相結合的方法，因而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毛主席說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是推進大家堅持眞理，修正錯誤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國家內全體人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例如：近來發表文章。竭力稱讚並歌頌武訓的人們，都宣稱自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評價了歷史上的人物。但實際上完全相反。他們把武訓這個行乞興學的乞丐，誤認爲勞動人民，而本質上他是脫離勞動關係的、社會的寄生蟲；把武訓興辦義學收容窮人讀書的事實，誤認爲窮人階級的文化翻身，而本質上他是爲宣傳封建文化服務。他們對於武訓的這種認識，顯然是感性認識。最近思想論壇上展開了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由於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上的混亂，大致可以澄清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新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也是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團結進步的原動力。

第七、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加强對「實踐論」的理解。我們學習「實踐論」還須作有系統的理解的鑽研。上面說過，「實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科學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總結。「實踐論」的基本原理，貫串於毛主席的一切著作之中，「實踐論」的每一句每一段話的道理，都可以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說明。我們熟讀毛主席的其他著作，就可以體會毛主席在指導革命的過程中，如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如何適應革命形勢的變化，提出新的任務和計劃，來指導革命的實踐；如何糾正左右傾的偏向，使革命進行順利而不致遭受損失。所以，熟讀毛主席的其他一切著作，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實踐論」。

其次，我們還要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來幫助我們對於「實踐論」的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辯證唯物論的創始人，他們首先把階級性與實踐性作爲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使唯物論從自然領域擴充到歷史領域，形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哲學，因而創成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造了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把這一時代的革命鬥爭、理論鬥爭以及科學上的新成就，總結於辯証唯物論，使哲學發展到列寧的階段和斯大林的階段。我們如能够多讀馬、恩、列、斯的著作，就會知道「實踐論」發展了馬列主義認識論這一句話的眞理。

特別是斯大林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著作，是辯証唯物論的最高峰，我們更應當熟讀、精讀。因爲「實踐論」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涉及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全部內容，如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區別，辯証唯物論與機械唯物論的區別，以及唯物辯証法的幾個基本觀點，都應用在「實踐論」之中。「實踐論」澈底發展了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我們要懂得辯証法，懂得唯物論，懂得「實踐論」如何應用唯物辯証法於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就必須學習斯大林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經典著作。

還有「聯共黨史」，是一部最好的馬列主義教材書，學習「聯共黨史」，就知道它是如何總結十月革命前後革命的經驗與建設的經驗，以及在一定革命情勢之下提出與之相符合的革命的任務等等，這很能幫助我們深刻地理解「實踐論」。最近，中國近百年革命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也要用心研究，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如何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進一步了解「實踐論」。

三　實踐論學習提綱

最後，爲了大家便於學習「實踐論」，特擬定一個學習提綱。這個提綱，完全按照「實踐論」原文的次序，依其重點而提出的。

一、「實踐論」首先指出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是以認識爲基礎的，認識依賴於社會實踐，依賴於生產與階級鬥爭。

（1）實踐是勞動，是生產，是階級鬥爭，是政治生活，是科學的藝術的活動。但生產活動是第一的基本的實踐活動，其次是階級鬥爭。

（2）人的知識主要是從生產活動發生的，並隨伴於生產活動的發展而發展。

（3）在階級社會中，從生產的實踐產生出階級鬥爭的實踐，階級鬥爭的、

即革命的知識，是在生產與階級鬥爭中發生並發展的。

（4）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科學、文藝與哲學，都貫串着階級性。

二、實踐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

（1）人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的規律性，即主觀符合於客觀，便是眞理。

（2）認識之是否眞理，祇有社會的實踐能夠給以證明。

（3）眞理的標準，祇能是社會的實踐，此外別無標準。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在實踐中就能得到預想的結果；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

（4）實踐性和階級性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兩個特點，正因爲有這兩個特點，所以辯証唯物論才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哲學。

三、認識的過程，是一個總的過程，包括着由實踐到理論及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

（1）由實踐到理論的過程，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感性認識是認識的初級階段，理性認識是認識的高級階段。

（2）在感性階段，人們祇能認識各個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系；到了理性階段，人才能認識各個事物之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

（3）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是經過抽象思惟的結果，是認識過程中的突變

（4）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形成爲辯證的統一，兩者互爲條件，互相補充，互相發展，互相豐富其內容，決不是各自獨立的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以感性認識爲前提，感性認識以理性認識爲歸結。

（5）理性認識即論理認識或理論，是實踐經驗之科學的總結。

（6）唯物論否認感性認識而重視理性認識，經驗論忽視理性認識而重視感性認識——都是主觀主義。

（7）教條主義與唯物論的唯理論相像，經驗主義與唯物論的經驗論相像。

（8）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由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突變。

（9）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理論的認識，仍須再回到實踐中去。

（10）理論是否符合於客觀的規律性，要把它應用於實踐，看它能否達到預想的目的。

革命理論是重要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但理論之所以重要，正因爲它能指導革命行動，單有理論而不行動，那種理論就沒有意義。

（11）理論與實踐是在實踐基礎上統一的。「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

（12）教條主義者割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有理論而無實踐；經驗主義者從另一方面割裂這個統一，有實踐而無理論。

四、認識的相對性與絕對性的問題，即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的問題。

（1）認識是運動的，發展的。認識的運動和發展，伴隨於客觀過程的運動和發展。

認識某一具體過程所構成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如在同一過程的實踐中實現了預想的目的，這一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但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全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有時由於客觀情況的變化，局部改變或全部改變的事是常有的。如果能夠適應於客觀情況的變化而修改其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就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

（2）思想必須聯系實際。

客觀實際的過程，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時，符合於前一階段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必須適應於後一階段而有所改變，不能無條件地適用於後一階段。否則就會變成右傾機會主義。但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如果遠遠超過於客觀實際情況，或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就會變成左傾冒險主義。

（3）世界是可以完全認識的，絕對眞理是存在的。

（4）眞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的關係——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合，就是絕對的眞理。

（5）眞理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五、改造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

（1）認識世界以改造世界，在今天是共產黨、工人階級與革命人民的歷史使命。

（2）改造自己主觀的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

（3）改造自己主觀世界，在人民內部，就是改造思想——肅淸落後的反人民的思想，建立起革命的戰鬥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4）被改造的客觀世界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之被改造，須要通過强迫的階段——堅決鎭壓與勞動改造。

（5）世界改造與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過程。

六、「實踐論」是中國數千年來知行學說的科學總結。

（1）「實踐論」是知行關係的唯物辯証法。

（2）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與中國過去知行學說的差異。

「實踐論」與民政工作

——在城市救濟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節——

謝覺哉

一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人民日報刊佈毛主席以前著的「實踐論」，是有重大意義的，是給所有工作同志指示出一條怎樣工作的光明道路。

人們喜歡講「摸索」。「摸索」，可能是「瞎摸」；「瞎摸」，不免瞎碰！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亮着眼睛前進，而且攜有指南針，以補肉眼所不及。

以前實踐的認識，是今後實踐的指導，今後實踐的認識，是對以前認識的補充和修正。不去實踐，不在實踐中得出新的東西，就不能向前走；同樣，忘了過去，不以過去得到的認識作指導，一切重新做起，那將多走彎路。比如，這次會議——城市救濟福利工作會議，若在一年前召開，必然討論不出多的東西，現在有了一年城市工作的實踐了，大家能舉出好多事例，提出好多具體意見，因而能找到一些規律——這是由實踐而得到的認識；但是，在去年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闡明了人民救濟福利事業的總方針，指出了我們努力的方向，這又是一年來城市救濟福利工作所以能有成績的來由。凡是有意識的掌握這指導原則的，其獲得成績就越多。

認識，不能一下子就正確，就全面；要經過反復多少次，才能走向正確，走向全面。拿政權說罷，五十歲以上的同志們如就其所看見的或經過的回溯一下，如我們經過戊戌政變的實踐，多數的人，才認識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經過辛亥革命的實踐，才認識到只取消一個皇帝不够，還要有個新的政權，要有一個甚麼樣的政權？當時是不甚清楚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一個新的方向，但還是經過五四運動、大革命、土地革命等較長期的實踐，到一九四〇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才出來。自此以後，實踐更豐富，偉大的黨的領導者的光輝指導文件如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直到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新民主主義政權組織形式及其內容，全然具備。現在，我們是依據這些認識去從事實踐，又要從實踐中得到更具體的認識。記得一九四八年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想製定縣、區、村人民政權組織條例，因爲實踐和認識不够，沒有製好。現在，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各級人民政府組織通則，都已頒佈了。這說明：許多事，在沒有實踐以前是不能完全認識到的。同時，我們的實踐，不是盲目的，是在已有的工作基礎與認識基礎上向前推進。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每個同志都應掌握這規律，個人能力才能一步步提高，工作也就少走彎路，能够做好。

有些同志，做了不會想；不會聯系過去的，甚至自己做過的也都忘記，都喜怪人家不替他安排好，未免有點冤枉吧！

認識——要善於聯系各個方面，從正面看，從反面看，從深處看與從遠處看。否則，易陷於認識的只是事務的現象，而不是本質，現象與本質常常是不一致的。或者認識雖對，而忘記了時間與地點的限制，仍然是走不通。

「自以爲是」，是認識的對頭。個人的聰明學識，是極有限的；廣大人民的聰明學識，才是無限的。

「故步自封」，滿足於已有的經驗，是認識的對頭。廣大人民的實踐，正在飛躍地前進，我們工作者偶不努力，認識就要落在實踐的後面。

我們的思想意識上，必須打破靜止的觀點，天天向前進；必須打破狹隘的觀點，能看到許多方面。

一年來，不論在那個方面的政府工作——政法、財經、文教等，不論在那個運動裡——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國際和平運動、民族團結等，不止是發動了上層，且深入到了每個角落；不止是量的變動，且已起了質的變化。新的事務——點滴的以及巨大的，天天湧現在我們面前。我們民政工作

者，如果不善於認識這些東西，他就決不會善於領導民政工作，而將使民政工作受到損失。

不少地方的報告，他們已在實地經驗中捌造出了新的東西，但還很不够。提議我們同志，要仔細讀讀毛主席的實踐論，把實踐論運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二　幾點認識

（一）民政工作——寬點說，政法工作吧！他是組織人民自己來辦理自己的事。雖然其他部門也是政權組織的一部份，但承担這個政權的組織工作的，主要是政法部門。必須有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各種建設有效地進行。有些人不重視政法工作，是不對的。他們忘記了革命就是爲的政權，忘記了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中有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有些民政工作幹部不願做民政工作，說是「打雜的」，沒有前途；自己看不起自己，這也是不對的。要知道我們做的正是國家建設的基本工作，能够做好這一工作，對國家貢獻是非常之大。

（二）民主與專政問題。對人民內部是民主，對人民的敵人是專政。民主與專政不只可以並行不悖，而且是完全一致。只有人民內部更民主，對敵人的專政才更有效；反過來，對敵人的專政更有效，也更能保護與鞏固人民內部的民主。這個道理已在實踐中證明，但不一定多數幹部都認識。我們需要認清這一道理。

（三）民政工作是人民辦理自己的事，因此需要人民動起來，就是說要造成社會運動。幹部要領導人民去做而不是强迫，要牽領人民去做而不是包辦。經驗證明：凡是發動人民，政策爲人民所把握而造成了運動的，他們進行剿匪、反霸、鎭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救濟、生產、支援前線等工作，無不有意想不到的成績。反之，其成績就很有限。大家都說：發動羣衆，走羣衆路線，但怎樣去發動？路線是怎樣？則不大清楚。我們以爲最好的發動羣衆與走羣衆路線，就是必須組織好與開好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及辦好爲人民代表會議支柱的一些人民組織　。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在人民政府領導下都動起來，向一個目標前進，這力量是任何强力阻擋不住的。有些同志把政府工作與人民民主對立着看，如說工作忙，沒工夫開代表會議，把代表會議看做擺樣子，這當然是認識上的錯誤。而要人民組織起來，依靠人民力量，是要經過一些曲折與化費一些力量的，有些同志怕麻煩，也是不對的。

（四）民政部門工作，政策性質的多一些，越上層，越這樣　。中央內務部，大行政區民政部，省民政廳，主要是掌握政策，總結經驗，介紹經驗，而不是只去辦具體事務。辦些具體事務爲的是取得經驗，便於指導全面工作。有人問「民政部門與救濟分會怎樣分工？」我們以爲救濟分會是指導或直接辦理救濟福利業務機關，民政部門主要是管政策，而不是你辦那幾件，我辦那幾件。

（五）下級要遵照上級指示做，要報告、請示，但不要望上級事事都來個統一規定；上級要領導下級，但不要妨礙下級的創造。中國太大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又很不平衡，雖然我們的政治是前進了，而政治前進並不能馬上就改變經濟和文化的不平衡，如果不顧及各方面的情況，只顧統一規定，結果必然行不通。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常常允許各省、區政府在此原則下，根據當地情況規定具體辦法，就是爲此。有些同志不肯用腦筋，而總想上級給他一個細密的圈圈，把自己圈住，這是不好的（自然，不遵照上級指示的意圖去做，也是不對的）。還有，難於做的事，希望上級包起來，如會議上有人提議，要中央統一辦個收集游民的農場，這不僅不可能，也不合實際需要。

自然，下級有困難，上級應盡可能幫助解決，但上級決不應束縛下級的創造，事實上各地的創造已有了很多，只等待我們去吸取。

（六）積極負責，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民政工作是麻煩，怕麻煩就越麻煩，越不怕麻煩就可以解除麻煩。比如烈、軍、工屬及革命殘廢軍人的優撫，是麻煩的。你如不待他來找，就自動地去找他，問題常容易解決。東北各省、華北華東有些縣召開了烈軍屬、榮軍代表會，不是把他們看做社會負担，而是把他們看做社會的積極因素，效果都好。陝北烈、軍、工屬很多，去年西北來人說難解決，中央撥了些糧仍不成，於是西北民政部組織工作組去檢査，發現了那裡工作的缺點，優待面大，　且是平均優待，經過民主評優，　改善優待辦法，各方都滿意。關於棄嬰與育嬰堂問題，南昌市棄嬰很多　，育嬰堂費力很大，效果仍不見佳，他們由集體育養而獎勵領養、寄養和津貼等，棄嬰由每月六十多減至四、五個，死亡率由百分之八十減至百分之三十二。這都是積極負責，捌造了辦法所致。對游民，也應是負責的態度，游民是舊社會使他們失掉了生活條件，養成不勞動的習慣，應該同情他們，用力去改造他們。北京妓女覺悟後，把自己的經歷編成戲，叫做「千年冰河開了凍」，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總之，任何工作，只有用積極的態度，才能得出積極的結果來。

（七）不要性急，也不要太慢。能做的做，不要一步登天。想一下把城市游民絕跡，不知道他與整個社會建設分不開，要突出就會

游民絕跡，不知道他與整個社會建設分不開，要突出就會碰壁。有人說「收的游民太多了，包袱很大，背不起。」誰叫你背那樣重呢？難道不可以一步一步地來辦嗎？但也不應太遲緩，條件的創造，不全看客觀，也要主觀去推動，努力克服困難。

（八）做好工作，要靠各地的實踐。不了解實踐，領導機關一點辦法也拿不出來，拿出來也不中用。中央的建政指示，救災指示，以及其他指示，沒有一件不是依據各地比較成熟的經驗寫的。各大行政區，各省，也應是一樣。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不總結實踐，不親自實踐，就不能認識；不再實踐，再認識，也不能發展認識。

三　怎樣學習

（一）民政部門工作的同志，要關心政府的各項政策：財經、文敎、外交、民族、華僑……等有關政策的文件都要學，因爲都和民政有聯系。文件太多，看不完，怎麼辦？文化水平低的同志，更是難事。我們應盡可能多看，不能多看，看大意，看口號，比如「五一」的口號很簡單，但概括了各方面總的政策。

（二）至於有關民政工作的指示文件，那是各地經驗的總結，各級民政部門幹部必須學習、討論，不可輕視。聽說去年民政會議通過的報告，有些地方沒有很好傳達，甚至沒有傳達，這是不能容許的。最近劉少奇副主席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政務院關於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的指示，必須學。關於救災、優撫、救濟等重要文件，也是一樣。

（三）學文件，要與實際做的去聯系、比較，想出新辦法來。不要學的是這，做的是那，兩下合不起來。

（四）要打開窗子，通空氣，交流意見，互相啓發。內部通氣；和各部門通氣；還要上下通氣。這次會議，相互提了很多意見，算通氣了，但在會前沒好好的通，會後還要常常通，有意見就寫信，不要每個信件都打公事腔。

（五）要積累經驗。不要做過、看過就忘了，要記下來。有的人，一遇事，好像都要重新做起，不能與過去的，與別的經驗比較、參考，就是因爲不注意積累經驗。硬搬經驗是不好的；毫無聯系、分析，以感想當政策，更不好。

（六）召開各種工作會議，是學習方法的一種。

（七）做領導工作的同志，要有想問題的時間。做事務可以忙，考慮政策忙不得。一天到晚，忙的昏頭昏腦，頭腦不清醒，怎能深入的考慮問題！瞎忙，累死，不能解決問題，這叫「日計有餘，月計不足」，我們要的應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同志們，我們幸運得很！處在偉大的人民時代，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做着偉大的爲建設走向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工作。我們在和時代賽跑，時間進展得快，我們也必須進步得快！一年來我們都有了進步，我們需要再進步，進步到人民對我們所要求的程度。

（韓英記錄）

學術簡訊

中國科學院編審中國科學論著叢刊

中國科學院爲了鼓勵國內的科學研究，和有系統地介紹我國的學術成就，決定編印現代中國科學論著叢刊。這部叢刊把中國自有近代科學起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止，這一時期的重要科學論著全部包括在內，並將各種專門學科分門別類，依照各種科學發展的階段和年代依次彙編，並將分中文和外文兩種。

叢刊的編審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必須組織各種專門學科的編審小組來担任。小組的人選由科學院商同科學院各組專門委員和有關專門學會的本年度理事共同決定。一九五一年叢刊的重點爲數學、物理、地質、生理、氣象五門。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分組討論歷史問題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在京會員，包含各大學歷史敎師，及中國科學院、敎育部、出版總署、文物局、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人民出版社等處的歷史工作者，在四月初，分別組織了十二個小組，進行討論歷史問題，並特別注意和歷史敎學有關的問題。這十二個小組是：1、中國通史組，2、先秦史組，3、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史組，4、隋唐五代遼宋金史組，5、元明清史組，6、中國近代史組，7、舊民主主義革命史組，8、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組，9、世界通史組，10、西洋史組，11、亞洲史組，12、蘇聯史組。

「實踐論」的基本精神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山東大學政治講座上的報告

華崗

一 「實踐論」的產生和意義

毛主席的「實踐論」第一次發表在一九三七年，這是第二次發表。當時毛主席爲什麼要發表這樣一篇「實踐論」？主要是根據當時革命運動的需要，因爲在一九三七年時，正是中國兩大革命剛剛過去，而新的革命運動即將到來之時，過去的兩個大革命，第一個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第二個便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運動。而面臨着的那個新的大革命浪潮，就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毛主席在那時，總結了過去兩次大革命的主要經驗與教訓，認定兩次大革命所以陷於失敗或遭受極嚴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領導方面，思想上的準備不够；在認識上沒有把握到革命運動的具體發展規律，不能跟着客觀形勢的急速變化，而適時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結果就是思想落後於實際，甚至根本脫離實際，當然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第一次大革命是從五卅開始掀起了中國革命的高潮，繼而又展開了北伐戰爭，這一連串的革命戰爭，說明了中國革命運動正在不斷的向前發展，且由城市進入農村。由於北伐戰爭的勝利，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已自動起來要求實行土地革命，這表示中國革命正在進一步發展，可是當時的領導方面思想準備不够，思想落後於客觀現實，沒有認識到革命已由北伐戰爭階段轉入新的階段，即土地革命運動。認爲當時的革命運動走得太快，應該壓制一下，以便拉攏資產階級，結果就犯了以陳獨秀所代表的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加以其他客觀原因，遂使革命遭到失敗。原來在北伐戰爭中，那時的階級關係是資產階級加入了革命陣容，但當革命進一步發展時，資產階級態度立即改變。帝國主義已在這個運動中勾引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態度動搖，以至脫離革命戰線轉到反革命戰線內。但是，領導上沒有看清這一點，沒有見到這個事實，當然也就不能動員羣衆力量來挽救這個革命危機。第二次革命發展到了一九三一年，又起了新的變化，「九一八」日寇侵犯中國，這個重大的事變，必然會引起而且已經引起了國內階級的變化，就是說，原來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最後時期中，資產階級本認爲出賣了革命是可以得到帝國主義諒解的，可是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就是要中國資產階級反對革命，決不可能幫助資產階級在中國建設民族資本主義；相反的，資產階級由參加革命轉入到反革命營壘，正便利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進攻，這便是「九一八」事變原因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入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也遭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甚至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和土地。這樣，便使中國資產階級過去想拿工農的血去換得來資本主義的幻想，完全被事實所粉碎，而原來的經濟地位也被帝國主義所摧毀。這個新的事變不能不引起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即一部分資產階級感到過去害怕工農羣衆，退出革命陣營來，也不可能維護其自身利益。由於他們的政治態度的改變，同時，全國人民也因日寇的侵略，提出了抗日救國的要求，當時國民黨反動派還進行着反革命的「剿共」戰爭，所以全國人民也紛紛要求趕快停止內戰，一致要求抗日救國，這便是當時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主要特點。但當時的領導方面，因思想落後於現實，對這個現實認識不足，估計得不够完全，就使思想脫離了現實。因爲領導方面的責任，就是要隨時隨地注意客觀形勢的變化，及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革命力量。由於當時革命先鋒隊伍內部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結果就讓教條主義在革命營壘中起了摧殘革命的作用，結果就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遭受到損害。幸而毛澤東同志始終是站在正確的一面，通過遵義會議糾正了錯誤，於是中國紅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北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挽救了當時的革命危機。由於全國人民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壓力，以及多數的國民黨軍隊下層羣衆對於「剿共」政策的抵抗，更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矛盾關係的新變化，直接影響到蔣介石集團，特別是經

過「西安事變」的嚴重教訓，使反動派不得不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戰爭。這樣，中國剛剛過去了兩次大革命，而面前又正在開展着一個新的革命運動，因此，毛主席認爲，必須把兩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總結出來，找出它的主要原因，在思想戰線上來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運動——即抗日戰爭。當時存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革命陣營中還有一部份人竟沒有認識到前次革命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以至後來在抗日戰爭初期，仍有一部分人重覆着第一次革命中的思想錯誤，即投降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毛主席看到這一現象的危險性，同時更鑒於上兩次中國大革命遭受失敗或挫折的痛苦經驗，深切感到要使抗日戰爭走到革命戰爭的正確道路，那就必須澈底粉碎教條主義，同時糾正經驗主義，而要眞正有效粉碎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那就不能枝枝節節地和一點一滴地來糾正錯誤，必須從思想根源上揭發其錯誤，提高廣大革命人民思想的水平，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自己的認識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並能根據這種規律去進行革命和改造世界。所以，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便發表了「實踐論」，其基本內容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而用「實踐論」做題目，那是因爲認識的關鍵是實踐，而教條主義者却往往輕視了實踐，所以「實踐論」，這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文獻，主要是針對着當時的教條主義而作的，這就是毛主席發表「實踐論」的歷史條件。後又根據「實踐論」發起整風運動，使革命隊伍在思想改造方面收到很大的效果。現在毛主席又重新發表了一九三七年的「實踐論」，其用意在於我們國家已走到一個新的歷史環境，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時期和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新階段。許多革命幹部，都走到了新的工作崗位上去迎接與完成新的歷史任務。由於客觀形勢的急速發展，而有些革命幹部的思想認識却落後於現實，不能完全把握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來進行工作，因而也就不能使自己的努力收得應有的效果，有時甚至由於認識的錯誤而損害了革命利益；爲了糾正這種現象，毛主席特地把「實踐論」重新發表，使大家都能提高思想水平，及時掌握客觀情況的變化，隨時使自己的思想符合於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求得正確的認識。毛主席的「實踐論」，是思想方法的最高準則，是我們學習和工作的指南針。新的時代中帶來了新的歷史任務，因而也就必然產生新的問題，毛主席的「實踐論」，指示給我們以奮鬥的方向，它號召全國的革命力量均該端正自己的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以便迎接新的歷史時期，使過去歷史上所犯的許多錯誤不致再重覆，使得革命幹部在工作崗位上能够處處從實際出發，規定工作方針，同時又能認眞學習理論，以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並檢查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於客觀情況，以便迎接這個迅速發展的新時代。因此，毛主席發表「實踐論」，就是要號召全國人民首先要檢查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這就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提出「實踐論」而現在又重新發表的客觀根據。

二 「實踐論」的基本觀點

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我們天天說着理論與實際結合，究竟怎樣結合呢？毛主席在「實踐論」裡，便作了詳盡的分析，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統一，和中國思想史上的知行問題，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知道在中國思想史上，對於知行關係，向來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究竟知先還是行先？知難還是行難？有人說「知易行難」，有人主張「知難行易」，另外有人又主張「知行合一」。這三派思潮，彼此爭論了幾千年，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現在我們說的「理論」與「實踐」與這些說法有本質的區別，因爲他們都是脫離了當時的社會條件，不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方法去認識問題，只去抽象的討論知行關係，所以永遠得不到結果。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難」「易」，同樣的事情，今天行起來難，明天行起來便容易，此地困難，彼地可能容易，這個階級感到困難，那個階級便覺得容易，一切必須依據現實的條件來考察，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我們說的「理論」「實踐」，決不等於他們說的「知」「行」，我們所說的理論是指比較高級的、帶有系統性的，能够反映客觀事物規律的東西，實踐是指的一切革命活動和社會活動（包括生產活動、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同時「理論與實踐統一」，也不等於「知行合一」，它不是將理論與實踐加起來，而是辯證性的統一。「實踐論」的理論水準，超過了一切知行關係的解說，現在我們學習「實踐論」，必須一方面總結歷史的經驗，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認識，不要停留在「老一套」的方法上，有些人還在用「知行」的方法學習「實踐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是有機的，爲了方便起見，我們分四個要點來說明：

一、認識從那裡來？毛主席回答：認識由實踐中來。因爲眞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人們可以這樣和那樣的認識事物，

然而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卽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及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所以認識起源於實踐，實踐是認識的基礎。過去有些人以爲認識是先天存在的，他們不承認認識由實踐中來，一切唯心論者都是這種說法，康德的先天觀念論便是代表。毛主席在「實踐論」裡，批判了這種認識的錯誤，肯定的說：沒有實踐，便沒有認識。例如米邱林學說的認識，卽生物在發展過程中 ，經過環境條件的影響，特別是遠種雜交，能够產生新的特性，遺傳性和獲得性相綜合可以產生新種的科學知識，並不是米邱林空想出來的，而是他經過了六十年的實踐，在實驗裡，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才得到很多的成功，才創造了一百五十多種新的植物。這樣便發生了認識，將認識體系化，便成爲學說。又如米邱林的學生李森柯創造了『沒有不可變的遺傳質，在質的方面改變了，生活條件必然引起生物機體的一定變化』，現在已定論爲科學，這種認識，就是所謂階段發育論或分期發育論，也不是李森柯先天就知道，而是他在幾十年的實踐內，經過無數次的試驗，知道了「生長」與「發育」兩個階段不同的性質：在生長時期只是數量或體積的增加，到發育時期則已起質的變化，任何植物，大體上都可分成這兩個階段，如果滿足其特定需要，便可產生新植物。如他以春化作用試驗小麥便是這樣成功的，因此過去不可能產生的新種，現在產生了 ，由於米邱林、李森柯學說的試驗成功，大大提高了農業收穫和品種的改良，才給了孟德爾、莫爾甘及馬爾摩斯等荒謬學說以致命的打擊。這種認識，都是由實踐中得出，而不是從空想中得來的。再就中國革命的特點來說，『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這個眞理，不是毛主席、斯大林空想出來，而是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經驗總結，因爲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民主傳統異常薄弱，被壓迫人民任何一個小的反抗，都遭受了統治階級的武裝鎭壓，這樣便敎訓了我們：如果沒有武裝，便不能堅持革命，只有革命武裝，才能抵抗和消滅反革命武裝，才能將革命引導到勝利，它完全符合中國的社會情況，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優點。正因它是由幾千年來無數次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所以就成爲科學認識。又如我們現在常說的『對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個眞理，也是由實踐中得出來的。我們得到這個認識，曾經付出了很多的代價，如過去有些解放區對反革命採取仁慈觀點，但一到革命勢力轉移陣地，國民黨軍隊反攻時，地主惡霸還鄉團等 ，却採取極其殘暴的手段來對待革命。法國巴黎公社也是這樣，開始革命對反革命講仁慈，但到反革命反攻時，却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對待人民。在人類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痛苦經驗，在魯迅作品裡，就曾寫出了這樣的主題，例如徐錫麟、秋瑾等革命黨被滿清政府所屠殺，後來徐錫麟、秋瑾的同志王金發等取得了政權，很輕易地釋放了慘殺秋瑾的劊子手，可是一到革命黨失敗——被釋放的劊子手立刻用無情手段慘殺王金發等 。魯迅根據自己的許多觀察和經驗，所以他堅決主張打落水狗，因爲反革命雖然一時成了落水狗，如果不打死它、萬一讓它爬起來，就會咬死我們。因此，我們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證革命運動繼續前進，就得堅決鎭壓反革命分子。由以上的舉例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認識從實踐中產生，人類如果沒有社會實踐，就不會有認識。

二、從實際中得到認識，但要使認識有效的服務於實踐，還必須使認識符合於實踐的具體對象，因爲時間在前進，環境在變動，我們的認識也不能停留在原來的階段，還必須使它跟着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卽隨時隨地符合於具體環境中的客觀對象。例如米邱林、李森柯學說這個眞理，只是在他當時的生活環境（氣候、土壤、雨水、耕作方法）中得出的認識，如果換到另一個環境，就必須靈活運用。假使我們不注意到這一點，卽不問具體對象，只知生硬的搬弄米邱林、李森柯學說，實行盲目接交，用高粱接高粱，用穀子接穀子，用向日葵接辣椒，那就會遭受失敗，因爲不會使自己的認識內容，符合於客觀事物的眞象及其規律性。所以死板的抄襲，便違背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原則。又如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只有把它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變爲中國人民的有用武器。如果不具體估計自己民族國家的歷史特點和現實情況，一味生硬的搬用，就會變成敎條主義者。因此列寧曾着重指出：『我們的學說不是敎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這樣說。他們（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很公平的譏笑那些背誦和簡單重複「公式」的行爲，因爲這種「公式」最多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的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環境而改變其形態的。必須領會那不容置辯的眞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實際中的確定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着昨天的理論』。

三、由實踐中得來的認識，要看它是否眞理，還需自己經過實踐和考驗來證明，只有經過實踐證明的眞理才是眞正的眞理，因爲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尺度。譬如革命剛剛勝利，我們由農村進入城市，提出「一切工作必須依靠工

人階級」，開始有許多人不相信，他們不了解：（一）過去在農村，現在已轉入城市；（二）城市解放，中國要工業化，以後工人增加農民減少的歷史方向。現在經過兩年多的考驗，已證明了『所有工作，必須依靠工人階級才能搞好』的眞理，相信的人一天天增加了。又如去年九月，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後來因朝鮮人民軍力量來不及補充，結果被其侵過三八線，引起國際極大震動。在中國便面臨着這樣一個考驗：如何應付這件事情。如果應付得當，不但可以挽救朝鮮人民，而且可以影響世界的局勢。我們知道，美帝國主義在仁川登陸的時候，不但城市裡的反革命分子躍躍欲試，就是偏僻的農村，有的地主竟向農民索回已經沒收分配了的土地，反革命氣燄高漲。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當然不能置之不理。當時，有些人不了解，甚至反對，他們說我們現在要和平建設，何必管人家的事情？我們如果不去援朝，美帝國主義也許不會侵略我們，但是如果去幫助朝鮮人民對美帝國主義作戰時，便會將自己捲入戰爭漩渦裡去了。但是客觀事實的發展，正與他們所想的相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正是爲了侵略中國，我們去援助朝鮮人民，不但可以保家衛國，還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在事實已證明志願軍援朝是保家衛國的最好辦法，可以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增加和平力量，穩定中國和世界的局勢。這是因爲我們正確估計了敵友我眞實情況，所得到的科學認識。這個認識，經過了七個月來的實踐，已變爲全國人民的正確認識，但開始時是有些人懷疑和反對的。

四、認識從實踐產生，同時又經過調查、研究、實踐所證明，這個理論就可指導現實，指導實踐。有人問：實踐高於一切，爲什麼還要受理論的指導？我們如果在實踐時要達到更好的效果，想不犯或少犯錯誤，就必須受理論的指導。因爲理論即是實踐的概括，而且概括之後又經過實踐的證明，因此就有指導實踐的偉大作用，而且新的實踐必須接受這種理論的指導，才不致喪失前途和迷亂方向，否則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又說：『只有爲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的作用』。理論的可貴處，就在於它可以指導我們的行動。這樣便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但它決不是什麼「知行合一」，它比過去的知行學說進步多了。

把以上的四個要點綜合起來，就是馬列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觀點，它是有機的構成，而以實踐爲基礎，這也正是毛主席闡述和發展馬列主義的認識論，而以實踐論爲命題的用意所在。

三　認識的過程

從實踐到產生理論，必須經過一定過程，並不是說所有實踐都能產生理論，而從實踐產生理論這個過程，也就是探索眞理的過程。毛主席把這個過程分爲兩部分，即兩個階段：當我們開始接觸事物時，感到有這個事物的存在，這是屬於感覺的階段，這是基礎，若根本沒有這個事物，眞實感覺即無從產生，自然更談不到認識。唯心論者否認這個說法，認爲沒有客觀事物，也可產生感覺，這顯然是架空之論，不過是把錯覺或幻覺當作感覺罷了。唯心論者又認爲理論可以獨立產生，無須依靠感覺，因而出現了唯理論。這種唯理論等於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所以不能成爲科學。但認識只停留於感覺階段，也不能成爲科學理論。必須進到第二階段，將這些感觸材料加以整理，經過判斷推理的過程，將感覺提高，使其條理化，這便是認識論的辯證法。經驗主義者就是不能將經驗條理化，使認識停留在感性階段，甚至將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眞理，所以常常會碰壁。毛主席說：認識若不能提高，則決不能成爲完整的理論，停留在感性階段上是很危險的。因爲它只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表象，而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例如有人聽說美國有原子彈，看到美國的新式武器，便產生了「恐美病」，這就是因爲只看到局部表象，沒有看到事物本質的緣故。如果我們的認識不停留在感性階段，而能進一步發展到理性階段，那我們就必須追問究竟美國有多少原子彈？原子彈究竟有多少大的威力？而這個威力又在何種條件下才會發生作用？由此再研究出美國內部究竟有些什麼矛盾？帝國主義之間又有些什麼矛盾？以及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侵略陣營力量的對比，那我們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不但不應該害怕美帝國主義，而且還應該鄙視它，因爲它不過是一隻紙老虎，遲早要被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打倒。這是認識的必經過程，任何事物都是如此。

上面把認識的過程，分成感性和理性兩個階段來說明，只是很概略的分法，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要想求得更深刻的了解，那就必須把它展開來討論。第一步依然是感覺，亦即我們開始接觸外界事物，屬於感覺的階段。這是人類認識的最初形態，是客觀事物在感覺器官裡的反映，一切眞正的知識，都把人類感覺中的物質的反映作爲不斷的源泉，因爲人類的一切認識，都由感覺開始。如果根本沒有這個客觀事物，那就說不到反映，說不到感覺，當然更說

不到認識。有了客觀事物的存在，並且反映到人類的感覺器官，成了感覺，進一步就會成爲表象或印象，再由表象變成概念，這就給了我們以把握對象的可能，因爲由表象到概念，這就是表示客觀事物已經捨棄了個別形態，進到一般的抽象，而科學的抽象，乃是把握客觀事物本質的最初關鍵。但是，如果我們的認識只到概念爲止，那還不能眞正把握到對象。有了抽象的概念，還必須加以判斷和推理，只有經過判斷和推理，才能使我們的認識由形式到內容，由表象到本質。再經過分析和綜合，經過歸納和演繹，就能找出事物的特性和規律，使經驗上升到理論。

如果大家覺得上面的一番話還太抽象，那就不妨舉出實例來說明：現在假使有一個客人到我們這裡來參觀，看見我們幾千多人都聚集在這裡，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們在這裡集會，但不知道我們究竟在這裡開什麽會，乃做進一步的觀察，發現我們這裡裝着擴音器，有一個人在講話，大家都在靜聽，旁邊還有人在錄音，於是得到一個印象，原來大家是在聽報告，這就進到概念階段。這位客人如果不願滿足於抽象的概念，就要進行調查研究，搜集材料，加以科學判斷，這才明白了我們原來是在舉行報告「實踐論」的政治講座。可見經過判斷階段，就逐漸認識到了事物的內容，而不再停留於抽象的概念。可是如果認識的過程只到此爲止，那還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和事物的規律，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科學推理，追究我們爲什麽要在這個時候學習「實踐論」，於是再進行調查研究，向我們索閱學習計劃之類，這才發現我們原來是要把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並以「實踐論」作爲思想武器，來推動改進和提高我們的教學工作。如果他對於這個內容和方針還有所懷疑，那就應該進行具體分析，查明今天到會的有那些院系的學生和老師，再由分析進到綜合，這就得到了更明確的結論和認識，即到會的聽衆雖然有各種院系的不同，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提高思想水平，端正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求更有效的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這就非努力學習「實踐論」不可。由此再擴大範圍去了解全國的學習情況，經過歸納和演繹，就可進一步認識到學習「實踐論」的重大意義，因而也就把握到了這個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如果有人認爲這個例子還不够充分表現認識的過程，那就不妨再舉一個實例來補充說明。譬如有一個土地改革訪問團來到某縣某鄉某村，看見在一個廣場上聚集了很多羣衆，第一個感覺當然也是集會，再觀察到會羣衆的情緒都非常憤慨，這就發生了和上述不同的印象，並看到許多農民羣衆紛紛起來揭發地主惡霸的罪狀，於是就得到一個「控訴鬥爭大會」的概念。有了這個感覺套概念做基礎，再進一步搜集材料，經過判斷和推理，這才知道要消滅封建勢力，必須堅決實行土地改革，而要有效完成土地改革，就必須動員廣大農民羣衆起來對地主惡霸進行控訴鬥爭，而不能採取和平分田的辦法，因爲如果不經過控訴鬥爭，打倒地主惡霸，廣大農民羣衆就不能翻身。於是再經過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就可以得出『土地改革是一系列階級鬥爭』的正確結論，而找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上述認識過程，有一個共同基礎，那就是羣衆集會，如果根本沒有這個事實，當然不會有集會的感覺和其他一連串的認識，可見實踐和感覺，乃是認識的基礎，而判斷、推理、分析、歸納等，則是認識的完成。

四　認識的任務和發展

我們所以需要認識，其目的在於通過認識的過程，發現客觀事物對象的本質和規律，並據以能動的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以及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係。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作爲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之反映的人類知識，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較多的方面。人們不容易完全把握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一方面因爲人類認識能力要受生產水準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另方面因爲客觀事物本身永遠是在變動和發展中。我們必須儘量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並且根據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來規定自己的工作方案和計劃（包括學習計劃），在實踐中去求貫澈和實現。然而由於上述原因，我們一方面必須堅持眞理，同時又要善於在實踐中，發現錯誤和改正錯誤，做到『吃一塹、長一智』，不要讓自己的思想離開實踐，不要被歷史車輪拋出軌道；同時也不要把主觀幻想當作眞理，不要離開當前的現實性。尤其當客觀形勢發生急速變化時，更要懂得把握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實踐論」就是指導我們如何把握客觀規律的鎖鑰。

『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可見認識的基礎和關鍵在實踐，而其目的則爲了指導實踐和發展眞理。在實踐中可以發現相對眞理，也可發現絕對眞理，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爲在到達絕對眞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各個一定發展

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能具有相對的眞理性，無數相對眞理的總和，就是絕對眞理。相對論者或相對主義者不承認有絕對眞理，只承認有相對眞理；而絕對主義者則否認眞理的相對性，把一切都絕對化。教條主義者把抽象的教條到處搬弄，不問時間、地點與條件，要到處都照原封原樣實行，結果當然要碰壁，這是絕對主義的一種表現。經驗主義者誤認局部經驗爲普遍眞理，也不問時間、地點與條件，不去分析具體情況，只知道原封原樣搬弄自己一點一滴的經驗，滿足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結果當然也會壞事，這是絕對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客觀事物存在着相對眞理，也存在着絕對眞理，我們必須通過無數相對眞理的實踐，才能逐漸接近和把握絕對眞理，所以相對眞理是到達絕對眞理的階梯。

一切科學上的發明，都要受歷史、社會、生產等條件的影響和限制，發明之後還可發明，改進之後還可改進，所以只有相對的意義；但以科學和迷信相比，科學卻是絕對眞理，不能說科學只有一部分正確，迷信也有一部分正確，可以把科學的地盤讓一部分給迷信，那樣就等於糟塌科學。又如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被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這可說是絕對眞理，那些宣揚美國例外論的叛徒，正表明他自己沒有一點社會發展史的常識；但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必須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卻是相對眞理，同時在這個相對眞理中，就包含有絕對眞理的種子。又如一切科學工作者必須堅決擺脫唯心論宇宙觀和形式主義思想方法的統治，接受辯證法唯物論的指導，才有發展的前途，才能使科學眞正爲人民服務和指導實踐，這是絕對眞理；但有些自然科學工作者由於受到米邱林和李森柯學說改造自然的影響和感動，因而認識到魏斯曼、孟德爾學說的錯誤，並進一步認識了唯心論與形式主義的錯誤，接受辯證法唯物論的指導，另外有些科學工作者則由於其他的原因，比如說，由於學習了「實踐論」而改造自己的宇宙觀和思想方法，卻只有相對眞理的意義，同時在這種相對眞理中，也就包含有絕對眞理的種子和因素。客觀事物存在有相對眞理，也存在着絕對眞理，我們必須通過無數相對眞理的具體實踐，才能逐漸接近和把握絕對眞理，這就是我們對於眞理的科學的態度。

毛主席的「實踐論」，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眞理觀，指出我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認識，認識指導我們再實踐，經過再實踐又提高了我們的認識，由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例如我們的原始祖先在求生的奮鬥中，發現了植物種子可以生長，發育和結實，經過耕種實踐，就有了初期農業，根據這個認識再實踐，逐漸改良了耕作方法和品種，提高了認識，推動了農業的發展，經過無數自然與社會的變革，通過了米邱林李森柯的實踐，出現了農業生物的新認識，就給生物科學開闢了無限發展的前途。又如古代人類由於在生產活動中無數次接觸自然的結果，發現了直觀的唯物論，這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形式的唯物論，它還不能說明思惟對於物質的關係，但也多少有了一點指導實踐的作用；另外有些人由於同樣或類似的原因，發現了原始樸素的辯證法，又轉而服務於實踐。經過無數次的再實踐，唯物論與辯證法走到分離與發展的途徑，辯證法成了唯心論辯證法，唯物論成爲機械唯物論，又通過自然與社會的變革實踐，才由馬克思恩格斯把它們改造成爲辯證法唯物論，因而大大提高了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經過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等的偉大實踐和運用，辯證法唯物論又有了新發展，並因此開闢了指導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新方向，而「實踐論」就是這種主要發展的里程碑。

蘇聯「哲學雜誌」刊文闡述毛澤東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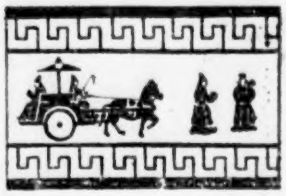
最近出版的蘇聯「哲學問題」雜誌發表了蘇聯哲學碩士楊興順所撰「辯証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的論文，文長萬餘言，對毛澤東思想有所闡述。

美英兩國共產黨雜誌刊載「實踐論」譯文

美國共產黨理論月刊政治問題四月號，登載了毛主席的「實踐論」的譯文。英國共產黨勞動月刊，也登載這篇重要論文的譯文。

泰國雜誌譯載「實踐論」全文

毛主席的「實踐論」，已譯成泰文，泰文雜誌文訊六月號刊載了「實踐論」的譯文。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

郭沫若

范文瀾先生說西周是封建社會，近在「關于中國通史簡編」（新建設四卷二期）的檢討中揭出了「一點最簡單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代史的學者們來討論一下。同時也還想附帶着討論一下其他的問題。

一　關於人殉的徵引

范先生很重視地下發掘，注意到安陽所發掘的商墓，「一個國王死了，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而「考古學者發掘了一百五六十個周墓，僅僅發現三個墓葬裡共有六個殉葬人」。以這作爲重要根據，證明商周社會制度的不同。我覺得這首先就值得討論。

安陽的商墓是商代帝王的墓，考古學者所發掘的「周墓」並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二者單位不同，不能相比。單位不同，不說「一百五六十個」，即使是一萬五六千個也不能相比。商墓的發掘只是十幾年前的事，其前關於商代殉葬的情形古書上毫無記載。今天西周帝王的墓一直沒有發現過，假使將來發現了，同樣驚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們今天還不能斷定它絕對不會有。

周代的殉葬情形，墨子節葬篇裡有幾句話說得很扼要：「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孫詒讓以爲「天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墨子已是戰國初年的人，當時的諸侯已經儼然天子，而當時的天子已經淪落到成爲附庸，天子下不加諸侯二字倒似乎是具有用意的。這確是一項很重要的資料，這就證明在戰國初年都還有這樣殘酷的殺殉制度存在。

在歷史發展中，在同一單位上來說，殉葬人數的多寡，並不能作爲奴隸制的盛衰或有無的根據。照嚴密的辨證邏輯講來，倒應該是反比。生產未發達，人的使用價値未被重視之前，人是多多當成犧牲使用的，犧牲就是死的牛馬。生產逐漸發達，人的使用價値被重視了，人是要多多當成奴隸使用的，奴隸就是活的牛馬。故商王墓殉葬的人多，可以證明商代是有奴隸存在，但只可作爲奴隸制的初期，而不能作爲最盛期或終期。

大抵人殉制，在春秋中葉以後便開始被人反對了。秦穆公殺殉一百七十七人，把秦國的三良也一並殺了，所以「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這似乎是開始反對殉葬的一例。范先生說：「經書記載殉葬事，詩經秦風有一條，左傳有兩條（昭公十三年一條不計在內）（註一），禮記有兩條，都是認爲『非禮』而予以反對。例如左傳（宣十五年）記晉卿魏武子將死，囑咐他的兒子魏顆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顆不聽，說這是『亂命』。又如禮記（檀弓篇）陳乾昔將死，要求兄弟和兒子尊重他願望，給他造一口大棺材，讓兩個寵婢夾着他。兒子說，殉葬非禮，不能那樣做。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種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兒子也決不敢反對制度」。這些「經書」上的材料，都是春秋時代的事，反對人殉的共有這麼幾條。這倒適足以證明社會內在矛盾在逐漸發展，不成問題的人殉制在開始成爲問題了。所以有反對人殉制的這些少數的例子存在，倒正足以證明人殉制在當時還有很大的束縛力量。

馬克思告訴我們，在考察社會制度變革的時候，一定要經常注意辨別實際的事實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張，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註二）革命的意識照例是發生在革命的實際之前的，假使我們看到有某種變革的意識便斷定已經有這種變革的實際，那就會犯錯誤了。

如果我們能說：「春秋時代有以人殉爲『非禮』者，故周朝沒有人殉制度

（註一）沫若案：定公三年邾莊公死「初葬以車五乘，殉五人，」亦未計算在內。

（註二）見「政治經濟批判」的序，此述其大意。

」，那麼我們也可以仿照着這樣說：「美國的共產黨員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故美國向來沒有資本主義制度，或美國已經廢除了帝國主義」。我們可以這樣說嗎？當然不可以。

有了制度，死者才可以根據制度以「提出要求」。但在制度已經開始動搖時，儘可以有保守的父親和進步的兒子。保守的父親雖然根據落後的制度「提出要求」，而進步的兒子卻可根據進步的理論（意識形態）以「反對制度」。這樣的事實就在今天也不缺乏。因此，范先生的論斷，我覺得不很妥當，那是有點近於「以意識決定存在」了。

范先生又提到孔子反對用俑的故事。

「孟子引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專講周禮，連俑都反對，足見周朝廢除了用人殉葬制度」。

這話也有問題。首先在引用上有小小的文法上的疏忽。「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孔子的話。「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是孟子的解釋。孔子這番話，又見于禮記檀弓篇：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近）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近）于用人乎哉！」

「爲俑者不仁」，就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傳聞異辭。關于這個問題，我從前曾經考慮過。我認爲芻靈與俑之用先于用人殉。所謂「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大抵在奴隸社會以前是用稻草人爲殉，手工業進步後才開始用土木偶。過渡到奴隸社會，奴隸領主們對土木偶不能滿足，便率性用人爲殉了。孔子反對人殉，故溯其根源，反對「始作俑者」。

陳家康同志有另一種解釋。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時，他說用人殉是貴族才有資格的，一般的士庶人大抵就用俑。孔子連用俑都反對，不用說對于用人是更反對了。家康同志這個意見，我覺得也很有道理，可以補充我的舊說。

假使范先生能同意我們這樣解釋（無論是我的或家康的），那末，「足見周朝廢除了用人殉葬制度」的結論，便須得加以考慮。

周朝並沒有廢除用人殉葬制度，由上引墨子節葬篇文與其它文獻上的記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豈止周代，連秦始皇死後的驪山陵，人殉多到不可計算，都是有歷史記錄的。中國的考古發掘還在萌芽時期，還不好輕易下出結論。問題還很多，還待我們繼續研究。一個人的力量也有限，也還須得靠大家的力量來共同研究。

范先生徵引到「聯共黨史」的規定，以能自由屠殺與否來判定奴隸與農奴。那規定是正確的，但范先生的運用卻不很正確。把視野專一放在人殉問題上，認爲「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於此」，這應該是一種偏差吧？奴隸制度是最殘酷的一種制度，封建制度要比它仁慈得多。假如周秦確是初期封建社會，那末當然的結論是周比商仁慈，秦比周更仁慈了。事實是這樣嗎？除開人殉制度之外，我可以舉出幾個殘酷的例子。

秦將武安君白起在長平把趙國打敗了，阬殺趙降卒四十萬人于長平，只剩下「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見史記白起傳。）

楚霸王項羽把秦將章邯打敗了，章邯投降了，項羽把秦降卒二十餘萬人阬殺在新安城南。這些降卒，事實上是修阿房宮的一些奴隸。項羽還有一項德政，是他把同時起兵的齊王田榮打敗了，「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這兒的阬殺沒有寫出數目字，恐怕也不下于一二十萬吧。（以上均見史記項羽本紀。）

這些所屠殺的俘虜雖然不是奴隸，可以說是奴隸的前身。此外，專殺奴隸的事，直到漢武帝時都還存在。董仲舒上書，主張「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見漢書食貨志，服虔注云「不得專殺奴婢也」。）漢武帝時都還存在着的惡習，要說西周初年便已經廢除了，那是說不過去的。我們是以辨證唯物主義來研究歷史的人，要從全面來看問題，從發展來看問題，才能夠得到正當的結論。

二　關於詩經的徵引

范先生也很尊重詩經，認爲「從來無人懷疑」。但其實詩經是很可以「懷疑」的。雖然不能說是「後人僞造」，但必然是經過後人修改潤色，整齊劃一過的東西。例如從時代來講，從周初至春秋末年，有五六百年之久；從地域來講，從黃河流域至長江流域，包含着十幾二十個國家；從作者來講，國風取自各國民間，雅頌取自朝廷貴族；但詩的體裁大體上是一致的，用韻也是一致的，而在國風中竟找不到一些民間方言。請把楚辭和詩經一比，更可以使我們增加疑問。楚辭（漢人作品除外）是楚國一國，少數人的作品，用韻雖然一致

，而體裁便有不少的變化：離騷與招魂不同，九歌與九章有別。地方色彩的濃重，民間方言的衆多，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把這兩者一對比，便可以看出詩經的問題了。詩經毫無疑問是經過刪改的。古人說「孔子刪詩」，我看不單純是孔子一人，那是經過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刪改和琢磨的。假使范先生能够承認這個見解，那末我們便可肯定地說：詩經是不能够予以全面信賴的。經過刪改的東西，必然要帶上刪改者的主觀意識和時代色彩。因此，詩經的引用，便必須經過嚴密的批判。

其次還有解釋上的問題。這似乎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但也並不是漫無標準。標準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據盡可能的資料，把當時的社會性質弄清楚了，一首詩才能够得到正確的解釋。

但是如像范先生對于所引詩經的解釋，却是很難令人同意的。例如說：

「詩經周頌載芟篇說農夫帶着家裡人去耕公田（「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良耜篇描寫農夫給封建領主耕地，互相開玩笑說：『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譯意爲：『你老婆快來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好米飯給你吃』。西周初年，天子慰勞農夫給陳米飯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註三）又「曾孫乘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這裡說的黍米飯，當然是農夫自備，載芟良耜兩詩，說明當時農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飯，而且有頗高的勞動興趣。」

載芟和良耜兩詩，可以同意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我們怎麼就能知道：「婦」是農夫「家裡人」？農夫是在「給封建領主耕地」？「或」（有人）就是「老婆」？「黍」就是「好米飯」？這好米飯就「當然是農夫自備」？「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引自小雅甫田篇，「曾孫來止，以其婦子」等句，同見甫田篇與大田篇，但那兩篇詩卻不屬於「西周初年」了。這層且作別論。我們現在姑且承認兩詩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曾孫」也服從鄭玄的解釋承認爲周成王。那末，周成王都還在給農人吃「陳米飯」，良耜篇的「老婆」怎麼就能「自備」起「好米飯」來了呢？周成王是帶着「婦子」去「饁彼南畝」的，載芟篇的「有嗿其饁，思媚其婦」的「婦」是不是可以解釋爲這「婦子」之「婦」呢？（註四）

其實「殷周之盛」的情形，農民生活的實際，在漢書食貨志裡敘述得很明白。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

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這雖然不見於先秦文獻，但班固去古未遠，當有根據。漢書藝文志有農家者流九家，百一十四篇，到了隋書經籍志便只剩下「氾勝之書二卷」一家。氾勝之是漢成帝時人，先秦農家言是完全散失了。

照班固所說的情形，「殷周之盛」的所謂「民」，不完全是奴隷嗎？這些「民」是聚居在有人監管着的共同宿處的，春耕時，白天被集體地趕到田野裡去，早出晚歸。一出一入都有里胥和鄰長，就跟哼哈二將一樣，在共同宿處的門口坐着監視。所謂「婦人」，連冬天做工，每天都是十八小時。男人呢？沒有說，當然不會是整天睡覺的。豳風七月篇裡面有幾句話可作補充，便是「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工。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這些收穫完畢了的農夫們，冬天來了又要服工役，白天在做工，晚上也在搓繩子，我相信工作時間是不會少於十八小時的。有沒有監工的呢？有，一天到晚都在吆喝着。月令季春三月裡面又有幾句可以補充：「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監工的手裡有沒有鞭子呢？沒有寫，但我相信不會是沒有的。

這就是「殷周之盛」，農夫們一年四季，一天到晚的生活情形。

范先生說「農夫有頗高的勞動興趣」，照詩面上看來，好像是那樣。但可惜那些詩並不是農夫們自己做的，而是周家的宫吏歌功頌德，而且拿來祭祖宗的頌歌呵！

范先生又說：

「周頌臣工篇『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譯意爲：『命令我的

（註三）范文「農人」誤爲「農夫」，當係筆誤。但新建設，人民教育，科學通報，凡登載范文之刊物均相沿未改。

（註四）古時天子之妻亦稱婦。卜辭武丁多妻，均稱「婦某」。周初的彝銘亦有「婦子後人永享」之語。

農夫們準備你們的耕具還要多準備些割器』。顯而易見到公田服役的農夫，要自備生產工具。『資本論』勞動地租篇說農奴制與奴隸制的基本區別點是『奴隸是用他人所有的生產條件』，農奴除給地主服役耕種外，自己還有一點土地和勞動工具（大田篇臣工篇正說明周初農夫有一點土地和勞動工具）。周頌中所表現的生產方式，應該是周初的主要生產方式，從周頌看來，當時在公田上勞動的人主要是農奴而不是奴隸。這不是說周朝沒有奴隸存在，相反，奴隸數量還是很大的，不過不是主要的生產者了。」

這論證也不十分嚴密。臣工篇的那幾句話，是國王對田官們講的。「命我衆人，庤乃錢鎛」，「乃」字指田官們，是說「叫農人們調整好田官們所管理的耕具。」假如把「乃」字（你的或你們的）換成「其」字（他的或他們的），那倒還容易看出是農夫們有了生產工具。但就是那樣，也還不能斷定，究竟是私有，還是享有。譬如我們今天說，「每一位士兵有一桿鎗」，這並不是說每一位士兵都有自備的武器。又譬如我們向士兵們說：「調整你們的武器吧」，也並不能證明那武器是士兵自備的。故僅僅根據臣工篇那幾句話，我們還不能看出「到公田服役的農夫，要自備工具」。

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們做的詩，而不是農夫們做的。（凡是大小雅裡的詩都是採自貴族階層的。）所以，那詩中的「我」字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指農民。詩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做詩的這位田官有了私田，並不是說農民有了私田。準此，我們如果說「大田篇臣工篇正說明周初農夫有一點土地和勞動工具」，那是值得考慮的。由這種說法，而斷定「在公田上勞動的人主要是農奴而不是奴隸，」「周朝很大的奴隸數量不是主要的生產者」，更是值得考慮的。

所以詩經儘管「從來無人懷疑」，但問題實在很多。材料的純粹性有問題，每一詩的時代有問題，每一詩的解釋，甚至一句一字的解釋都可以有問題。我不是要全部否定詩經，而是不同意對詩經的全部肯定與隨意解釋。批判要嚴密，解釋要謹慎，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於詩經乃至一般史料所必備的基本態度。

范先生教導我們：「遠在紀元前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已進化到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歷史的極大光榮事件」，要我們「引以自豪」。是的，只要證據確鑿，確實證明周代是封建社會，我是決不敢汚衊我們祖先的「光榮」的。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幾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隨時在補充我的舊說，改正我的舊說。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認爲這是應該的。人有錯誤是經常的事，錯誤能够及時改正，並不是恥辱。但直到今天爲止，據我所接觸到的全部資料看來，我始終不能同意「周代是封建社會」。

文獻上的材料是絕對不够的，必須仰仗於地下發掘。范先生近來也在重視地下發掘了，這是很好的事。但中國的地下發掘，還僅在萌芽狀態。以前從事發掘的人也沒有經過馬列主義的訓練，因此如像殷墟所發掘的人殉情形，發掘者便根本沒有把它當成問題。關於這些方面，我們應該做的工作還很多，將來必然會有更豐富的材料從地底湧現出來。養成掌握材料的犀利的批判能力，在目前也就是很重要的事了。一時還得不到結論，我看倒無須乎着急，只要證據充分了，「中國歷史的極大光榮事件」是永遠存在着，不會被湮沒的。

三　關於古代社會的早熟性

在這裡我想附帶着討論一下嵇文甫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早熟性」（新建設四卷一期）這個問題。

嵇先生說：「東方諸國的歷史發展，比起西方來，顯然帶有早熟性。東方的文明則來得較早，……不像西方那樣，大開大合的，從這一階段一直發展到頂點，然後崩潰下去，轉入另一個階段，程序清清楚楚，前後截然兩樣；恰好相反，它（案指「東方諸國的歷史發展」）是在原始階段中早已奴隸化，在奴隸階段中早已封建化」。這見解相當新鮮，但我覺得似乎也「早熟」了一點。

其實社會發展過程，任何民族，無論西方東方，都沒有那樣「大開大合，程序清清楚楚，前後截然兩樣」的事。它總是在前一階段中便孕育着後一階段，在後一階段中也始終有前一階段的殘餘。馬克思和恩格斯出現以前，西方歷史也和我們東方一樣是一團渾沌，就在今天保守的甚至反動的歷史學家們也還不肯同意馬恩學說。我們東方呢？——「東方諸國」還不敢說，就單拿咱們中國來說吧。咱們用馬恩學說來整理歷史還不到三十年，立刻便想把渾沌鑿死是還不能够辦到的。我們因爲材料不够和認識不足，所以還「不容易劃分階段而聚訟不決」。但我們不能因爲今天的「不容易劃分階段而聚訟不決」，便因而斷言中國歷史發展本身本來是「渾融而曖昧」（簡切地說就是「渾沌」）而巧立出一個「早熟性」的假說出來。這樣，我認爲是取消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人類歷史發展具有一般的規律性，而各個民族的各個階段也具有各自的

特殊性，這是事實。不僅社會發展是這樣，就是一般自然現象的發展也無一不是這樣。特別是在受着劇烈的外來影響的時候，這種特殊性會來得特別强烈。但儘管那樣，一般的規律總是不能含混的。

我們今天旣承認了馬克思學說是眞理，社會發展可以劃分爲五個時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特別在我們中國的古代是沒有受到什麼强烈的外來影響的，不像在秦漢以後我們遭受過幾次大規模的外來侵略——五胡亂華以至南北朝分立，遼金元時代，淸代，和最近一百年來的外來資本主義控制時代。秦漢以前，我們中國社會是在自然發展的條件中發展了來，因此要作古代社會的研究，中國古代應該是最好的標本。假使經過仔細周到的研究，而中國的古代發展和馬克思的學說不盡相符，那便可能是馬克思學說有欠妥當的地方。但我們今天能够這樣說嗎？不能够。爲什麼不能够？是說馬克思學說是敎條，不敢違背嗎？不是，而是我們的研究根本就還不仔細，不周到。

要研究中國的古代，材料實在太少了，然而虛僞的材料却又不少，而且幾千年來的舊觀念也很不容易廓清，總是在那兒糾纏着。

就拿地下發掘的材料來說吧。中國有考古發掘的開始又才好幾年呢？殷墟甲骨是在庚子前一年（一八九九）才發現的，至於科學的發掘還僅僅有二十幾年的歷史，而關於人殉的情形一直到去年才開始被人注意了。試問，我們在二十年前乃至一二年前，能够像今天一樣，對於殷代社會的性質說得出一句比較有科學性的話嗎？那是不能够的。材料多了，而且得到正確的闡明，我們就能够說了。所以今天的還「不容易劃分階段而聚訟不決」，並不是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本來渾沌，而是由於咱們大家的頭腦還有點不澄清——材料不够分不清階段，有了材料也還不能正確掌握。因此，我認爲嵇先生的「早熟性」說是一「早熟」的，而且在本質上有取消馬克思學說的危險。

殷周的衆和衆人，周代的庶人和農夫乃至黎民和民或人鬲和鬲，據我所能够接觸到的資料看來，確實都是奴隸。嵇先生表示了部分的同意，但也提出了局部的否定。嵇先生引出了左列二條：

「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鴇羽）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酒誥）

嵇先生說「旣然『藝黍稷』，那便是所謂『農夫』或『農人』。然而他們的生活資料，乃至其父母的生活資料，却是由自己耕種出來的黍稷之類，而並不是由主人用粗惡陳腐東西喂養的。」

這是嵇先生演繹上的不周密。農夫或農人誠然是「藝黍稷」的，但「藝黍稷」的並不一定都是農夫或農人。殷代的帝王也在從事農業活動，嵇先生在文中都是提到了的。就是周文王吧，也在「卑服，即康（糠）功田功」（書經無逸篇）。我們只說過農夫農人在周是生產奴隸，並不曾說凡是「藝黍稷」的人都是奴隸。奴隸也是有類別，有等級的。例如今天的彝族社會裡面，相當於奴隸的「娃子」就有三種。有管家娃子，普通娃子，三灘娃子（管家娃子的娃子）。管家娃子是多少有些土地，甚至奴隸的。但管家娃子對領主的黑彝依然是奴隸。這些也須得注意。唐風鴇羽並不是農人做的詩，農人那有本領來做那樣的詩呢？所謂從王事就是做官，農人那有這樣的資格呢？酒誥是封康叔時，周公的誥辭，說話對象也不是農民。周公只是敎康叔要注意耕稼，學習他們的祖父周文王罷了。

因此，嵇先生的引證和論斷，並不能達到他所企圖的對於農人是奴隸說的局部的否定。

但嵇先生還有別的引證和論斷。引證的是左傳哀公二年左列一節：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接下去是論斷：

「『庶人』和『工商』並提，而與『人臣隸圉』分列。『免』者，免其爲奴隸也。『遂』者，得遂其自由也。可見『庶人』並非『奴隸』，但亦受某種限制而不得自由。若說是『農奴』倒很像，不過這已經是春秋末年的記載，或許和西周的情形有些不同也很難說。但無論如何，所謂『庶人』或『農夫』，至少不是嚴格意義的奴隸，却是很顯然的。」

這當從發展上來看。「庶人」從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地位和身價都已經不同了。「庶人」是「力於農穡」的（左傳襄公九年），在西周初年居于「人鬲」中的最下等，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銘有「錫汝（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證。但在春秋末年却生了變化。「庶人被提升到貴族或奴隸主之下，家內奴隸之上去了」（見「屈原研究」），這是我早在一九四二年說過的話。

「遂」字相當費解，我從前解爲「進級」，不十分妥當。嵇先生解爲「得遂其自由」，似乎更好。但「得遂其自由」與「免其爲奴隸」，其實是同樣的意思，不過「庶人工商」是生產奴隸，「人臣隸圉」是家內奴隸罷了。嵇先生

所說的「至少不至是嚴格意義的奴隸」，要看這「嚴格意義的奴隸」是怎樣解釋。假使是指家內奴隸的話，那我們根本就不會說過「庶人」或「農夫」是家內奴隸。嵇先生的引證，依然只是證明：在春秋末年生產奴隸因生產的發展而起了分化並提高了地位，而家內奴隸則降在人列的最下等去了，如此而已。

嵇先生似乎不十分習慣于從發展上來看問題，看到「庶民」的逐漸失去奴隸性質，而却混而化之，把歷史發展的結果倒懸起來，認爲「這種半農奴狀態的庶民階層，實際上乃是一種尚未澈底奴化或不成熟的變種的奴隸制度」。於是更進一步把殷周兩代打成一片渾沌，說道「卜辭中所謂『衆』或『衆人』，詩經中所謂『農夫』或『農人』，大概都屬于這一類型」。一個「大概」便含混了七八百年的歷史發展。這豈不是證明，並不是本來的歷史渾沌，而是咱們自己的認識有問題嗎？

我不否認中國社會發展的某種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卻堅決相信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發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絕對正確的。我們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經過了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而來的，證明馬克思學說確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雖然在今天，我們在劃分階段上還不能取得一致，那是由於我們所佔有的古代材料還不十分充分，也由于還須得有一段時間來等待大家的意識的澄清。拖延着不想找結論固然是要不得的；急急於想找出結論以求人爲的統一，那也會流于武斷。我自己不想拖延，也不敢武斷。二十年來不斷地在追求材料，也不斷地在澄清自己。我是堅决地相信：問題是總會要得到定論的，渾沌决不會永遠渾沌下去。

我的討論就想在這兒結束。我誠懇地等待着嚴格的批評。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

*　　*

補記——關於「生產工具」的說明

范先生的文章中有特別要我「考慮」的一小段如次，我想補充說明一下。

「主張西周是奴隸社會的歷史學者，其基本論據建立在『重要生產工具，以農業而言便是土地』這個原則上面，依據聯共黨史所昭示，土地與生產工具同列於生產資料之內，土地不能當生產工具。所以用土地並非私有來判斷生產工具私有的不存在，因而得出西周是奴隸社會的結論，似乎是值得考慮的」。

這雖然沒有指出我的姓名，但毫無疑問指的是我，因爲「重要生產工具，以農業而言便是土地」是由拙作中摘引出來的。

「封建社會是由奴隸社會蛻化出來的階段。生產者已經不再是奴隸：……重要生產工具，以農業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歸爲私有，而有剝削者的地主階層出現……」（「十批判書」第十五頁）

我在這兒所用的「生產工具」是廣義的，意義就是「生產資料」或「生產手段」。馬克思使用這個名辭的德文原文，是Produktions mittel——在三種翻譯名詞中我喜歡用「生產工具」。我覺得用「工具」來翻譯Mittel要洽當一點。把農業生產中的土地說成「工具」似乎不很自然，但把工業生產中的機器、工廠等說爲「資料」同樣有點撇扭。普通把自然與人爲作爲「資料」與「工具」之分，但如農業土地已經絕不是自然土地了。農業土地是經過人力開墾出來的東西，而且在耕種中也如像犂鋤一樣，必須時常打磨，如其不然，便雜草叢生，會把你下的種子全部糟踏的。故爾把土地這項「生產資料」說成「生產工具」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是廣義的，范先生所使用的是狹義的（如犂鋤之類），就只有這一點不同。

至於資本論勞動地租篇所說隸農制度與奴隸經濟的基本區別點：「奴隸是用他人所有的生產條件，不是獨立的」——這「生產條件」（Produktions-bedingung）含義更廣，應該把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以及一部分生產關係都包含在裡面。但「生產條件」中，土地一項仍然是重要的條件。假使連這項條件都還沒有私有化，即土地私有制還沒有成立，要說奴隸已經獨立了，奴隸社會已經轉化爲封建社會了，那恐怕才是「值得考慮」的吧？

（六月二十日）

（補註）西周帝王墓中，幽王墓似曾發現。據西京雜記卷六，言幽王墓中曾發現百餘尸骨，只有一男子，餘皆女子。

武訓生平的介紹和批判

謝興堯

一　武訓的少年時期和他的家庭成份

武訓是今平原省（前屬山東省）堂邑縣西北鄉柳林鎮武家莊的人。他的父親武宗禹，母親崔氏，他兄妹四人，大哥武謙，二哥武讓，還有一個姐姐。他排行第七，人們都稱他爲武七，後來又因他糊塗，『鄉人咸輕之，呼爲傻七，或武豆沫』（趙局度「武訓興學碑文」）。豆沫是山東土話，是糊塗不清的意思。他本來沒有名字，『曰武訓者，官府請奬時之名也』（王貫笙「武訓興學史略」）。在他柳林『義塾』成立後，堂邑知縣郭春煦替他請奬，山東巡撫張曜奏請建坊，還是稱他爲武七，尚無武訓之名。可見武訓這個「訓」字，是封建統治者把他當作「典型模範」賞賜他的，其實是「不足爲訓」的。

七歲時，他的母親又死了。於是他便受他伯母的撫養，同時跟他哥哥武謙學種地。十五歲時，到他姨父地主張家去扛小活（即作童工），受盡虐待，不得已而離開。十七歲時，又跑到館陶縣薛店莊大地主李老辮家仍作扛活，還是遭受虐待，因爲洒了點猪食，倒貼了春聯等小錯，便被李老辮辱罵苦打。他每年的工錢是十六吊，他作了三年工以後應該得四十多吊錢，但李老辮欺他不識字，用假賬騙他，不但不給他辛苦三年應得的工錢，還吞沒了他姐姐給他帶的錢，並且反誣他訛詐，把他痛打一頓，推出門去。他一連串受了許多的欺騙，感到很痛苦，以爲這是因爲自己不識字的緣故，就立志要辦「義學」，唱出他的第一首歌：『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人們都說他是患了『義學症』。這時他止二十一歲。

以上是他少年時代的大略。從他的家庭和思想情況來看，我認爲武訓的家庭成份應該是個破落的地主，至少也是個破落的富農。理由是他的老家是『武家莊』，他又行七，可見武姓是個「大家」。他的姨父張老闆是個地主，姨母是他母親的姊妹行，按舊時鄉村習慣，既把一個女兒嫁給地主張家，就不會把另一個女兒嫁給貧傭農武訓的父親武宗禹。武訓的父親死了以後，他的母親便帶着他要飯，在從前的鄉間，也是少見的，因爲，要飯是最被人鄙棄的事情，這正證明武訓的父母是破落戶，所以她不能吃苦耐勞，不會勞動，甘願流於可恥的乞丐之中。武訓以討飯爲「自由職業」（「不如討飯隨自己」），這也是破落戶思想的表現。武訓既沒有讀過書，竟能喊出「義學」兩個字，即與他的家庭成分有關。假使我們要替武訓定家庭成分的話，據以上理由，他從小就是沒落的地主階級。至於他的思想，更是澈頭澈尾的封建地主思想。

二　『行乞興學』的眞面目

自從他喊出要辦『義學』，人們都說他有神經病，都不找他作長工，他便以行乞爲主，偶爾作點短工，如他所唱的：『出糞、鍘草，拉砘子（即碾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他也曾作過推磨、推碾、割麥子、澆園、挑担、拉車等臨時工作，並且自己定出價目，即推磨一斗六十文，推碾一石穀子四百文，澆園每工二百文，但所得的錢很有限。不久，他便脫離勞動，以撿線頭、編盤帶、軋棉花、紡線等作爲副業，變成一個職業乞丐了。這是一個很短的時期。

他曾想出種種離奇而醜惡的方法要錢要飯，以搞許多把戲來哄騙小孩們的錢，於是變成一副純粹流氓相。在他二十三歲時，他把頭上的辮子剃掉，只在一邊留着小桃形的一撮髮，結成小辮，打扮成小孩的模樣。爲了哄小孩們的錢，他常玩豎鼎、蝎子爬，打車輪，做馬騎一類的玩意，都是以要錢爲目的，如：『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我做馬，讓你騎，你出錢，俺出刀。』從此他又施展了「跪」的本領，你若不給錢，他就死跪着不起來。向人們要錢也是如此，他常唱：『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飯。』『大爺大叔別生

氣，你幾時不生氣，他幾時就出去。』他就用這種『要死狗』、『軟磨』的辦法來要錢。

有人說武訓是封建社會的奴才和流氓的變種，這是很對的，至少他也是鄉鎮上的『二流子』。我們看他要錢的方法，不只是哄小孩們的錢，並且也訛大人們的錢。『有錢的人故意戲要他，說：豆沫，你能將這塊瓦片吃下去，我就給你兩吊錢，武先生毫不遲疑地塡到口裡。又有富翁，因爲武訓稱讚他的毛騾好，他就對武訓說：豆沫，你能將騾糞蛋吃一個，我可以把這頭快騾捐給你辦義學。武訓明知他是戲弄，是汚辱，氣憤之下，即把騾糞蛋塞進口內吃下，牽了騾子就走，這時富翁大吃一驚，悔之不及』（韓多峰「以武訓先生作鏡子」）。他最初積蓄的有限的一點錢，便是如此搞來的。捧他的人，說他『充飢則賴乞食，積錢則賴傭工』（趙局度「武訓興學碑文」），那決非事實。他天天嚷着『要辦個義學院』，『修個義學不費難』，但搞了十年，嚷了十年，他還只是「行乞」，沒有「興學」。

三　興辦「義學」的經濟基礎

他雖然作了十年的職業乞丐，唱了許多『修個義學院』的歌，且以『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保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的話來誘惑人，而「義學」還是辦不起來。直到他三十歲那年（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就『將前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連其歷年所積，共二百十餘千。轉懇館陶縣武進士婁峻嶺，文生婁崧嶺、婁瑞嶺，代爲分放生息，愈積愈多，利上生利。至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武訓四十八歲）冬，統計典買地二百三十畝有零，用去地價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尙餘本利二千八百吊。』『凡有可以獲利者，雖備歷艱辛亦不敢辭』（均見光緒十四年六月堂邑知縣郭春煦初次「請奬詳文」）。由於『分放生息，利上生利』，十八年的工夫，他以一個要飯的，不僅變成了「大地主」，同時也變成了「大財主」，這便是他辦「義學」的經濟基礎。

他這時已經是一個地主而兼高利貸者，但他依然行乞。他雖被稱爲「傻七」，或「武豆沫」，然而他一點也不糊塗，對於放債，更精細得很。他『積錢成串，則跪求富家爲之放債生息，以備修學之用。肩挑二小筐，一筐貯行傭器具，一筐貯債簿而裹一油布，蓋放債則跪求人寫於簿內，以油布裹之，恐道途雨沾濕也』（趙局度「武訓興學碑文」）。他的學生沙明遠記他放債和『興學始末』更詳，說：『自一緡至千緡，其利之相積，錯落萬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紛歧雜揉，變幻無不至。訓旣不知書，復不通數理，惟恃一心記憶，則纖微奇零，無不綜貫。故身爲債權者數十年，未嘗有債務糾葛事。』這豈是一個糊塗人所能辦的？至於放債的利息，山東通志武訓傳說：『歲以三分計息，銖積寸累，遂至鉅萬。』另據堂邑、館陶、臨淸各縣志所記，謂當時放債，利息最低三分，可見剝削窮人之殘酷。而武訓所放的利錢，實際比三分還高，他是『一年子母可以相等』（臧克家「武訓的義學症」）。民國「館陶縣志」卷二云：『館邑自咸豐年變亂後（按指太平天國北伐軍），當業停止，無案可稽。』館陶、堂邑一帶，經過太平軍後，沒有當舖，自然是武訓放高利貸的優越條件。他除了放賬外，還經紀田房交易，說媒傳信，當時作一個媒是由男女兩家各給以勞金二兩至四兩，名爲折酒席錢（見館陶縣志卷六）。任何記載，都說他『放債以備修學之用』，我們怎麼還能說他是『行乞興學』的呢？

四　從放債興學到結交官僚

武訓過了十年的職業「游民」生活，因分家賣地才共有了二百多吊錢。從他賣地一事，即可證明他是一個沒落地主的後人，因爲倘若他是一個眞正的農民，他必然是熱愛土地，熱烈地要求土地。而武訓剛分得三畝地，就立刻把它賣掉，還跪求地主階級的婁峻嶺、楊樹芳替他放債生息。婁峻嶺字崇山，是個武進士，又是館陶縣塔頭村的惡霸地主，楊樹芳字模民是個歲貢生、候選訓導，是柳林鎭的紳士地主，他曾組織並指揮「民團」來鎭壓捻軍。他的叔父楊名謙，人稱「楊四爺」，就是柳林區「民團」的團長（據六月十一日河北日報「關於武訓歷史的實地調查報告」）。他們在當地都是本地最有勢力的封建統治者，武訓得到他們的支持，才把興「義學」一事由「空談」變爲「實際」。

至光緒十二年冬天爲止，他『曾在武家莊買地一區，用錢五百五十吊，因嫌局勢狹小，且恐日後爲本姓武氏爭佔，另在柳林鎭擇地創修。光緒十三年春，適有郭芬亦願捐地一畝八分七厘，坐落該鎭東門外』（郭春煦「請奬奏稟」）。又有穆雲捐地二畝作爲校基。郭芬字子香，是個地主，穆雲字官雲，是個監生。在滿淸時候，凡富有財產的大地主，總願意拿幾十兩銀子捐個監生頭銜，以便「嚇詐鄉愚」，他們都願借武訓來「成此善擧」。武訓便在此置地建屋，據堂邑知縣郭春煦「造送義學房屋地畝詳文」後面『計開』說：買地一百九十畝五分，地價三千三百一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當地四十畝，地價九百四十

吊；建屋二十間，共用工料四千三百七十八吊，除武訓自己的二千八百吊外，不足之數，由楊樹芳向鄰村捐募了一千五百七十八吊，所謂『堂邑好義成風，一聞創修有期，卽鄰邑之助錢者亦甚夥』（賈品重「武善士訓墓誌銘」）。於是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武訓五十歲）春天，堂邑縣柳林鎮「義學」便正式成立，定名爲「崇賢義塾」。並聘請壽張縣舉人（光緒二年丙子科）崔準，聊城縣舉人（光緒八年壬午科，至光緒十八年壬辰科顧才中進士，在義塾成立後四年）顧仲安爲教師，所謂武訓的「奇蹟」，從此便展開了第一幕。由「義塾」管理人——也是替武訓放高利貸者——楊樹芳將此「善舉」稟報到堂邑縣，知縣郭春煦親到「義塾」視察，當卽賞武訓十兩銀子。郭春煦又轉稟於山東巡撫張曜，張曜把武訓邀請到省城濟南巡撫衙門，大加獎勵，除賞銀二百兩外，又給以黃布「緣簿」一本，上蓋官印，准他到各州縣自由捐募。因此『一時道路傳頌，嘖嘖不衰，上至州縣府道運河運糧之員，往往捐俸助工，接以禮貌，可不爲榮乎』（武訓「墓誌銘」）。至是他更得到大小官僚的稱讚援助，武豆沫就成了山東社會上的名人，而與地主官僚爲伍了。

至至舘陶縣楊二莊「義塾」，原是舘陶城東北二十五里莊科村千佛寺住持了證老和尚辦的，據光緒十四年冬，舘陶縣貢生熊德潤「請出示曉諭以彰義行稟」，他說：『了證年七十二歲，係本村姜姓，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修蓋廟宇，金粧神像，餘錢二百吊，遂依靠安人爲伊生息多年，分文不支，如是者有年。迨積錢漸饒，立意修建義學。前數年託楊二莊汪信遠代買田地一頃二十餘畝，糧名育英堂；當置七十餘畝。又在楊二莊買成宅一所，尚餘錢五百餘吊，餘錢生息，地中收租，總計兩項，每年除完納銀米修補房屋外，約餘錢三百餘吊，堪作義學之費。』可見了證不僅是個和尚大地主，而且是兼放高利貸，只因他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不便直接出面。武訓聽到這個消息，跑去捐了三百吊錢（一說二百三十吊），這所「義學」便算是他辦的了。因此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武訓五十二歲）「舘陶楊二莊義塾」卽正式成立，人們鬨傳這是武訓辦的第二所「義學」。

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這位身兼大地主、高利貸者、地方名人的武訓，他仍然常到臨清州城鄉去「行乞」，但他早已不再跪求別人寫賬了，特請他的族孫武茂林替他當會計總攬出入賬目了。他更不住破廟了，而下榻於臨清稅官大富翁施善政的家裡。按臨清在滿清時，是通漕運的要道，商業繁盛，物資聚集，尤以鈔關街是稅收的總匯。因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太平天國北伐軍曾攻破臨清，後又在臨清東邊高唐州和馮官屯堅守，與清軍決戰，而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的邱莘教卽起於邱縣、莘縣、聊城、堂邑、舘陶、冠縣、臨清各處。屢被清軍屠殺，顯得殘破蕭條，武訓便與施善政商量，想在臨清辦三個「義學」。但這時的武訓，捧着代表封建統治者的黃色緣簿，『遍謁歷任學院及鄰邑府廳州縣求其鈐印緣簿之上，鄰近士夫見其功之有成也，亦莫不傾囊相助』（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可見他拿着這件封建法寶——緣簿，在附近各地是怎樣地招搖撞騙！他的身份已經由「乞丐」變爲「官丐」，與其說他是『捐募』，毋寧說他是官派的籌欵委員！所以『後至臨清，聲譽大著，歷任州牧及學正，上至巡撫藩臬皆樂爲捐輸，士人亦重視之，羣呼爲義學正。而訓之行乞如故，儲息如故』（陳恩普「武訓先生興學碑文」）。他放高利貸只是剝削窮人，還拿着「緣簿」向地主士紳敲詐。無怪乎他死後，大家爲爭奪「緣簿」互相控訴不已（見臨清增生靳鶚秋「訴于殿元妄控稟」）。因爲他能結交官僚，所以「士人」不敢不加以「重視」。不敢不『傾囊相助』。

關於武訓在臨清辦「義學」的經過，一般記載，說光緒十七年武訓到臨清，受到因貪汚發財的稅官施善政的歡迎，接武訓住在他家裡。光緒十九年滿清學部侍郎裕德沿運河回京，被武訓攔轎募捐，裕德捐了二百兩銀子。於是用四百兩銀子在御史巷買宅基一所。光緒二十年開始興工，次年多天落成，除存欵外，又添購了兩處鋪房，六百畝學田，每年能有三十多吊的收入，作爲經常費。光緒二十二年春天正式開學，定名爲「臨清御史巷義塾」，這便是武訓創辦的第三所「義學」。但我們另據可靠史料，武訓在臨清捐募和興學情形，並不似一般所說的那樣順利和體面。他是『光緒十六年間來臨，日在街市三文、五文、一百文、八十文、零星募化，言必在臨清修理義學一所，時常在劉秉珂、邱儒平處宿止。至十七年劉秉珂等見其心誠，言如此募化，實屬不易，遂邀同施鈞、鍾維嶽、邱儒平、孟勤保等公立緣簿一本，武訓卽携帶四外懇募錢文，隨募隨放，皆伊自行經手，隨地託人代登賬簿。至十九年劉秉珂等見緣簿之上所募雖已不少，而實進有限，何能成全其事。卽在本城中御史巷買宅房一處，價銀四百兩，係劉秉珂自行出貲。又添修房屋，改立門戶，經費京錢四百餘吊，係首事及生等公同幫助，皆言係無名氏所捐，無非欲成武訓之善耳。二十年商酌延師，奈經費仍行不敷，時有合泰號馮長泰、施鈞等十餘家，公捐濟善欵銀六百兩，亦情願撥入義學，以全臨境之要舉。……武訓曾當(卽典)土橋村陳姓地二

畝，當價京錢二十五吊。當曹家岡曹姓地一畝，當價京錢二十五吊。當土橋村柏姓地三畝，當價京錢四十吊。又在頭閘口買舖房一間，價京錢二十六吊（據「調查報告」頭閘口沈廣泰、尹成方二人因欠武訓債不能償還，乃將房典與武訓）在灰炭廠買舖房四間，價京錢一百吊。二十二年四月間武訓病故，義學並無現存欵項，治買喪具，盡由欠戶支取。自光緒十七年起，至二十二年止，綠簿之上，武訓共募京錢一千九百五十八吊，共實進京錢九百一十六吊二百八十文。武訓隨進隨放，並無存項。生等公議既有賬項，即可催討，遂挨門質對，一概不差」（臨清州增生靳鄭秋「訴于毆元安控稟」）。這一篇細賬，便足說明臨清「義學」是本地的地主、富商、劣紳等認爲是『臨境之要舉』，大家出來辦的。並且是因見武訓由光緒十六年到十九年，三年「懇募」的結果，『而實進有限』，因此才由這些商人地主們協力支持，促其實現。這更足証明行乞固不能興學，專靠募捐，在短期內亦難成功。由上稟內，可以糾正一般記載的一個重大錯誤，即武訓在臨清一再壓迫貧農，零碎的典了「六畝地」，而別的書便說他買了『六百畝學田』，這個數字的錯誤，關係實在太大了。

以上是武訓辦「義學」的經過大略，是什麼人在支持他也可以一目了然。究竟他出了多少錢？募了多少捐？我們綜合上文，即可看出當時收支的大概情形。

五　武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從上面這些事蹟，我們可以把武訓一生分成三個階段。當他三歲喪父以後，便隨着他母親討飯維持生活，據說他母子二人曾流浪到大名、獻縣一帶（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在這幾年乞討生活中，養成了武訓某種程度的游民性。後來隨他哥哥種了幾年地，又在張家李家扛了幾年活，受盡虐待和欺騙，因此又恢復他的行乞生活，認爲這是自由的，正如他唱的第一首歌，這是他早期的思想。

第二個階段，是從他二十一歲到三十一歲，他不願再扛活，完全脫離勞動，變成一個職業游民。在這十餘年中，他口口聲聲要辦「義學」，見人就下跪，作出許多醜事，並且裝瘋賣傻，以迎合一般人（大人和小孩）的好奇心理。他最初受了一連串的打罵欺騙，對於個別地主不能說他一點不恨，但這並沒有燃起他的階級仇恨，他只覺得地主、縉紳們對於窮人的剝削是應該的，只是他不幸而爲窮人又不識字，於是他就向地主階級投降，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自己如何才能爬到地主階級羣裡，嚷嚷要辦「義學」便是他爬的手段，他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實現了他的『幻想』，這一點武訓倒是成功的。

第三個階段，是從他三十一歲分家賣田以後，直至他死（五十八歲），他把僅有的二百多吊錢，跪求當地的地主劣紳替他放債生息，他逐步的由高利貸者也變成了大地主。並因爲辦「義學」他竟成爲社會上的名人，且又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嘉奬表揚，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光榮』。

爲了進一步了解武訓的生平事蹟，我們特別要明白他所處的時代：他生於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即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死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即清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活了五十八歲（按舊日算法是五十九歲）。在這幾十年中，帝國主義勢力已侵入中國，滿清的封建統治已日趨沒落，全國人民已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正是中國大風大浪的時代。所以在他出生後兩年（一八四〇年）便是『鴉片戰爭』，未死前兩年（一八九四年）又是『甲午之戰』，死後兩年即是『戊戌政變』，慈禧復辟。當時有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有北方捻軍西南回民的反清運動；還有鴉片戰爭以後的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滿清統治頭子奕詝（咸豐）走死熱河；同時反帝反封建的所謂「教案」到處發生，武訓雖然生長在這革命高漲的大時代裡，他却誠心誠意地始終跪在地主面前。

如果我們把他的生平和當時的重大事件對照一下，就更可看得清楚了：

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武訓十五歲，始在姨父張某家扛小活，受盡虐待。時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捻軍張樂行在蒙城起義。

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武訓十六歲，仍在張家扛活。時太平北伐軍政克山東金鄉、鉅野、鄆城、陽穀、莘縣、冠縣，本來要到館陶縣（冠縣北），因嚮導誤行，就經清水鎮、李官莊而到臨清州。各縣大地主多逃亡於堂邑縣西北之柳林鎮，因柳林位於堂邑、館陶、臨清三縣之中，成一三角地帶，上有寨牆。

一八五五年（清咸豐五年）武訓十七歲，離開張家，又到館陶李老辦家扛活，更受虐待。時清將圍攻太平軍於河北高唐州、山東馮官屯。

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武訓二十二歲，已棄傭行乞想積貲興學。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燒圓明園。奕詝（咸豐）逃往熱河。

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武訓二十三歲。邱莘教在邱縣、臨清、冠縣、聊城、堂邑、館陶各處起義，『以冠、莘、堂三縣人居多』（山東軍興紀略卷

十二）。響應捻軍。其中紅旗教的一部並攻佔堂邑縣城。

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武訓二十四歲。捻軍敗僧格林沁清軍於荷澤。

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武訓二十六歲。太平天國天京（南京）被清軍攻陷，天王等殉難。

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武訓二十七歲。捻軍大部入山東曹縣、定陶、鄆城、鉅野各地，在鄆城西北陣斬清帥僧格林沁，清軍全軍覆沒。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武訓二十八歲。捻軍張總愚及太平軍餘部賴文光屢次攻入曹州、鉅野一帶。

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武訓二十九歲。東捻軍再入山東，突過運河。

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武訓三十一歲，因分家賣地共有二百一十吊錢，跪求婁陝嶺替他放債生息。

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武訓三十二歲。天津「教案」發生。

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武訓四十八歲。因十幾年高利貸已能買土地二百三十多畝，及現錢二千八百多吊，由地主楊樹芳經管，籌辦「義學」。

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武訓四十九歲。與楊樹芳決定在柳林鎮興修「義學」，有地主郭芬、穆雲各捐地作爲塾基。

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武訓五十歲。柳林鎮「崇賢義塾」成立。

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武訓五十二歲，館陶楊二莊義塾成立。

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武訓五十三歲，常到臨清捐募。清廷命查禁哥老會，李鴻章建立北洋海軍。

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武訓五十四歲，替臨清稅官施善政（是「大仙班」壇主）傳播所刻封建迷信圖書。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武訓五十六歲。由官僚施善政、富商馮長泰等捐助，臨清義塾開始興工。中日甲午戰起，日軍侵入遼東、大肆焚掠。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武訓五十七歲，臨清義塾落成。中國戰敗，清廷派李鴻章赴日講和。孫中山設興中會。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武訓五十八歲，臨清義塾春天開學，夏天武訓即死。是年山東曹州、單縣一帶大刀會起義。義和拳、八卦教等秘密組織亦在醞釀。清廷命山東江南各督撫會剿。

由此可見：武訓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革命高漲、階級鬥爭異常尖銳的時代，有些人爲了歌頌武訓，大談其歷史觀點，強調歷史條件的限制性，說武訓是個不識字的農民，那時候還沒有馬列主義，他也沒有上過政治課，他怎麼就會起來革命呢？對於他不應要求太高。但歷史條件固然有它的限制性，但也不是沒有標準的，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和他的活動，只能依據一個科學的標準，就是看他是爲進步勢力的利益服務，還是爲反動勢力的利益服務，看他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武訓在少年時代受盡地主階級的壓迫折磨，他應該知道階級仇恨，應該奮鬥與反動勢力進行鬥爭。太平天國的首領人物如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都是「種山燒炭」的貧農僱農，不是也能夠領導革命嗎？就是山東的捻軍，發生在他家鄉堂邑一帶的邱莘教，也全是農民，都因受剝削壓迫太甚起來反抗封建統治者和地主。那末，別人能做的，他也應該能做，這決不是對他的過高要求。當他二十歲以後的十幾年間，正是山東農民革命的高潮時期，農民軍始終在東昌、曹州各地反抗清軍，而他都熟視無覩，絲毫也不爲所動，這說明他是不願參加革命運動的。他不只是沒有拿起槍桿，並且還放下鋤頭，甘願作一個流氓游民，無恥地跪在地主面前，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嗎？這明明不是歷史條件限制了他，而是他限制了歷史的發展！當時廣大的農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武訓偏要走反革命的道路！

六、「義學」的性質及其社會效果

武訓一生的『事業』，祇是辦了三所『義學』，其實全是地主、惡紳、官僚支持他辦起來的。在有一些人的腦筋中，還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武訓雖然不好，學校總是好的，若是否認武訓的『義學』，便是否定教育。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先了解封建社會的情況及其時代背景。在封建時代，官家在地方上設的學校叫「官塾」，高級的稱「書院」。大地主和富翁請人專教自己子弟的叫「專館」或「私塾」。「官塾」、「私塾」之間，有人（多半是地主）出來辦個學校，准許一般子弟前來念書，就稱爲『義塾』。其性質在官私之間（也有官立義塾）。它原是配合講「聖諭」、「聖訓」宣揚「王教」的講壇，它的作用是灌輸奴才教育，毒化革命思想。不過在同治年間就是在武訓三十歲左右的時候，滿清政府已派幼童出洋，開辦同文館。在『崇賢義塾』成立前後，一般資產階級的士大夫正醞釀維新，要求『變法』，張之洞在湖北已提倡新政，喊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而武訓的『義塾』還在那裡分爲『經學』『蒙學』兩班，還要認識『天地君親師』（蒙學）和『忠孝節義，三綱五常』（

經學）的大道理，所以在今天來說，他固然是封建的、反動的，即就當時的社會情形來說，他也是開倒車的、落後的。

至於「義學」的作用和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封建統治者以至於反動派爲什麼要三番五次地來表揚他，究竟是個什麼道理？關於這個問題，在封建統治者本身的文獻裡已經解答得很明白了。早在一八〇三年（清嘉慶八年）滿清政府便指示出教化爲王政之本，『學政於平日誠能盡心訓迪，令士子循循然動遵法度。而士子又各於鄉黨互相勸諭，俾人人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奸究潛消，善良蔚起』（嘉慶八年「諭湖北學政茹芬」）。又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吏部題本『准湖廣總督嵩孚咨送襄陽府屬捐輸義學紳士清冊，查前湖廣總督李鴻賓等具奏，湖北襄陽一郡，民俗獷悍，臣於道光四年面論襄陽府知府周凱，督令所屬州縣，勸諭紳耆，在鄉村市鎮多設義學，延訪端謹儒流，誘掖子弟，使之入學誦讀，以冀化導有方。茲據該府詳報，共設義學八十處，仰懇給予樂善好施字樣，請旨建坊……』（道光八年二月十八日吏部題本）又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武訓正行乞興學，時捻軍張總愚等進攻直東，僧格林沁督衛畿甸，清廷在這危急的時候，就更需要宣揚王化，當時滿清政府對各省的指示是：『方今大江南北漸就肅清，一切撫綏安輯，叠經降旨，責成地方官吏，教養兼施，使百姓洗面革心，不致再爲教匪邪說所煽惑。學校之設，尤關緊要。並着學臣督飭教官宣講聖諭。至書院義學亦培植人才之一助……』（「續文獻通考」卷九十七）。從上面這幾個文件，就可以看出「義學」對封建統治者的重要性了：它可以使『奸究潛消，善良蔚起』，『不致再爲教匪邪說所煽惑』，也就是說，凡是『中毒』輕的，可以『互相勸諭』不致誤入「歧途」，「中毒」重的，也可以『洗面革心』，重爲安善良民，「義學」的效果，便是如此。因此，封建統治者爲什麼要表揚武訓？武訓究竟爲什麼階級服務？是爲窮孩子，還是爲統治階級？對於這一問題，從上面封建統治者的文獻中，我想總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了。

七　歌頌武訓是反動思想的表現

歌頌武訓的，也可說是捧武訓的，可分爲官私兩方面，官的是由政府名義，下令褒揚；私的是由個人名義，撰文稱讚。這都可以說是對武訓的歌頌者。據我們所見到的史料統計一下，即可很顯明地看出，凡是由政府褒揚武訓的，不是封建統治者，便是反動派和漢奸。凡是個人稱讚武訓的，大抵都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便把奴才的武訓扮成一個改良主義的角色。封建統治者爲什麼要表揚武訓？上文已經舉例說明，現在再來敘述一些事實。

在滿清時代，武訓共受到三次表揚，即生前一次，死後兩次。第一次是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柳林鎮義塾剛成立，便由替武訓放賬兼「崇賢義塾」首事的楊樹芳，由他領銜，公稟堂邑縣署請獎以彰義行。即由堂邑知縣郭春煦『因下鄉之便，往看該義學，傳驗該鄉民武七，誠實樸訥，悉與楊樹芳等公稟符合』（郭春煦「請獎詳文」），即轉稟於山東巡撫張曜。張曜本是行伍出身，不認識字，因『剿回』、『剿捻』，屠殺人民有功，就由總兵、提督等武職，爬到了山東巡撫。他也「目不識丁」，所以對武訓創辦「義學」，大加激賞。在他的「奏請建坊片」中說：『洵屬急公好義，行誼可風。俯懇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清廷即允許所請，准其自行建坊。這是對武訓第一次的表揚。

武訓死於臨清，次年一八九七年即由士紳舉人趙一琴、鍾維嶽等公稟，請轉詳給獎以慰艱苦，說武訓『終身爲善，實出萬難，固千秋所罕聞，誠一世之奇士。請給立案，入志入祠。』結果被批准。「入志」是把武訓的事蹟編入「臨清縣志」，「入祠」是把武訓的名字列入「鄉賢祠」。這是對武訓第二次的表揚。

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武訓死後八年）因武訓的「義學」分布在堂邑、館陶、臨清三縣，便由臨清知州莊洪烈主動發起，與堂邑知縣王福曾、館陶知縣向植會同呈請立案，俾免湮沒。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提學使連甲『飭查武訓建學事實』，當由堂邑知縣陳瑗稟覆，並附武訓「義行」八條。到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再由提學使羅正鈞『造具武訓事實請奏咨宣付史館立傳詳文』附呈清冊三本，乃由山東巡撫袁樹勛轉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其理由是前張曜奏獎時，武訓僅辦『崇賢義塾』一處，後又續設館陶、臨清兩處義學，『僅予尋常旌表，誠恐苦操奇行不足以示來茲而風薄俗，籲懇宣付史館立傳。』至於這次請求表揚武訓的動機，莊洪烈等『請立案稟』中說：『仰承諭旨，廣勝興學，若得千百武訓起而輔之，則學校之興可翹足而待矣。』袁樹勛在他的奏摺裡也說：『恭逢恩詔，採訪義行。』這時正是革命烽火燒遍南北，人民堅決要求實行立憲。清廷又想起以興學爲教化之本，於是袁樹勛等檢查舊案，把武訓再表揚一次，其結果當然得到滿清政府的許可。後來纂修清史稿就把武訓列在『孝義傳』內。按宣付國史館立傳，在封建時代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全國性的宣傳，所以，這一次的表揚，也比前兩次重

要。這是在滿淸時代對武訓的第三次表揚。

民國以後，對於武訓，仍繼續予以表揚，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北洋軍閥時代，因武訓的學生衆議院議員沙明遠等，聯名呈請徐世昌，請『賜予匾額以昭激勸』。旋由徐世昌題贈『熱心公益』匾額，即懸於臨淸武訓學校之『蔚起樓』。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匪幫頭子蔣介石作了一篇『武訓先生傳贊』，歌頌武訓『獨行空前，堅苦卓絕』（見「武訓紀念册」）。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又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用彰潛德而資矜式』。此外還有大劊子手韓復榘所送『教澤長存』的匾額，及大漢奸汪精衛『廉頑立懦』的題字，由以上一切，可見武訓是如何被封建統治者、反動派、和出賣祖國的漢奸們所重視。

以上這一羣歌頌武訓的人，由封建統治者到國民黨反動派，也就是由慈禧到蔣介石，他們都曾利用過武訓，想把人民的革命意志變成『豆沫』，這就是他們歌頌武訓的根本原因！

與以上這些表揚相配合的，便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他們一方面是用改良主義的觀點去看武訓，一方面是借武訓爲「題材」，來發揮自己的主張。如最早記武訓的是梁啓超，他主張變法維新，提倡君主立憲，他作武訓傳（即飲冰室文集中的「三先生傳」）的時候是『丙申』（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正是武訓死的那年，也正是馬關條約以後，戊戌政變以前的時期。他把武訓稱爲『張先生』，又說：『先生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所。』這顯然是得之道聽途說，才有這樣大的錯誤（「碑傳集補」的武訓傳即本於此）。但是，他的主題是在結論中，以感慨諷刺的口吻，大發改良主義的議論。張謇對師範畢業生講演「義丐武訓事蹟」，那時約在光緒末年。他是一個純粹改良主義者，他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七年）發表「變法平議」，認爲實業、教育可以救國，所以終身從事於此。據說他生平最崇拜的兩個人，即山東的武訓和上海的楊斯盛（按楊原係土木工人，清末在上海因買地皮而發大財，因辦「義學」受奬，淸史稿孝義傳有傳），後來他在南通大辦學校，恐怕也是爲了要發揚「武訓精神」。

北洋軍閥時代，尤其是『五四』以後，一般國立學校無不拖欠經費，許多教授被逼改業。蔡元培所作的「武訓先生提醒我們」，也是借武訓爲題材來發感慨，文中大談『普及教育的必要』，又說到『師資不足，經費難籌』的困難。最後說：『武先生似乎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說教育經費難籌了，只要你們能刻苦而誠懇就好了。』蔡先生當然也是改良主義者，他在十分困難中，便想起了「武訓精神」來作解釋，好像只要能刻苦誠懇，即可解決一切問題。這篇文章雖然空洞，但是也可看出「武訓精神」是潛伏在改良主義者的腦海中。

幾十年來，從封建統治者到反動派和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一上一下的互相配合着來歌頌武訓，於是武訓其人由山東的一個角落擴展到全國，由滿淸時代繼續到現在，反動統治者的褒揚固爲主因，改良主義者的大肆宣傳也大有關係，因此，武訓便在舊社會裡生了根。

八　怎樣認識武訓和「武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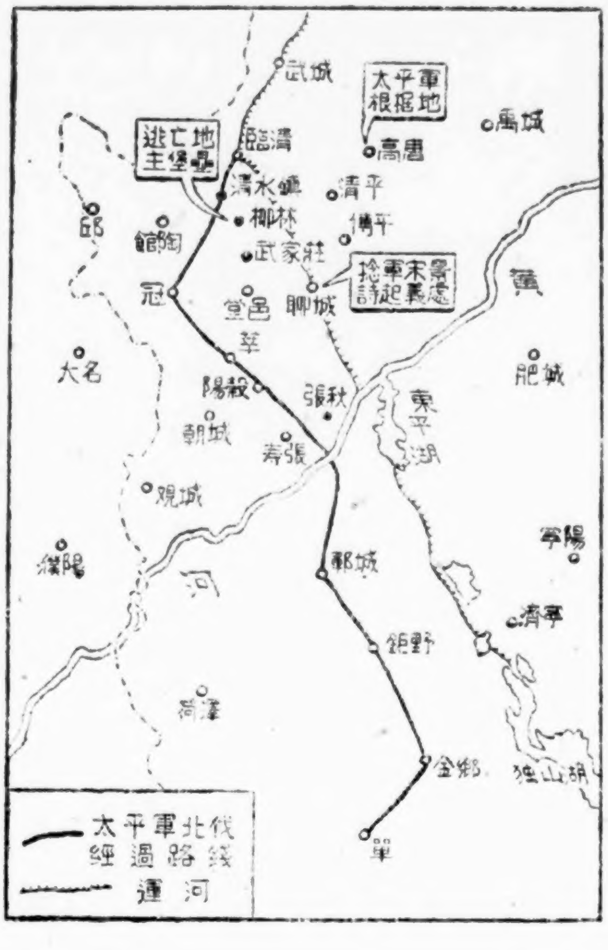
關於武訓其人其事，經過各方熱烈的討論，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對糊塗思想多少起了一種澄淸作用，一般人對於武訓這個問題，基本上也有了正確的認識。但現在還存在着一個問題，也是一些人抓住不放的，就是說它還能迷惑人的，便是所謂「武訓精神」。有人說：這是武訓問題中的最後堡壘，假如不能粉碎這個堡壘，武訓問題還不能就算解決。我們看武訓本身，只不過是封建社會中的標準奴才、下等流氓，作出了許多醜惡無恥的事情，有何「精神」之可言？所謂「武訓精神」，祇是歌頌他的人們替他吹起來的，不是他本身所原有的。我們綜合一般人（包括從前的和現在的）的意見，所謂「武訓精神」主要是指兩點：一是行乞而要興學，即封建統治者稱讚他的『求之富厚之家所難能』；一是他不爲名、不爲利、不費一錢，甘一飯，『三十年如一日』，即屢次褒揚他的所謂「堅苦卓絕」。這是什麼力量在支持他？什麼動力在催促他？好像他是專爲辦「義學」來的。後者尤易迷惑人，就是說，他雖然放高利貸，也愛錢，但他並沒有自己享受，這便是「苦行」問題，和「利他」問題。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揭露他的眞相，以便認識他思想意識的發展過程，那末這些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因此，我們需要先認識武訓本人。

據陳恩普「武訓先生興學碑文」說：武訓的容貌，是『身長、狹額、扁口、竪頤、面龐語音，殊肖村嫗。』就是說，武訓的相貌，聲音，都像一位鄉下老太婆。而一般又叫他是傻七，豆沫，這可說明他的外表是愚蠢而帶老實的，他的性情正是「陰奸」的一路，他雖够不上什麼「大智若愚」，他的外表似乎是一個「怯貨」，其實正如北京土話說的，他『人怯心不怯』。

武訓幼年時代的生活，對他的影響很大，我們看他的思想一步一步發展的過程，完全是一貫的，沒有絲毫「奇蹟」。他本來是一個破落戶（據「調查報

告」他祖父有三個女人，至他父親才沒落貧窮）的子弟，小的時候，曾隨他母親討飯，流浪到河北省大名、獻縣一帶，這便是他後來甘願作「游民」的起始。

附：武訓生平活動地區圖



當他少年正是身心發育的時候，在張家李家扛活，一個較長時期受盡折磨虐待，當時他還多少感到一些激憤以後便「沒火性」了。他的感情受了多年壓抑，辛苦的工錢又被賴掉，這時他的神經可能因受刺激而有些反常，於是變成瘋瘋癲癲的狀態。他被李家趕出來，一無錢，二無衣，眼前生活俱不能維持，還想修「義學」，這不是瘋子說的譫話嗎？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這算是最初的一個階段。我們知道農村風俗，除了老弱殘廢外，二十多歲的大小夥子，要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因爲他口口聲聲要辦「義學」，人們用好奇的眼光把他看成一個瘋魔怪物，也許他的乞討生活一開頭就很順利。及至他神經恢復正常，由生活經驗告訴他，使他認識了一條眞理，就是裝瘋裝傻，以一面要飯，一面要修義學院的矛盾作風,引人注意來維持生活，這恐怕是他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後來他把頭髮剃掉，留一桃形扮作小孩模樣，以及吃蛇蠍、喝髒水，種種奇形怪狀，都是裝瘋裝傻心理的擴大，在他十年行乞當中，他豈不知辦「義學」是句騙人的夢話，但是仍然天天唱，天天嚷，正是把「義學」作幌子好要錢。

武訓總是有耐性的（因爲他的性格是陰柔一類），不管人們聽不聽，他總喊了幾十年不離口，因此才落個「義學症」。

武訓從小接觸的人全是地主，並且是一個類型的地主，他看見地主的威風，光榮，剝削窮人的容易。在他憤恨地主時沒有引起他的階級仇恨，反而向地主投降了。他怨恨自己的命運乖僻，既不認識字，又沒有錢，就想盡方法要往上爬。後來他積存了幾十吊錢，分家又得了三畝地，這是一個大轉變，所以趕緊把地賣掉，作爲往上爬的墊脚石。等到見到了「進士老爺」就算爬進了地主之門，到「崇賢義塾」成立，便算大功告成，不只是成了地主，還成了名人，本地的地主兼紳士也沒有他光榮，這是他意想不到的。但是他明白一定要「行乞」下去，否則他就會一敗塗地。並且他已經成爲名人，到處官紳歡迎，表面上是乞丐，實際是住在大官僚（施善政）的客廳裡要飯，不更顯得光榮？這便是「三十年如一日」「的武訓精神」！這種無恥的「磕頭」精神，難道還値得我們今天來歌頌嗎？我們應該對這種投降主義的反動「精神」展開最嚴正的批判，來澄清各種各樣的混亂思想，使我們在政治思想和認識上再提高一步！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李何林編著　定價6600元

本書首載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所共同草擬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接着，就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階級，分爲下列各篇：1、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2、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3、左聯成立前後十年的新文學，4、中國文藝第一次和兵農的結合，5、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新文學。由李何林、張畢來、丁易分別執筆。書末並附有郭沫若、茅盾、周揚在文代大會對近十年文藝運動情況的總結報告。本書是學習中國新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本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學術討論

本欄的增闢，是爲了對各種重要的學術問題，展開自由討論，和培養學術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

——編者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

老舍　蔡儀
王瑤　李何林

中央教育部組織的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中的「中國語文系小組」決定依照部定在五一年六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課程草擬一個教學大綱，以便印發全國各校中國語文系。其中「中國新文學史」一課的教學大綱草擬工作，由老舍、蔡儀、王瑤和我（原定有陳涌同志，他因忙未能參加）担任。因爲大家都忙，我們只在一塊商討了二次：第一次根據蔡儀、王瑤和東北師大中文系張畢來三同志所草擬的三份大綱，交換了一些意見；會後再由我參照這三份大綱草擬一個大綱，第二次即討論這個大綱，略加修改通過。而大家認爲第三、四、五編內有關作品各章的那樣分類和所例擧的那些作家，是否妥當，是否掛一漏萬？實成問題。但又覺得有這些小標題，比僅有籠統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每章大標題，對於有些人也許有些幫助。所以決定把這些小標題抽出來，作爲「附註」放在後面，僅供參考。（我們呈交教育部一份，是這樣辦的）這裡我沒有把它們抽出來，而在每一章標題下面加注一句「本章各節小標題，僅供參考」：這當然由我一人負責。

由於這個大綱是四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匆忙的草成，粗濫是在所難免的；所以不但希望全國「中國語文系」的有關教師同志們提示意見，而且還盼望文學界的同志們也能注意、研究和批評，以便將來修改。

李何林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

緒論

第一章　學習新文學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節　目的：

一、瞭解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係

二、總結經驗教訓，接受新文學的優良遺產

第二節　方法：

一、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二、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第二章　新文學的特性

第一節　新文學不是「白話文學」「國語文學」「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等等。

第二節　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第三章　新文學發展的特點

第一節　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發展

第二節　新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的發展

第三節　大衆化（爲工農兵）方向的發展

第四節　新實現主義精神的發展

第四章　新文學發展階段的劃分

一、五四前後——新文學的倡導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二、新文學的擴展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三、「左聯」成立前後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五、由「座談會講話」到「全國文代大會」（一九四二——一九四九）

第一編　五四前後——新文學的倡導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一章　五四前夕的文學革命運動

第一節　文學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

一、雅片戰爭以來的新的社會基礎

二、在這新基礎之上的舊民主主義的文學改良運動

三、新文化運動、無產階級思想及十月革命的影響。

第二節 文學革命的理論及其鬥爭
一、胡適主張的批判
二、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的主張
三、他們的鬥爭——「王敬軒」「國故」林紓、嚴復等
第三節 文學革命的實績
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和「隨感錄」的意義

第二章 倡導時期的創作
第一節 五四運動對新文學的影響
第二節 這一時期的創作
一、詩歌 二、散文 三、小說 四、戲劇

第二編 新文學的擴展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情況
第一節 馬克斯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第二節 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情況及其和新文學的關係

第二章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的殊途同歸
第一節 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家的苦悶、彷徨與轉變
第二節 文學研究會諸人的理論和其創作
第三節 創造社諸人的理論和其創作
第四節 和他們近似的其他作家

第三章 魯迅和其有關的作家
第一節 魯迅的前期作品和其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和他有關的作家

第四章 與封建的和買辦的思想鬥爭
第一節 與「學衡」派的鬥爭
第二節 與「甲寅」派的鬥爭
第三節 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

第五章 「革命文學」的萌芽和生長
第一節 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位作者的主張
一、指出工農兵是革命的主力，主張知識青年應走向工農兵
二、批判「爲藝術而藝術」與「爲人生而藝術」的思想，主張文學應該爲革命服務
三、反對寫空想的革命文學而不從事革命鬥爭；主張深入工農兵，寫工農兵生活
四、主張革命文學的統一戰線
第二節 郭沫若、蔣光慈、郁達夫、成仿吾等的主張
第三節 魯迅前期的文學主張

第三編 「左聯」成立前後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章 本時期的社會政治和文學的情況
第一節 蔣介石反動政權與人民的鬥爭
第二節 「九、一八」以後的新的情勢
第三節 文學方面的大略情況

第二章 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第一節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主張
第二節 與魯迅茅盾等的論爭
第三節 「左聯」的成立和其主張

第三章 與反對派的鬥爭
第一節 與資產階級的「新月」派鬥爭
第二節 與法西斯的「民族主義文學」鬥爭
第三節 與虛偽的「自由人」「第三種人」鬥爭
第四節 與封建餘孽的「復興文言」鬥爭

第四章 理論在論爭中發展
第一節 强調「進步的世界觀」的正確及其偏向
第二節 機械唯物論的錯誤和糾正
第三節 「寫最熟悉的題材」的偏向
第四節 大衆文藝——大衆語——新文字（拉丁化）
第五節 新現實主義的成長

第五章 救亡文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
第一節 「九、一八」「一、二八」後的救亡文藝
第二節 「國防文學」論者的主張
第三節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論者的意見
第四節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成立

第六章 本時期的詩歌（本章四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暴露與歌頌（蔣光慈、郭沫若等）
第二節 技巧與意境（「新月」派、「現代」派）
第三節 中國詩歌會（蒲風、王亞平等）
第四節 新的開始（臧克家、艾青、田間等）

第七章 本時期的小說（本章六節小標題僅

供參考）

第一節 熱情的憧憬（蔣光慈、華漢、丁玲等）

第二節 透視現實（茅盾、葉紹鈞、王統照等）

第三節 城市生活的面影（老舍、巴金、張天翼等）

第四節 農村破產的影像（魏金枝、沙汀、葉紫等）

第五節 東北作家羣（蕭軍、蕭紅、舒羣等）

第六節 歷史小說（魯迅、郭沫若、鄭振鐸（郭源新）等）

第八章 本時期的戲劇（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劇運和劇本（田漢、適夷、洪深等）

第二節 結構、對話、效果（曹禺、李健吾、袁牧之等）

第三節 國防戲劇（于伶、章泯、夏衍等）

第九章 本時期的雜文、報告、小品（本章四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雜文（以魯迅這十年內的雜文爲主）

第二節 報告文學的發生和發展

第三節 遊記（朱自清、郁達夫等）

第四節 散文小品（如茅盾、麗尼、何其芳等）及其沒落（如林語堂、周作人等）

第十章 不滅的光輝

第一節 魯迅的偉大成就

第二節 魯迅所領導的方向

第四編 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第一章 抗戰與文學的抗戰

第一節 新的情勢與新的組織（叙述抗戰開始的情勢，「全國文協」成立及其活動）

第二節 「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叙述文藝工作者特別是戲劇界爲抗戰服務的事實）

第二章 通俗文藝和大衆化問題

第一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服務於抗戰的局限性

第二節 通俗文藝的大量製作

第三節 大衆化問題的討論

第三章 「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

第一節 民族形式問題發生的原因（國內的，國外的）

第二節 幾種不同的主張

第三節 這幾種主張的偏向

第四章 理論鬥爭與不良傾向的糾正

第一節 與「戰國策派」和「抗戰無關論」的鬥爭

第二節 與「反對暴露黑暗」和「爲藝術而藝術」的鬥爭

第三節 與「王實味的文藝觀」鬥爭

第四節 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糾正

第五章 本時期的詩歌——爲祖國而歌（本章五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戰聲」的傳播（郭沫若、馮乃超、高蘭等）

第二節 「人的花朵」（艾青、田間、柯仲平等）

第三節 「七月詩叢」及其他（胡風、綠原等）

第四節 抒情與叙事（力揚、沙鷗、袁水拍等）

第五節 「詩的藝術」（老舍、方敬、馮至、卞之琳等）

第六章 本時期的小說（本章四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後方城市生活種種（茅盾、巴金、靳以等）

第二節 變動中的鄉鎮和農村（沙汀、艾蕪、丁玲等）

第三節 戰爭與人民（丘東平、孔厥、路翎、郁如等）

第四節 新人與新事（碧野、田濤、駱賓基等）

第七章 本時期的戲劇（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抗戰與進步（田漢、洪深、老舍、曹禺等）

第二節 敵區與後方（夏衍、陳白塵、于伶等）

第三節 歷史故事（郭沫若、吳祖光、陽翰笙、歐陽予倩等）

第八章 本時期的報告、雜文和散文（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抗戰初期報告文學的成績

第二節 雜文（「野草」叢書等）

第三節 散文

第五編 從「座談會講話」到「全國文代會」（一九四二—一九四九）

第一章 蘇區文藝活動的優良傳統（補叙）

第一節 古田會議在文藝工作方面的決定

第二節 農村和部隊裡面的文藝活動

第三節 蘇區作品的特點

第二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偉大意義

第一節 確定了「爲工農兵」的方向

第二節 解決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

第三節 確定了小資產階級作家澈底改造的重要性

第四節 其他問題的解決

第三章 與反動傾向鬥爭和「主觀」論戰

第一節 與色情傾向、市儈主義和美帝文藝影響鬥爭

第二節 對蕭軍的鬥爭

第三節 「主觀」問題論戰

第四章 人民文藝的成長和「全國文代大會」

第一節 解放區新的人民文藝的成長

第二節 蔣管區民主運動和文藝運動的情況

第三節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意義

第四節 毛主席文藝方向的偉大勝利

第五章 本時期的詩歌（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工農兵羣衆詩

第二節 叙事長詩（李季、田間、阮章競等）

第三節 政治諷刺詩（馬凡陀、綠原、臧克家等）

第六章 本時期的小說（本章六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新的農村面貌（趙樹理、康濯等）

第二節 土改的反映（丁玲、立波等）

第三節 部隊與戰爭（劉白羽、孔厥等）

第四節 工廠與生產（草明、李納等）

第五節 腐爛與新生（谷柳、老舍等）

第六節 煩悶與憤怒（沙汀、艾蕪等）

第七章 本時期的歌劇和話劇（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新歌劇（柯仲平、賀敬之等）

第二節 新話劇（胡丹沸、陳其通等）

第三節 國統區話劇（陳白塵、茅盾等）

第八章 本時期的報告、雜文、散文（本章三節小標題僅供參考）

第一節 報告文學（華山、劉白羽等）

第二節 雜文（雪峯、聶紺弩、朱自清等）

第三節 散文（解放區與國統區）

（以上各章標題下所注「本章×節小標題僅供參考」一句，乃因我們覺得這樣分類和所例舉的作家，是否妥當，頗成問題。）

教員參考書舉要（初稿，請大家補充，修改）

一、總集

1、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十篇「導論」另有「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印行）

2、人民文藝叢書

3、五四文藝叢書（中央文化部編，即將陸續出版；其中已編選完成的各冊的「序言」，多已發表，可參考）

4、抗戰前出版的著名作家的「自選集」「選集」。

二、論文

1、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2、整風文獻

3、魯迅三十年集

4、亂彈及其他（瞿秋白著）

5、表現新的羣衆時代（周揚）

6、「劍、文藝、人民」（胡風著）及胡風其他論文

7、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8、民族形式討論集（胡風編）

三、歷史

1、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雪峯作）

2、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雪葦著）

3、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李何林編著）

4、中國抗戰文藝史（藍海編著）

5、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胡華編）

注：這個書目，是王瑤同志起草，交大家討論通過後，又由我增改了一些。其中第三部分「歷史」內五種是王瑤同志原數，第一部分「總集」我加了2 4兩種，並把「批評論文集」，「民族形式討論集」，「文代大會紀念文集」三書移在第二部分「論文」內。這應由我一個人負責。

李何林

關於「國語語法綱要」

繆一之

讀了「新建設」四卷一期趙元任先生的「國語語法綱要」一文，覺得有些地方，還有商榷的必要。現在把它一一列舉出來，以供本刊讀者作進一步的討論。

趙先生在四謂語的意義條下說：「謂語不一定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這種說法，似乎不完全正確。一般說，完整句的謂語必須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只有簡略句，特別是簡略的答語，在形式上似乎是例外，但如果把它簡略的部份補充起來，謂語必然仍是「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的。就拿趙先生舉的第二例來說：「我是兩毛錢」，這句句子如果不聯系着上文或問語看，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假定上文是：「他是三毛錢買的，你幾毛錢？」答語：「我是兩毛錢」，實在就等於說：「我是兩毛錢買的。」我們似乎不應就以此為根據，說「謂語不一定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至趙先生舉的第一個例子：「這地方兒可以游泳。」這句話似乎可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人家允許我們在這地方兒游泳，那末「這地方兒」是副詞，附加於動詞「游泳」，主語省略。第二，這地方兒，適宜於游泳。那末「這地方兒」是名詞主語，「可以游泳」是謂語。無論這句句子屬于第一種意義或第二種意義，謂語「可以游泳」都是「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

趙先生在同條又說：『咱們可以說「兩個人坐一把椅子，」咱們也可以說：「一把椅子坐兩個人。」簡單地說：漢語動詞沒有主動和被動的區別。』是的，「兩個人坐一把椅子」和「一把椅子坐兩個人」，意思是完全相同的。不過我們必須辨清，第一句是順裝句法，第二句是倒裝句法。兩句的主語都是「兩個人」，謂語都是「坐」。至于「一把椅子」是「在一把椅子上」的簡略，是一個副詞，附加於動詞「坐」。趙先生就根據這個例子來肯定：「漢語動詞沒有主動被動的區別，」似乎是不妥當的。試再另外舉一個例子：「狗咬殺貓」，我們如果把它倒過來變為「貓咬殺狗」，意義便完全兩樣。如果我們要保持原意，必須改成「貓給狗咬殺了」。所以漢語動詞，並不是沒有主動和被動的區別。不過，這種區別和外國語一樣，只限于外動詞。趙先生原例中的動詞「坐」，是一個內動詞。內動詞是沒有這種區別的。

趙先生在五謂語的種類條下提出了主謂結構的說法。趙先生以為在「這個人心好」這句里，「這個人」是「心好」的主詞，「心」又是「好」的主詞。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我覺得「心好」的詞性，有兩種可能的解說。第一種，「心好」合起來作一個形容詞。這一類的形容詞在英語裏也很多。如：Kind-hoarted; Good-natured 所不同的，在英語裡，當這些詞用作謂語的時候，前面必須有一個綴系詞。這樣的綴系詞，在漢語裡卻可省略。這可說是漢語句法上的一個特點。「心好」和「面善」，「性急」一樣，都是由一個名詞和一個形容詞黏丼而成。第二種，「心好」的「心」表面上看是一個名詞，但實際上它不是眞正的名詞，而是省略了介詞的副詞仂語，用來限制形容詞的意義。這種句法，在漢語裡，非常普通。讓我們來隨便舉幾個例：「他身體好」，「她英語好」；「他經驗豐富」；「他錢多」。「身體好」是說「好」限于身體方面；「經驗豐富」是說「豐富」限于經驗方面，餘可類推。有了這樣的副詞仂語，形容詞的意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這種句法，在英語裡也很普遍。例如：He is good in English, Ho is rich in experience. 無論照第一種或第二種解說，「心」不是「好」的主詞。主謂結構一詞，能否成立，值得從長討論。趙先生在六主語的種類條下，提出了動詞主語這名稱。我覺得漢語沒有語尾變化，每一個字或詞的詞性，完全要看它在句中的作用來決定。孤立地看一個詞是無法決定它的詞性的。就以「走」字為例。它可能是動詞，如「他走了」。可能是形容詞，如「走狗」、「敗夫走卒」。亦可能是名詞，如「走為上策」，一個動詞，做了主語，便不再是動詞。我的意思，動詞主語，應改為動性名詞主語（這個名詞是否妥當，可另行商榷。）這裡要附帶提到的，趙先生把「逃儍頭」，作為動詞（？）主語加體詞謂語的例子，也有商榷的必要。我以為「逃儍頭」，不是一個完整句，而是一個簡略句。同時「逃」是謂語，不是主語。如果把它補充起來，可變成：「你如果逃，你便是儍頭」；或「誰逃，誰便是儍頭。」這樣的簡略句，在漢語裡，例子是舉不勝舉的。此外，趙先生把「眞儍頭」的「眞」字，先斷定為副詞，然後再肯定「儍頭」為形容詞，這是不妥當的。實際上「眞」可以是名詞，如「眞、善、美」。可以是形容詞，如「眞小人」、「眞話」。也可以是副詞，如「眞糟」、「眞好」。這裏我們應以「儍頭」的詞性來決定「眞」的詞性。如果「儍頭」是名詞，「眞」便是形容詞；如果「儍頭」是形容詞，「眞」便必然是副詞。「眞儍頭」中的「儍頭」依我看是名詞，「眞」是形容詞，正如「眞小人」中的「小人」是名詞，「眞」是形容詞一樣。我們如果先硬派定「眞小人」的「眞」字為副詞，再肯定「小人」為形容詞，那便錯了。

趙先生在同條中說：「漢語裡頭，修飾者一定得擱在被修飾者的前頭。」如果這裡的修飾者是指形容詞，被修飾者是指名詞，趙先生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但如果修飾者是指副詞，被修飾者是指動詞或形容詞，這個規律，便不能完全適用了，因為副詞可以擱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頭，也可以擱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後頭。例如：「死快了」、「聽清楚了」。副詞「快」和「清楚」擱在動詞「死」和「聽」的後頭。「好極了」、「糟透了」。副詞「極」和「透」擱在形容詞「好」和「糟」的後頭。

趙先生在七並列關係條下說：「漢語的並列關係，只用連着說來的表示。」我覺得趙先生似乎說得太肯定了一點。在漢語裡，並列關係在原則上，應該用連詞來表示，不過，有時連詞可以省略。漢語句子，除掉要注意語法外，還要注意到句子的字數，使讀起來順口，句子裏頭有些部份連連詞在內，所以被省略掉，往往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和我和他都來了」讀起來不如「你、我、他都來了」，來得順口。至于「張三李四是兩個人」和「張三和李四是兩個人」，讀起來一樣順口，「和」字省不省，沒有多大問題。不過還有些句子裏，如果把連詞省掉，讀起來便不順口。例如：「媽媽我都來了」不如「媽媽和我都來了」來得順口。在另外一些句子裡，連詞絕對不能省掉，例如：把市和區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得更好。「市」和「區」中間的「和」字絕對不能省掉。

在同條下，趙先生說：『在「你跟我都去」一類結構裡，「跟」不是眞正的並列連詞，這句話實在是動詞結構連用式。』我覺得這句裏的「跟」，一定是並列連詞，而且這句話，決不是所謂動詞結構連用式。這可以從「都」字看出來，因爲至少有兩個人，才能稱「都」。這裏所謂「都去」，明明是指你和我一道去。在同條下趙先生又說：在「又笨又傻」裏頭，「又」是副詞，我覺得，「又」應該是連詞，不是副詞。在「你又來了」一類句子裏的「又」，才是副詞。

關于「聽得懂」、「聽得清楚」、「寫得好」，據註四說「得懂」，「得清楚」，「得好」都是可能補足語。我對于這種說法，不敢同意。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聽得懂」是「能夠聽懂」的意思，這是不錯的。不過，「得懂」決不是可能補足語。這裡要牽涉到二字動詞（由兩個字黏附而成的動詞）的組成問題。二字動詞，組成的方式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1由兩個同義動詞組成的，例如：「鞏固」，「訂立」。

2由一個副詞加一個動詞組成的，例如：「嚴禁」、「輕視」。

3由一個名詞加一個動詞組成的，例如：「根除」、「席捲」。

4由一個動詞加一個名詞組成的，例如：「關懷」、「同情」。

5由兩個動詞組成，前一個動詞是後一個動詞的因，後一個動詞是前一個動詞的果。例如：「聽懂」，這是說聽了才能懂；「看見」，這是說看了才能見；「分開」，這是說分了才能開。後一個字是前一個字的發展。在這類動詞的中間，肯定句可以插入一個「得」字，表示能夠或提供保證的意思，如：「聽得懂」，「看得見」「分得開」。但是以上1、2、3、4類的動詞，中間却不能插入一個「得」字。

6由一個動詞加一個副詞組成的，例如：「搞好」，「殺光」，「寫好」。這一類動詞中間，也可以插入一個「得」字，表示「能夠」或「讚美」的意思。例如：「搞得好」，有兩種意思，一種是「讚美」過去的工作搞得好，另一種是保證未來的工能「能夠」搞好。這要看了上下文才能確定。「寫得好」也是一樣。至于「得好」的詞性，或如5類，把三個字看作一個動詞，或把「得好」作爲副詞，附加于動詞「寫」，似乎都說得通。

至于「聽得清楚」，「得清楚」是副詞，附加于動詞「聽」，表示能夠聽清楚的意思。

註五似應改爲：『……動詞有賓語的時候，漢語最常用的說法，是把它打散，改成兩個動詞結構（？）。是主要動詞，變成補足語。例如：「碰瞎了眼睛」「碰瞎了」是外動詞，眼睛是賓語。把它打散，變成把「眼睛碰瞎了」。又如：「吃完這碗飯」，「吃完」是外動詞，「這碗飯」是賓語。把它打散，變成「把這碗飯吃完了」……這裏「碰瞎」和「吃完」都是補足語，用來說明「眼睛」和「這碗飯」所接受到的動作。』

答繆一之先生

李榮

討論繆先生的意見以前，有兩點要聲明：

（1）底下說的話，並不能代表趙元任先生。並且可能還有誤解趙先生的地方。

（2）討論語法，除承上文的省略，而談時的省略以外，最好不隨便應用「省略說」。繆先生好些意見，都應用省略說。這個辦法不太妥當。咱們尤其不能比附外國語，說國語某些地方是省略的。

現在分條討論繆先生的意見。

（一）據我們的了解，「謂語不一定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例如：（1）這地方兒可以游水；（2）我是兩毛錢。」這段話並不是說，「謂語一定不指……」是說，「謂語大部分是指……例如（1）……可是不一定全指……例如（2）……」

分析句法的時候，我們儘量避免假設有「簡略的部分」，再加以補充。即使把（2）「我是兩毛錢」改成「我是兩毛錢買的」，謂語並不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

繆先生對例（1）的第二種解釋，事實上跟趙先生的原意是沒有衝突的。繆先生的第一種解釋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把「這地方兒」認爲副詞事實上沒有好處。繆先生說「主語省略」，不知道補充出來是什麼樣子。

（二）討論「漢語動詞沒有主動被動的區別」，請參看趙先生原文三十二節（北京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譯文第五節）跟附注。漢語動詞的意思大部分有主動被動的區別，可是在形式上不一定有記號。

（1）「兩個人坐一把椅子」，（2）「一把椅子坐兩個人」，都是很自然的句子，不能分順裝倒裝。繆先生認爲（2）是倒裝句法，並且說其中的「一把椅子」等於「在一把椅子上」是副詞 。倒裝省略都是勉强的說法，我們不知道繆先生的根據是甚麼。（趙先生的英語譯文，(1) Two people sit on one chair. (2) One chair seats two people.）原文的意思並不是說，在漢語的句子裏，動詞前後的成分完全可以互換。「貓給狗咬死了」跟趙先生三十二節的例「領子給他撕破了」結構是完全一樣的。趙先生在那一節又舉了兩個例：「我要洗

臉」(I want to wash my face)，「臉還沒洗哪」(My face has not yet been washed)，「洗」是外動詞，「沒洗」的「洗」並沒有被動的記號。

（三）趙先生說，在「這個人心好」裏頭，「心好」是主謂謂語。繆先生反對這個說法，另外提出兩種解釋：（1）「心好」是形容詞，（2）心字「是省略了介詞的副詞附語」。我們認爲（2）省略說以不用爲妙。（1）說「心好」的作用跟形容詞一樣，沒有甚麼壞處，形容詞也可以作謂語。可是用繆先生的說法代替趙先生的說法就有缺點。繆先生得另外找術語來說明「心好」兩個字的關係。要是「心好」裏頭心跟好的關係是主語謂語的關係，「這個人心好」裏頭，「心好」是謂語，咱們就不必更動趙先生的說法了。

繆先生舉英語的例子說明他的意見。咱們應該注意，兩個語言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示相同的意思。因此中英對照不一定能讓我們更加明白中文的結構，弄得不好反而讓我們走到「省略說」裏頭去。

趙先生「國語入門」頁一八六也舉了漢英對照的例子。趙先生說：「在底下的對照表裏頭，兩句漢語句子中的任何一句，可以譯成三句英語句子中的任何一句，可是只有第二句在語法結構上是相配的。

（1）他心好　（英語沒有這種說法）

（2）他的心好　His heart is good.

（3）（漢語這種說法不習慣）　He has a good heart.

（4）（漢語沒有這種說法）　He is good-hearted.

（四）說到動詞主語，請看趙先生原文二十五節動詞的定義。至於漢語有詞類的分別，跟分別的原則，請看趙先生原文二十一節至二十七節。有語尾變化的語言，動詞做主語要變形，才有動詞性名詞一類說法。漢語動詞做主語不變形，說他是動詞主語直截了當，多乾脆，何必來個動性名詞。這兒再重複一下趙先生下的動詞定義：「動詞是可以受副詞「不」字修飾（「有」字受「沒」字修飾是例外），後頭又可以加句尾後加成分「了」字的詞。」

現在說到「逃僞頭」如何分析的問題。原文這一段是腳注，譯者給挿入正文的。趙先生說「可能是個例子」，說的不十分肯定。因爲同類的例子太少，趙先生想在「動詞主語加體詞謂語」之外另找解釋，就舉「眞僞頭」做例子。原文的「眞」注明是really, very 的意思，表示不是普通眞（小人）假（君子）的眞，譯文把英語注解略去，因此引起糾紛。譯文應該更正如下：

動詞主語加體詞謂語要是有的話，一定非常少。「逃僞頭」可能是個例子。不過，咱們既然可以說「眞僞頭」，（譯文應該加三個字：那兒的）「眞」(really, very)是副詞。「逃僞頭」（譯文應該改作：，這兒）的「僞頭」可以算是形容詞謂語。

繆先生的原則是先認爲「簡略」，再加以「補充」。這手續以不用爲妙。並且這個手續很難應用到「走行，不走也行；打是疼，罵是愛」上頭去。

（五）趙先生說：「從屬關係最簡單的規則是修飾者擱在被修飾者的前頭。」繆先生反對這個說法，認爲「好極了」的「極」修飾「好」。

我們認爲，動詞前頭的副詞（修飾語），跟動詞後頭的補足語，在句子裏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副詞擱在動詞前頭，修飾動詞，作用跟形容詞擱在名詞前頭，修飾名詞一樣。這一點是大家同意的。補足語擱在動詞後頭，他跟動詞關係是陳述的關係，很像謂語跟主語的關係。因此，補足語說的是句子裏頭的要點。比方說，

往右轉一點兒，再多轉一點兒。好，轉多了，往左邊轉一點兒罷。（趙先生「外國人用中國國語留聲機片課本」第十二課頁一三四，一四〇，一四二，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二五年。）

在這段話裏頭，「多轉一點兒」的要點是「轉」，不是「多」，「多」是修飾「轉」的。「轉多了」的要點不是「轉」，是「多」，「多」是陳述「轉」的。這種區別，有時候兒是很細微的。例如：

（1）請你慢一點兒說。（2）請你說慢一點兒。

（趙先生國語入門頁一四一。）

請比較：

（3）這個聰明人。（4）這個人聰明。

（3）的「聰明」修飾「人」，（4）的「聰明」陳述「人」（是謂語跟主語的關係）。（3）（4）的區別是必要的。（1）（2）的關係跟（3）（4）的關係相似，（1）（2）的區別也是必要的。所以，咱們需要副詞（修飾語）跟補足語兩個名目，來表示兩種關係。

（六）說到並列關係跟並列連接詞，請看二十六節，三十五節（光明日報譯文第八節）：

漢語也許沒有眞正的連接詞，有些字很像連接詞，實際上是動詞。（二十六節）

漢語的連接詞跟副詞是很難區別的。（三十五節）

趙先生把一般所謂連接詞分到動詞副詞兩類裏頭去，雖然說的都不怎麼肯定。據我們所知，這是趙先生的新意見，在以前的著作裏並不如此。「北京，常州，蘇州語助詞的研究」（淸華學報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六）頁八六八：

例如「跟」本是有「跟隨」，「附屬」等意思的動詞；用久了，它的具體的意義洗淡了，就變了北京當「與」、「及」、「and」等用的極抽象的連詞了。

趙先生沒有把新意見的理由充分發揮，揣摩他的意思，大概是因爲不願意管（1）「我想跟你談一談」的「跟」叫動詞，（2）「你跟他是朋友」（以上二例據趙先生國語字典）的「跟」叫「連接詞」。跟字這兩種用法（意義）沒有一定的界限，中間有過渡的（兩可的）例子：（3）「我跟你去吧」。並且（2）的意義可能是從（1）經過（3）變來的。就歷史的來歷說，本來是一個。就現在的用法說，中間的界限不清。所以就把（2）的「跟」認爲意義變淡的動詞。

要是管「跟」叫動詞運用起來有點兒不便，如例（2）。管「又」叫副詞可沒有什麼不便。把（1）「又笨又傻」的「又」認爲是連接詞，（2）「你又來了」的「又」認爲是副詞，看不出有什麼好處來。（下轉73頁）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下）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在中國新法學研究會的講演——

蘇聯法學專家　H · Г · 蘇達里可夫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發展的基本階段

我們現在來研究我們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現在我們應當簡略地研究一下法律科學發展的主要階段，其次來說明它的現狀。

法律科學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很早階段，就已經以其萌芽的形式產生出來，並已有了數十年的歷史。還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時候，就已產生了科學裡個別的派別，它們各依不同的見解來說明國家與法律的起源和本質。如果不談許多細節的話，那就可以說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存在的全部時期，在國家與法律科學裡所特具的現象，就是各式各樣的汎神論或神權論曾經是佔有統治的地位。「科學」、「科學結論」等等的字眼，甚至是不完全適合於這些遠古時代裡對於國家與法律所作的論述。這些論述離開科學是還得很的。此外，這些論述的本身在多數的場合是沒有任何完整的觀點體系的性質，而是片斷的，常常是包含在關於其他社會生活問題的著作中的。

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了封建的生產方式。作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帶來了新的較高的生產方式，它在社會科學的發展上引起了某些活躍，其中也包括國家與法律的科學。先進的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候，曾堅決地進行了反對各種神權「理論」的鬥爭，因為這些神權理論是用超自然的非人間的，即上帝的命令來解釋國家與法律之起源和本質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主張必須把社會現象脫離開與上帝及宗教的任何關係去加以觀察，其中大多數乃是熱烈的宗教反對者，他們曾堅決地進行了無神論的宣傳。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在國家和法律科學裡特別流行的資產階級學派，就是所謂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的創始人古高・格洛秀（荷蘭），霍布士（英國）、盧梭（法國）等人，主張以人的自然狀態作為理解法律本質的出發點，而不是以超自然的神的意志。這一學派的擁護者認為權利應當分成兩類——自然權，即當然權，這種權利是人從他一降生起就享有了的，及現實權，即現存權（存在權），也就是在法律規範中表現出來的而和當然權（自然權）不相一致的權利。

從自然法學派的立場來看，法律，它不僅是社會現象，而首先是自然現象。根據這一學派擁護者的意見，人以其降生和存在的這個事實，就是要獲得一定的權利。在人的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之中就其名稱應當是：自由權、平等權、同他人一樣的私有財產權、參加社會生活權，自由訂立契約權（所謂契約自由）等等。

自然法學派的代表者把現行的、還很明顯地表現封建關係之殘餘的現實權利（例如為一定的階層所規定的特權，土地所有權的限制，契約自由的限制等等），而首先要把封建習慣宣佈為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他們認為人民有權對於在專制時代所存在的不公平的現象進行鬥爭。他們要求用那種只是符合於人類理性的成文法，來代替習慣。

自然法學派的代表者們在國家觀、法律觀方面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思想。

他們認為只有人民才是主權底執掌者，而關於那些人以及用什麼方式實現這一主權的問題則也是應由人民自己來解決的。大多數自然法學派的代表者乃是議會制政體或是有限制的君主政體（即和憲法以及在君主之下所設立的代議機關結合起來的君主制度）的擁護者。

自然法學派的擁護者們在觀察國家起源的過程時認為，國家是由於訂立社會契約之結果，亦即由於人們底自覺的意志表示之結果而產生出來的，因為人們已得出結論，認為要是沒有國家權力，社會就不能繼續存在的。他們認為絕對的君主政權，是違反契約的而且是不符合於自然法底原則的。

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進步的思想家亞歷山大・尼古拉也維契・拉其舍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年）是自然法學派在俄國的最著名的代表者。拉其舍夫在其名著「由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及其他許多著作裡，曾號召推翻專制政權，號召農奴們進行反對地主與農奴制的武裝起義。拉其舍夫在其著述裏認為俄國的專制制度是不公平的橫暴的國家制度，並且堅決地主張建立共和制度。

由上述可見，自然法學派曾有過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進步之點。這個學派是代表了同封建制度進行鬥爭並因此也曾注意到把人民大衆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的資產階級底觀點和目的。自然法學派的代表者所提出來的口號，曾促進了資產階級來實現這些目的，正因為如

此、所以自然法學派底很多原則在這樣一些法令中，如人權宣言（一七八九年）拿破崙民法典（一八〇四年）、美國憲法等等裡面，找到了自己立法上的表現。

但是，自然法學派按其內容來講，乃是唯心主義的。它（自然法學派）沒有把國家與法律底起源和本質同物質的社會關係聯系起來，而是把一切都歸結到自然的因素，或人類的理性上去。

為自然法學派底代表者所發展的觀點，大致上是適應於從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的（亦即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並一直至巴黎公社即一八七一年為止的資本主義發展底第一階段。斯大林同志把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這一時期，說明為資本主義關係在各先進國家裡勝利和奠定的時期，也就是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及資產階級的國家和封建制度比較起來曾起了進步作用的一個時期。

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以後所開始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七年，即到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止。斯大林同志把這一時期說明為資本主義開始沒落的時期。巴黎公社給了資本主義第一個嚴重的打擊，而在這一階段的末期，俄國的工農們則給了資本主義一個驚天動地的打擊。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到這一階段就逐漸轉變為帝國主義，亦即轉變為腐朽的資本主義。

作為這一階段底標誌的，就是資產階級底觀點上的重大變化，其中也包括資產階級法律科學代表者底觀點上的重大變化。像在萬花鏡裡一樣開始出現了日益新奇的流派和傾向，其中難以分別出來那一個是最流行的和最著名的學派。在資產階級科學裡的這許多流派與傾向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學派：

歷史法學派。（古斯塔夫・古格・普哈達）。

心理法學派。（克拉勃・彼特拉日次基）

實證法學派。（葉林格）。

社會法學派。（狄驥）。

有機論。（斯賓塞）及其他許多學派。

在從前，任何一個學派通常是結合著大多數的擁護者（例如結合在自然法學派裡），而這一學派也就是基本的、佔統治地位的、一切其餘的只不過是它的（這一學派的）支流而已，可是現在則差不多每一個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都希望作領袖，都希望創造一種似乎是新的（依他的意志）獨特的學說。但是，不管在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這一發展時期中所盛行的學派是多麼五光十色和意見紛紜，而我們仍可以指出某些共同的最凸出的要點來，而這些要點歸根結底，乃是這些為數眾多的學派及其支流所共同具有的。

第一，這些學派對於自然法學派底擁護者們所提出來的命題作了修正並加以摒棄。如自然法學派曾經提出了法治的要求，曾經提高了法律在調整社會關係上的意義並號召了根除封建的習慣（即不成文的行為規則），而如歷史法學派則公然不諱地號召恢復中世紀的習慣，並宣佈調整人與人間之社會關係的最完善的形式不是法律而是習慣。這個學派就是和自然法學派比較起來也已經是退後了一大步。

第二，日益明確地表現出想把國家和法律說成是建立階級利益底統一與協調的手段之傾向。

第三，日益明確地強調出每個公民首先要對國家嚴格進行其義務的必要性，並宣傳說，人的權利並沒有實際意義，而僅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說社會制度好像只是到每個社會成員都不關心其權利而是模範地來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能或者對社會的義務時，才能是盡善盡美的。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資產階級法學的一個代表者田昂・狄驥（法國人）想在法律和國家的科學中創造一種新的「獨特的」學說，他聲稱社會發展的原則不是各階級間的鬥爭，而是社會的協作。他公然號召人們放棄其個人的權利，而嚴格遵行對於社會與國家的義務。狄驥宣佈說，每個公民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就是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之原因，在法律上所應規定的只是公民對社會的義務，每個公民都應當絕對地履行這些義務。這是向法治進攻，向公民權利進攻（即使就是形式上的但畢竟是權利呀）。

第四，日益明顯地表現出想把國家——法律現象底本質歸結到人的心理體驗方面去的傾向。在二十世紀資產階級法學中有一個派別之所以獲得心理法學派的名稱，就是因為這派的代表人物公然否認法律和社會現象的聯系，而號召在研究法律現象時要轉移到人們主觀的心理體驗方面去，因為在這種心理體驗上才彷彿可以找到對於像法律那樣複雜範疇的本質問題之解答。

第五，出現了一種打算把有機界所具有的發展規律移用到社會上去的企圖。例如所謂「有機體理論」的擁護者（斯賓塞等人）硬說社會也有着動物界所具有的那些特點。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把國家比作一個大的有機體，說它差不多也有着任何其他生物所具有的那些構成部份和感覺器官，即腦子、血管、手、足等等。

第六，已經部分地走下歷史舞台的各種神權論又重新復活起來了。

諸如此類的五光十色的觀點——這是證明資產階級科學已經放棄其從前所宣佈的原則，而堅決地向後轉了，它不僅力圖要停止社會生活不斷前進的運動，而且想把這一運動向後倒轉過來。諸如此類的五光十色的觀點，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科學軟弱無能的象徵，是在解釋社會生活複雜現象上孤立無援的象徵。

資產階級的法學，向來是現在也依然是恭順地表現自己的階級意志的。資產階級在與封建制度鬥爭的時期所曾關心的，是宣佈法治原則（當然是階級的法治，鞏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的法治），是宣佈一切人在法律前形式平等的原則，以便藉此吸引群眾到自己方面來，而現在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它就完全不關心去實現它所提出的口號了，它所關心的只是如何鞏固自己階級的統治，它所關心的是停留在已達到的水準上，而千方百計地來阻礙社會的前進，並使自己在社會裡的統治地位萬古不易。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已經放棄了它自己在某一時候所宣佈的那些原則。

從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起，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在一九一七年

以後，開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時期，因爲世界已分成兩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的特徵，就是階級鬥爭空前的尖銳化，反動勢力、沙文主義和窮兵黷武的加强。美國變成了帝國主義和世界反動的中心。正是在美國那裡開始形成世界統治的思想，正是在那裡從過去歷史當中尋求關於科學、文化、藝術方面最反動的廢物，而且把這一切已經扔在歷史的髒水坑中的東西又搬到現世來，稍稍加以清除，使它適應於新的條件並把它奉爲彷彿是「科學」的最新原理。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現狀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現狀可以稱其爲完全解體的時期，是所謂法律科學本身對法律和法治採取堅決進攻的時期。法律科學領導對法律進攻，號召無法無天和任意橫行，這聽起來彷彿是很奇怪的，但事實正是如此。

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對內政策和國際政策上，現在已經不加以任何粉飾，而完全公開地表現着法律的虛無主義（就是否認法律），把法律和法治宣佈爲過時的觀念，因爲法律和法治彷彿是妨礙着國際「合作」的實現和人們間「一致」的確立。並且「合作」和「一致」是在純粹的美國主義精神上來加以了解的。首先最劇烈地受到攻擊的乃是國際法，就是以規定國際關係，維持各民族間的友誼和合作，用法律方法來解決國與國間在實現正常國際聯系過程中所發生的個別糾紛問題爲使命的法律。就是這一法律現在也好像成了橫在新出現的世界文明「救世主」（是他們自命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所熱烈趨向的世界統治道路上的障礙物。

向國際法的原則進攻是用國際「一致」，鞏固國際「合作」這一套具有煽動性的辭句爲藉口來實行的。但要是情形的確如此，要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確在某一時候想到過國際合作的話，那末難道國際法還不能當作實現這個合作的極有效的工具來加以利用嗎？可是，在美國人看來，辭句是辭句，事情是事情，侵略還是侵略。如果相信美國哲學家、法律家和政治家的話，那末，像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這類國際法的原則就是過了時的，並與國際「合作」不相配合的。國內法（就是某一國家的政府所頒行的法律）也就是同樣的過了時的，並應該代之以世界法（就是世界政府所頒行的法律）。而有主權的獨立的國家，也就應該讓位於以世界政府爲首的世界國家了。每一個人，甚至是不很熟悉外交上全部微妙之處的人都完全清清楚楚，如果美國帝國主義者說到世界國家和世界政府時，那末就應了解爲在世界聯邦合衆國招牌下的美國底世界統治。每個人也很清楚，當談到世界政府的時候，這就是表示這政府的所在地要設在華盛頓，或更正確些說，是設在華爾街。每個人還應該清楚，如果談到建立世界法律的話，那末這些法律是要歸反動的美國法律家來制定，由白宮來批准，而完全反映美國壟斷集團的意志。

這種國際「合作」方案對於冒險的美帝國主義者，可能是非常適合的，但世界各族人民是不可能接受它的。世界上一切進步分子始終認爲，只要是眞正地，而不是照着美國方式去了解合作和主權，那末，國際法規範是完全能夠同國際合作，同國家主權與民族主權配合起來的。

如果關於「世界政府」和「世界法律」的議論，只限於美國學術大學和辯論會的講堂內，那還不算十分糟糕的事情，但是這些做夢似的思想竟有了它實際的而使世界各族人民十分不安的表現。實在這個臭名昭著的馬歇爾計劃，或者如美國人所稱的「對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害國家的經濟援助計劃」，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是企圖首先爲建立歐洲合衆國，然後建立全世界合衆國，創設物質基礎。這個計劃的名稱是很「謙遜」的，而其本質則是指望把馬歇爾計劃國家的經濟操縱在自己的手裡，使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完全服從於美帝國主義的目的，而在對內政策上則迫使它們執行與美國國內所執行的同樣政策——對一切進步運動實行殘酷的恐怖和鎭壓的政策。

世界各族人民，其中也包括那些聽候執行華盛頓任何命令的國家底人民，一天比一天相信所謂美援的眞實意圖究竟是什麼，以及它所帶給民族和國家的，將是怎樣毀滅的後果。

美國反動派對法律和法治原則所採取的進攻，不僅限於國際法，而且國內的法治和法律的殘餘也在同樣程度上妨害着反動派。

大家都知道，即使拿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來看，美國法律體系從來也不是特別完備的。而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美國，得到普遍適用和發展的，是所謂成例法，就是說，這種法底基本淵源不是政府所公佈的和適用的法律，而是對某種具體案件的法院判例，而它就成爲以後法院遇到類似的案件時下判決的根據。

這種落後的和不完全的法律體系，在美國和英國完全有意長時期把它保留下來，而且現在還繼續保留着。它——這個體系就永遠給了這樣一個充分的可能性，就是在某些法律的外形之下，可以來實行實質上的專橫和違法。所以，美國法律家在過去雖未能以論述法律和法治問題的宏大的作品和研究而出名，而在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代表者中間，也曾經找不到有甚麼出名的美國法律家，可是，現在，當企圖完全消滅法律和法治而作十字軍進軍的時期，當中世紀的暴政和風習重新復活的時期，美國的法律家和政治家卻牢固地掌握了霸權。在這裡，美國的食人生番就完全顯現了它的醜惡原形。

並非不出名的哥倫比亞教授莊久還在八年前就斷言說，法律規範本身只不過是「一片紙」而已，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不是法律規範，而是行政的和審判的實際工作」。根據莊久的意見，法律是事實上行使的東西，事實上發生的東西，而完全不是寫出的東西。法律或法規，根據莊久的意見，應當看作是「一種活動，用這個活動可以對其他的活動實行干涉」。莊久認爲，如果有法律規範存在的話，那末它們永遠是「固定的」，並只能適用於「固定的場合」。但因爲社會生活是十分複雜的，並且它與法律規範所規定的固定場合又經常不相適合，所以，根據莊久的意見，這種場合可以並且應當由警察或法官來自由處理。例如，私刑處死黑人事件，顯然是屬於這種「不固定的場合」，大家都知道，在美

國，處死黑人不僅不會受到懲罰，而且參加處私刑的好漢，還會變成某種市井的英雄。

另外一位學者，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列威林的論斷，也很能說明現代美國法律科學的現狀的。這位教授直截了當地聲明，在美國，警察及其他行政活動所應依據的，決不是法律，而是「在傳統所確定的範圍內的相當常識」底自由裁量。至於講到法律規範，根據列威林的意見，它們「大部分不是不够明顯，就是不够明智，或者是當要用它的時候就不能明確地解答問題」。這就是一個似乎負有使命對青年，即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大學生灌輸違反法律和法治的人底行爲方式。

類似這種性質的論斷，還可以隨便舉出許多來，但是，所有這類論斷幾乎都表現像莊久和列威林所主張的同樣的法律觀點。我還可以舉出一個福特根大學的教授肯乃第的意見，這是現代美國流行的哲學學派——實用主義的瘋狂擁護者。我們且看肯乃第關於美國法律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遠景所說的話吧：「法學沒有能力給美國法律創造一個足够堅固的根基。美國法律的未來也許最好是用亞里斯多德和阿克文斯基的理想來加以保證……」。由此可見，現代的和未來的美國法學研究家底注意力所應集中的方向了，這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阿克文斯基的神學理論上去，而這個理論遠在中世紀就已斷言，一切權力都是神賜，而這個權力的一切命令都應當看成神的命令……。

從現代美國法律科學代表者之一——肯乃第的言論中，我們就可看到它的悲慘結局，肯乃第及其黨徒們是在號召着上帝和「神明的」阿克文斯基來充當絞殺和平、進步和文明的帝國主義的辯護人。

美國的哲學家和法律家既無力創造出任何新的、眞正科學的、有理論根據的東西，於是就只好剽竊已經過時了的，從歷史舞台上滾了下去的反動學說來作爲自己的觀點。上面我們已經引證一位號召返回到阿克文斯基時代去的「法學教授」底言論。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從德國法西斯分子那裡剽竊國家與法律人種論的「科學好漢」。如果說，德國法西斯分子曾經硬說法律就是「德國人認爲是法律的一切東西」，那末，它的美國的後繼者則聲稱「法律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認爲是法律的一切東西，也就是美國人認爲是法律的一切東西」。斯大林同志很久以前就已經把人種論稱之爲「吃人的聖經」，它與科學是有天淵之別的。

所以，在美國無論是在政策上或是在實行政策的方法上，都是在回到舊的時代，回到中世紀，在國內以及在國際舞台上，代替了法律和法治的，乃是一種粗暴的不加遮掩的力量。一切妨礙實行這個力量底政策的，妨礙鎮壓羣衆的東西，都堅決地予以拋棄。甚至有美國代表簽字的具有國際意義的文件，如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也被拋棄了。

遠在一九一一年，列寧即以天才的慧眼指出，帝國主義者在實行「徒勞的努力，以期擺脫它所建立的而又爲它所不能忍受的法制」。

帝國主義及其法律科學當時情況的醜惡面貌，就是這樣的。

在我們今天，到處都在表現出帝國主義衰敗的徵象，它的解體，以及它在這個世界上對於人類已成爲無用負担，並應該退出歷史舞台的徵象。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即在三十二年前所說的話是不朽的。列寧遠在那個時候，就天才地預見到英美帝國主義所走的方向，他說：

「我們看到，像英美那樣一些曾經比其他各國有更多可能保持住民主共和國身份的國家，也和當時德國一樣野蠻地、瘋狂地來作孤注之一擲了，而因此它們也同樣地迅速，也許還要迅速些接近着德國帝國主義所曾如此成功地達到了的那個結局。起初，它（德國帝國主義，譯者註）不可思議地吞下了四分之三的歐洲，變得又肥又胖起來，後來却馬上就脹破了，並留下了一種極其難聞的惡臭。而現在英美帝國主義就是在奔向這一結局」（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三八頁）。

一些新的、生氣勃勃的、有生命的力量正在世界上生長和成熟起來。這些力量比起衰敗的帝國主義來，是強大得不可限量。而未來正是屬於它們——世界上這些充滿朝氣的進步力量的。

在二十世紀之初，歷史舞台上出現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和農民，即普通的人民所建立起來的。在二十世紀中葉，好多西方國家的人民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站起來了，而現在這些旗幟已飄揚在民主中國的上空，越南人民的勝利也日益接近了，和平民主陣營一天一天在成長起來，它在自己的旗幟上標誌着眞正的人類眞理和人道主義。

只有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才有力量保證每個人有全面發展的可能，有利用文明和文化底一切最新成就的可能。只有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才能爲法律和法治底眞正昌盛創造條件。

以美國爲首的世界反動派正在丟棄民主底最後殘餘，正在把資產階級某時所宣佈的原則置於汚泥之中。而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這是從帝國主義底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因爲對它來說，法治底範圍是狹仄的，並且也是不能忍受的。

已經取得勝利和繼續在取得勝利的各族人民正在創造自己的新的紀律，而這種法紀是保護着人民大衆的勝利果實，頌讚着世界上一切物質和文化財富的創造者——人。

蘇聯的法律科學

在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了的國家——蘇聯，科學是爲偉大崇高的目的而服務的。它所負的使命是幫助人民深刻認識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用客觀發展規律的知識把它們武裝起來，使人民大衆在其實際活動過程中，能够獲得最好的成果。

建立在馬列主義堅固基礎上的蘇維埃法律科學，也是爲這種目的而服務的。

蘇維埃法律科學所負的使命是在理論上綜合蘇維埃國家建設的廣博經驗，綜合司法機關活動的實際經驗，並對完全新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類型即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與法律問題加以研究解決。

馬列主義的敵人，勞動大衆的敵人以及自命爲馬克思主義之友的個別糊塗虫，還在人民大衆掌握政權以前，就都硬說，彷彿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法律與國家就會變成無用之物而立卽（如他們所說在革命勝利後的次日）開始消亡下去。根據這種顯然錯誤的、敵對的論斷，有一些糊塗虫就作出了法律科學也要成爲無用之物的結論。他們公開出來反對開展法律敎育和法律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

共產黨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及時地揭發了此類謬論的特殊危險性，並採取了一切方法使蘇維埃國家的法律科學沿着正確的道路向前發展。

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和斯大林就已指出必須重新建立並儘力鞏固新的國家制度，以代替舊的腐朽的剝削制度。

應當特別着重指出，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與法律學說的發展中，像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這本書是列寧在十月革命的前夜，而恰好在勞動羣衆準備對俄羅斯資產階級地主制度實行堅決進攻的時候寫成的。在這本著作中列寧作出了一個爲爭取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爲爭取創造新法律的詳明的鬥爭綱領。列寧在這裡堅決地揭穿了那些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而歪曲了馬克思主義，並解除了人民大衆在他們爲爭取新社會制度和新國家制度而鬥爭中的武裝的人。列寧揭穿了考茨基、阿得列爾、龔諾夫及其他一些人的眞相，因爲他們硬把與人民大衆毫不相干的觀點强加到無產階級羣衆的身上去。例如他們曾經指出，無產階級似乎是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和任何法律的，而事實上無產階級在原則上只是敵視剝削階級的國家和剝削階級的法律，但它是爲爭取自己的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和法律的澈底擁護者和戰士。

雖然，列寧和斯大林的言論是如何極端明顯，但仍然可以找到這樣的人，他們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後還繼續發展先前的反對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反對新法律和新法紀的觀點。

這種反對馬列主義關於國家與法律學說的鬥爭是按照什麼方向來進行的呢？

第一——公然與馬克思主義爲敵的人和一些糊塗蟲們認爲，無產階級國家與法律在十月革命後的次日，就已進入自己的消亡時期，他們並出來反對黨和政府用以竭力鞏固國家機構一切環節和嚴格遵守國內法紀和法律秩序的措施。

第二——這些糊塗蟲們力圖證明法律形式是無用的，他們把法律形式和內容對立起來，並指出彷彿法律形式是一回事，而內容又是另一回事。他們把法律形式宣佈爲資本主義社會的附屬品，並認爲法律形式的意義將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化歸烏有。

第三——他們把合法性與特別編造出來的那種「適宜性」對立起來，認爲合法性是一回事，而適宜性又是一回事。按照他們的意見，任何一個與適用法律有關的國家工作人員，如果從他的立場來說，按照他的個人裁量認爲適用法律是「不適宜的」話，那麼，他就可以規避法律和違反法律。

第四——他們降低了國家政權機構的意義，故意阻礙對於機構活動底新方法和新形式的創造。特別是對於偵察機關法院以及其他作爲鞏固國家紀律的工具的一些機關。

第五——他們把社會主義時代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有計劃的調整與法律和法紀對立起來，並提出了這樣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即彷彿隨着計劃原則的鞏固，隨着計劃性的貫澈，社會關係的法律上的調整已失其意義而成爲無用的了。按照他們的意見，法律上的調整，只有在商業——金錢關係即資本主義關係廣泛開展的地方和時候，才有無限發展的可能。

從這些例子裏就可看出，對於馬列主義法律科學的攻擊，對於人民大衆根據馬列主義理論所獲得之勝利的攻擊，都是按照國家與法律的一切基本問題來進行的。

出現這類敵對性攻擊的原因，首先是由於還從過去保留下馬列主義敵人的觀點，是由於反動的資產階級法律科學腐敗思想的影響，及其在蘇維埃法律科學中的侵入，是由於在人們底意識裏，其中也包括在那些自命爲從事科學的人底意識裏所殘留下來的資本主義餘孽還有着生命力的緣故。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斯大林同志天才的理論著作起了決定作用之下，所有這些敵對的或糊塗的（但對事業的利益是有着同樣的危險性）主張和論斷都被揭穿和摒棄了。

蘇維埃的法律科學是在馬恩列斯學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一，蘇維埃法律科學根據這種學說而竭盡全力去鞏固國家機器的各個環節。並且蘇維埃法律科學是以斯大林同志底這種指示爲出發點的，就是隨着社會主義成就的增長，反動的敵對分子餘孽的反抗不僅不會減弱，反會加强起來。可是，爲了要擊退敵對分子對於人民勝利成果的無數攻擊，就需要强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需要澈底地鞏固法治原則。斯大林同志在原則上雖不否認從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原理，可是他指出國家的消亡只有在資本主義包圍不存在的時候，才會成爲可能，只有經由不斷地鞏固國家的道路，只有經由改進一切國家機關，而首先是改進軍隊，偵察及蘇維埃國家機器其他組成部分底道路，才能走向國家的消亡。

第二，蘇維埃法律科學所據以爲出發點的，就是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我們認爲形式與內容之間是存在着內在的辯證的統一。因此，任何對於形式的違反，都必不可避免地也會在內容上反映出來，並損害着內容，削弱着內容。在蘇聯，審判與檢察機關的全部活動都是服從於謹嚴明確的法律形式，都是取決於訴訟程序的立法的。不尊重或不遵守訴訟形式的審判員或檢察長，都不能有效地履行自己所負的職責。司法機關在嚴格遵守法律的意義上，無論對其形式或內容，都應該以身作則，而爲所有其它國家政權機關的模範。

第三，蘇維埃法律科學堅決否認合法性與「適宜性」的一切對立，正是在法律和合法性的整體中也含有立法者所承認的適宜性，除了法律中所含有的適宜性之外，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適宜性的。把合法性和適宜性作任何的對立，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沒有法律的現象，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國家的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失。從法律要求的觀點來處理任何問題，也就是最適宜的政治見地。蘇維埃法律科學對於合法性與適宜性相互關係問題的觀

點，就是如此。

第四，蘇聯的法律科學證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與法律，無論按其形式和內容，都與資產階級剝削制度的國家與法律有着根本的原則上的區別。某些目光短小的人有時認爲，如果在蘇聯還使用像「契約」「權利主體」「權利客體」「犯罪」「懲罰」等等那些早先常用的法律名詞，那麼就是說我們還在利用舊的法律形式。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我們對於這種論斷是不能同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無論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社會主義的。新內容是不可能裝到舊形式裏去的。某種現象的術語和名稱，這還不是它的形式。所謂形式，我們應當瞭解爲內容的組織和內容的構造，而絕不是文字上的名詞。我們認爲決無必要摒棄舊有的早已形成的法律名詞，因爲這些名詞沿用已久，大多數人都能了解，現在如把它們摒棄而以新的名詞來加以替代，那就是不正確的。斯大林同志在最近關于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指出，語言不是屬於階級的範疇，同一語言同一詞彙可以爲各種不同的階級服務。這點對於法律名詞、法律概念、法律名稱等等是完全可以適用的。使用舊的法律名詞而有完全新的內容和新的法律形式，這是完全可能的。

第五，蘇維埃的法律科學所據以爲出發點的，就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體系不僅與法治和法律原則的鞏固不相抵觸，而且相反地，正是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法律才能有不受任何限制地發展的可能。要是法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負的使命是掩蓋國家底階級剝削的本質，並虛僞地、歪曲地來表現實際的話，那麼，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法律所負的使命乃是爲千百萬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爲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利益而服務，因此，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就沒有掩蓋實際或歪曲反映實際的必要。如果說，資本主義下的法律科學過去和現在都是竭其全力來把法律表現爲超階級的範疇的話，那末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法律科學，則是直截了當地公開承認法律的階級本質的。所有這一切，就爲法律科學的發展創設了無限的可能。

關於蘇聯法律科學和法律教育的蓬勃發展，有不容爭辯的事實可以證明。在我們那裏，有數十個法律專門學校，大學裏的法律系，法律學校業已建立起來，並且還大力地在發展着。在我們那裏建立了法律部門的專門的科學研究所，有數百個科學工作者在那裡工作着，法學書籍以大量的發行額在出版着。我國的青年對於法律教育都表現着極大的興趣。對於各級法律學校的每一個學額，有時都有五六份聲請書，根據考試的結果，選擇其中最優秀的人，最相當的。在司法機關工作是光榮的，是受人民尊敬的。但是對於這些機關工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蘇聯的法學科學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應當是極端純潔的有高度文化和教育的人，應當是有能力對於他們所能遇到的複雜的社會生活現象加以正確了解和分析的人，應當是能夠正確實行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政策的人。

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發展的三十餘年的經驗，蘇維埃法律科學發展的經驗，令人信服地證明，法紀和法律在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蘇聯是提到了多麼高的程度。這是證明着社會主義底偉大的和不可戰勝的力量，以及它（社會主義）對於正在走向滅亡的帝國主義的優越性。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關於保衛和平與自由的聲明

（法制委員會編譯室譯・陳漢章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總會以及全體大會，關於和平與自由的問題，曾發表過兩次聲明。和平與自由，是學術存在的前提，擁護和平與自由是一切的科學工作者的義務，所以我們曾以堅決的意志，做了以上的決議。

可是一年來，局勢比以前更爲嚴重，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危機已日漸深刻。我們想到：不久的將來，如果過去的黑暗時代再要重演，將會再度剝奪學術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但是擁護祖國和平，學術自由的運動和意志，更須普及和深入到一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隊伍裡去。

我們要求禁用原子彈，反對日本作爲外國的軍事基地，爲了民族解放，我們不問其他所有的民族的政治形態如何，應盡可能的與其確立友好關係，這是每個有良心的科學工作者的深切願望。

我們歷史學研究會，對於擁護上述的正義運動與主義的科學工作者及學會等，表示衷心的敬意，爲了支持這個運動，我們參加了科學工作者和平問題懇談會。可是現在那種壓制科學工作者率直表示意見的傾向，越來越強暴了。一位大學校長要主張全面媾和，就被攻擊爲「曲學阿世」，別的科學家呼籲全面和約就被戴上紅帽子，甚至解聘、追捕或者「非難」爲共產主義的科學家，說是「殺人犯」或「狂犬」。可是我們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的會員中，雖有一些共產主義的史學家，然而大多數的會員，他們的政治、學術的立場並不一定相同，縱使其過去或現在是共產主義的史學家，我們都確認其對歷史科學的進步，是寄以重要的希望的，像這樣的史學家，都無理地加以政治上的迫害，那不僅否定了思想與學術的自由，而且必定會陷於歷史科學的停滯。我們爲了愛護眞理，絕不能容忍以上的壓迫。我們可以斷言，歷史的事實証明：法西斯的出現，就是戰爭，就是自由的否定。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它。

一九五〇年度的歷史學研究會總會以及全體大會，團結了所有不同立場的會員，重新堅決表示爲克服戰爭危機、保衛和平、爭取全面媾和而努力到底。同時我們願與所有的科學工作者以及各種學會團結在一起，爲保衛和平奮鬥到底。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總會

阿部眞琴、近藤忠義等二四八人。

（黃宗甄譯）

（譯自日文「歷史學研究」第一四六號，這一文件發表於去年，今天才到達我們手裡，因其仍有現實意義，特予譯出。）

譯文

共產主義原理（上）

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

「共產主義者聯盟」開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第二次大會以前，恩格斯寫了這篇「共產主義原理」，原來算是「共產主義者的信條草案」，是準備在大會上提出來的。大會開會時大家接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所以就請他們兩人起草「共產黨宣言」（就是今天的「共產黨宣言」）。在宣言中，除了恩格斯所說：『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命題是屬於馬克思的』外，也容納了「共產主義原理」裏面的一些思想。可見本文的重要性。原文係德文，刊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册，由五〇三頁至五二二頁。我是由 Eden 和 Cedar Paul 的英譯本譯出的。英譯見Ryazanoff「共產黨宣言註釋」一書的附錄之六。我的譯文中有幾個地方對過德文，因此與英譯在語法上，可能有些出入。將來想照德文本把全文細校一下。對於這篇譯文，敬希教正。

——譯者

一問：共產主義是什麼？

答：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必需條件的理論。

二問：無產階級是什麼？

答：無產階級是社會中那個專靠出賣勞動力、而不是靠任何資本的利潤，取得其生活資料的階級。它的幸福和苦痛、它的生和死、它的整個存在，都是受對勞動的需要如何、景氣與否、和無限制的競爭造成的那些波動、所左右的。總之，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這個階級，就是十九世紀的工人階級。

三問：無產階級是從來一直都有的嗎？

答：不是的。窮人和工人階級是從來一直都有的；而工人階級也大都是貧窮的。可是，像今天在我們週遭所看到的那樣的貧困、像在今天那些情況下生活着的工人們，無產者，却並不是從來一直都存在的。正像自由的和無限制的競爭，並不是從來一直都存在的一樣。

四問：無產階級是怎樣發生的？

答：無產階級是工業革命創造出來的。十八世紀的後半期，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後來世界一切文明國家都連續發生了這種革命。工業革命的發生是由於蒸汽機、各種紡機、動力織機、以及許多其他機器方面的發明。在當時，這些機器的價值是昂貴的，所以祇有那些有大量資本可用的人們，才能設置。由於使用這些機器，遂完全變革了生產方法、改變了運用那些機器的工人們的全般性質。其所以能够這樣乃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即用機器能够生產出來比手工業者們用舊式紡輪和手搖織機所能生產的更便宜、更精良的商品。這樣，機器的發明就把工業引渡到大資本家手裡、而使工人們的財產（如工具、手搖機器等），變成無價值可言的東西了。很快地，資本家就佔了一切生產手段，而工人們就一無所有了。工廠制度首先在紡紗生產方面實行。一經有了這麼一個刺激，工場制度就很快地侵入了所有其他生產的部門。緊接着採用這種制度的，是織布和印刷業、陶瓷、和金屬工業。各種不同的勞動過程，在許多工人中間，愈益分化起來，於是，從前習慣於以一手造成整個物品的工人，現在僅僅製造這個物品的一部分了。這種分工使生產加速，而且商品也會賣得價廉一些。每個工人的勞動都大為簡化，他的動作一次又一次機械地重複着。用機器不僅照樣能做工作，而且做得遠較人力為好。逐漸地，所有的工業，步着紡紗和織布工業的後塵，都落到蒸氣動力、機器、以及工廠制度的支配之下了。同時它們也都歸於大資本家們所佔有，而這時的工人們就一點獨立性都沒有了。除工場手工業被工廠制度吸收了外，手工業也逐漸被工廠制度所吸收。大資本家們都能用資金來建立既能節省經費又使工人分工的工廠。小業主逐漸

地被排擠掉。這就是一切文明國家差不多每種工業都落到工廠制度支配之下的過程，一個排除了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而促成大規模生產的過程。中等階級，特別是小手工業主，逐漸被消滅。手工工人們的生活也就整個地改變了。兩個新的階級產生了：就是那兩個把社會上其他階級都吸收了的新的階級。

一方面，在一切文明國家裡，都有由大資本家們所組成的階級。這個階級幾乎是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及工具（機器、工廠等等）的獨佔者。這個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或資產者。

另方面，還有一個任何東西都不佔有的階級，也就是那個為其自己及其家族取得必需的生活資料，被迫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資產階級的階級。這個階級就叫做無產階級或無產者。

五問：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資產階級的呢？

答：勞動力是一種商品，正如其他商品一樣。它的價格也是按着支配其他商品價格同樣的規律來估計的。在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或自由競爭（我們將會看到，這兩個名詞是可以通用的）的支配之下，商品的價格，平均說來，是和這個商品的生產成本相等的。因之勞動力的價格，就等於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包括着：那維持工人使其能進行勞動、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於絕種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工人出賣其勞動力所得到的代價，就不會比恰好達到上述目的的數目再多。勞動力的價格，或工資，乃是工人維持生活的最小限度、最低的數目。營業既有起和落、既有景氣和不景氣，那麼，工人們所得的工資多或少就要依照工廠主出售其商品的所得多或少而定。可是，正如不管景氣也好不景氣也好，工廠主由出售其商品平均所得到的恰恰是其商品的生產成本，同樣，工人平均得到的，也不多不少，恰恰是最低的數目。當一切工業部門都逐漸被大規模生產過程所吸收的時候，這個關於工資的經濟規律，就愈發確切地表現出來了。

六問：在工業革命以前，工人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

答：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是隨着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變化的。工人階級與有產階級及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在變化着。在古代，工人是他主人的奴隸。在今天（一八四七年），許多落後國家的工人還是這樣，如美國南部的工人就還是這樣。在中世紀，工人們是封建領主的農奴。在今天（一八四七年），匈牙利、波蘭、和俄羅斯，這些關係仍然還存在着。在中世紀的都市裡，除了這些農奴之外，還有各種手工業者，而小市民就是這些手工業者的主人。這種主人和手工工人的關係，一直存在到工業革命時期。到了這個時期，手工業者纔逐漸變成為被較大些的資本家所傭雇的工場手工業工人。

七問：怎樣來區別無產者和奴隸？

答：奴隸可以被整個地出賣。而無產者則是以鐘頭計、以日計、出賣自己的。每一個奴隸都是他主人的直接財產，縱使他的存在是從來沒有過那樣的惡劣，他的生存卻是有保障的。要保障奴隸的安全完全是為了奴隸主的利益。至於那等於是整個資產階級所有物的個別的無產者，卻祗有當資產階級需要他的勞動力的時候，纔能出賣他的勞動力。他是沒有生命的保障的。祗有那做為工人階級全體的存在，是被保障了的。奴隸是沒有競爭的，而無產者則處於競爭之中，並且受到一切競爭波動的損害。奴隸被看做一個物品，而非社會的一個成員；無產者則被看做一個人，被當做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一個成員。因此，雖然無產者和奴隸相比是屬於一個較高社會發展階段的，可是奴隸卻比無產者能夠得到較好的生活條件。奴隸只要取消一種私有關係，即奴隸制度的關係，就可以獲得自由；而無產者則祗有把整個私有財產關係摧毀後，才能夠得到解放。

八問：怎樣來區別無產者和農奴？

答：農奴把一塊土地當做生產工具佔有並且使用着，其代價是把他所收穫的一部分繳付給領主，或者替領主勞動若干日。無產者用以工作的生產工具則是旁人佔有的，他是為這個旁人做工而得到一部分的生產物的報酬。農奴是給予者，無產者是被給予者。農奴的生存是有了保障的，而無產者則沒有這種生活上的保障。農奴並沒有捲入競爭性鬥爭的圈子，而無產者卻捲入這種鬥爭中了。農奴若逃到城市裡而變成一個手工業者，就得到了自由；不然，他也可以給他領主錢而不給實物，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自由農民了；再不然，他也可以用一種或別種手段擺脫他的領主，而自己成為一個土地所有者。總之，他可以用種種不同的方法進入有產階級的行列，加入競爭的圈子。可是，無產者卻祗有以取消競爭、取消私有財產、以及取消一切階級分野，來獲得自由。

九問：怎樣來區別無產者和手工業者？

答：「原缺」

十問：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的區別在那裡？

答：工場手工業的時期由十六世紀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在這個時期中，工人佔有他的生產工具、他的織機、家庭紡車，和他在空閑時候所耕種的一小塊土地。無產者卻沒有這一切。大多數工場手工業工人，同着他們的領主或雇主，生活在鄉間，他們之間的關係或多或少是一種家長的關係。無產者卻常是住在大的城市，而他和他的雇主間的關係，則純粹是一種金錢的關係。工場手工業工人，由於大規模生產工業的增長，被迫而與他生活中的家長關係分裂，被迫失去他所有的一切，他自己也就因之變成一個無產者了。

十一問：工業革命和社會劃分爲資產者與無產者，最先引出了一些什麼結果？

答：第一、由於機器工業的生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不斷地降低，舊的工場手工業制度，或靠手的勞動的工業，便被機器工業的生產品所摧毀了。那些從來和歷史演變過程多少絕緣的、其工業一直到現在還是屬於工場手工業類的半野蠻國家，也被其他國家內的大規模工業的發展，把他們從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強拖出來了。這些國家從英國購買便宜的商品，聽任其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們趨於毀滅。這樣，幾世紀以來就在停滯不進狀態中的那些國家，如印度，也徹頭徹尾地被變革了，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革命也將會發生。由於英國的工廠發明一種新的機器，不到一年，中國幾百萬的工人就會因之而失業。大規模工業使全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彼此發生了關係；把成千成萬的地方性的小市場，都集合成爲一個龐大的世界市場；在各處都介紹了文明和進步；並且使在文明國家所發生的任何事件，都在其他一切國家內發生影響，舉例來說，假如今天（一八四七年）英國、法國的工人獲得了自由，那就會引起整個世界的革命，而這些革命，將來又都會引起那些國家工人的解放。

第二、當大規模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之後，資產階級的權力和財富就發展到最高的限度，資產階級也上升爲國家的統治階級。結果便是：無論在什麼地方，祇要有工業革命發生，資產階級就奪取了政權，而那從前做爲統治階級的貴族和行東，和那做爲這兩個階級的政治表現的專制君主，就都被驅除了。資產階級既然廢除了長子繼承權以及貴族的特權，它因此就摧毀了土地貴族的權力。資產階級既然摧毀了行會本身、廢除了手工業方面的一切特權，它因此就摧毀了行東的勢力。它用自由競爭代替了這一切。自由競爭賦予社會中的每一份子以經營他所想望的任何工業的權利；在進行這個事業上，除了他缺乏必需的資本這件事以外，任何旁的力量都不能阻礙他。實行自由競爭就等於有這樣一個公開的聲明：即從此以後，社會中的成員祇有因彼此佔有的資本數量多少而有所不平等，資本是個決定的因素；因此，資本家，即資產者，也就變成了社會中的領導階級。自由競爭在大規模工業的初期是必需的，因爲它是這種工業所能在其中滋長的唯一的社會形態。當資產階級一經把貴族和行東的社會勢力摧毀之後，它又進一步去消滅它們的政治權力。已經成爲社會秩序中領導階級的資產階級，現在又起而成爲政治方面的領導階級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獲得領導地位，乃是由於實行代議制政府；這種代議制政府是以資產階級「法律面前的平等」理論、和在法律上承認自由競爭的原則爲基礎的。在歐洲的國家裡，這種代議制度，採取了君主立憲的形式。而在君主立憲的國家中，祇有那些佔有一定數量資本的人們，纔有選舉權。也就是說，祇有資產階級分子纔能做選舉者。這些資產階級的選舉人選出代表；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們，由於有拒絕供給賦稅的權利，就被授權選出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

第三、無產階級到處隨着資產階級發展着。在同樣的情況之下，資產階級的財富增多了，無產階級的人數卻也增加了。既然無產者們祇有在有資本的地方，纔能被雇用，既然資本祇有在雇用勞動力的地方纔能增殖，那麼，無產階級的增加就必定是和資本的增加，同時並進的。同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集中在大城市裡，因爲大城市裡的條件對於工業的經營是最有利的。廣大的人民密集在一定地方這一事實，使得無產階級感覺到它自己的力量。隨着新機器的使用、隨着日新月異的發明把手工業生產消滅的事實、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工資遂日益降落到最低限度，因此便把無產階級的情況，弄到愈益不可忍受的程度。這樣，工人方面對現狀不滿情緒的增長以及他們力量的加大，就奠定了走向那個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完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未完）

蘇聯學者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

爲紀念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列寧格勒大學舉行了科學研究會議，參加的有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多人。歷史學博士、遠東各國歷史講座主講人葉非莫夫致開會詞，他敘述了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所經歷的革命道路。科學家貝列佐伊發表了關於『中國革命中的革命軍』的報告等。

新編「哲學史」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 譯

第五章 巴黎公社後（一八七一——一八九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續完）

六、恩格斯爲辯證唯物論在自然科學中的勝利而鬥爭（『自然辯證法』）（續）

在反對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底鬥爭中，恩格斯以一個戰鬥的唯物論者，澈底地黨性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論者底完全的姿態站在我們面前。

當批判不可知論時，恩格斯同時提出和解決了最深刻的唯物論底認識論問題，特別是假設作爲自然科學發展形式底作用，實踐作爲認識底眞理性底規準，自然現象底因果聯系等等問題。

對敵對哲學底批判和無情的揭露在恩格斯是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底積極的鑽研結合在一起的。這可以從恩格斯對孟德列夫所發現的週期律的態度上表現出來。恩格斯說明這個發現底巨大的認識上的意義；孟德列夫事實上依據着量轉變爲質的規律，他勇敢地揭起了掛在不知的東西上面的簾幕，而他的科學的預見光輝地得到證實。因此實際上證明了我們的自然界規律底知識底可靠性並帶給不可知論以有力的打擊。當從理論家的認識的方面估計這件事時，恩格斯寫道，孟德列夫無意識地採用了量變爲質的規律，『完成了科學的功績，可以勇敢地把它同萊維里計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底軌道底發現相媲美。』㊀

我們有理由把孟德列夫底發現提到萊維里底發現的前面：因爲萊維里依據着人所共知的天王星脫出了已被計算過的道路，依據着衆所承認的牛頓底機械律；孟德列夫則依據着他自己的、還沒有承認過的體系。因此就要求孟德列夫發揮比萊維里大得不能比較的科學預見的勇氣和決心。也就是說，他的科學功績更要大得多多。

庸儒的德國化學家洛塔爾・適伊爾後來想把孟德列夫底發現據爲己有，他甚至於不敢根據如此『不安定的原則』（他認爲孟德列夫發現的週期律就是這樣的）去修正已知的原素底原子量。在這個規律中適伊爾沒有看到客觀的、固定的自然界底規律，而只承認對於純粹主觀主義者思維中的原素分類適用的原則。適伊爾底主觀主義是它的機械論底直接結果。

相反地，孟德列夫對週期律的深刻唯物論的觀點，即把它看作自然底客觀的規律，在孟德列夫是同他對考察化學原素上的自發的辯證法的態度是緊密聯系着的（參看第一卷第十五章）。

與此相聯，恩格斯又光輝地解決了發現週期律的優先權問題。照恩格斯說，這規律是唯物辯證法關於量變爲質的規律底具體化，量變爲質構成週期律底核心。孟德列夫自發地在自己的發現中採用了我們所稱呼的辯證法規律並指出化學原素底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底相互聯系。當說到孟德列夫底發現時，恩格斯指出他的深刻的辯證法底內容。相反地，適伊爾作爲一個機械論者，他否定了化學原素底質的方面，把它歸到量的方面去。因此他不能發現，甚至不能理解孟德列夫所發現的週期律，因爲他既然看不到化學原素底質的方面因而便不能理解週期律底本質。因此從恩格斯對這兩位學者所作的評價中無可爭辯地應當得出：週期律底創造者只能是孟德列夫。孟德列夫底發現，恩格斯是放在「辯證法」底論文中來考察，而適伊爾底曲解則放在「論『機械的』自然觀」內來考察，這不是偶然的。

恩格斯就這樣把認識論問題同方法問題不可分地聯系起來：在恩格斯底著作中，孟德列夫底唯物論同他的自發的辯證法與適伊爾底主觀主義同他的機械論是對立的。

特別應當強調恩格斯所研究的哲學唯物論底最基本的範疇之一——物體底範疇。恩格斯首先對所謂『物自體』問題作出了完滿的解決。物自體，即沒有具體形式底一般的物體是否存在呢？——這正是以前的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研究的問題。從形式邏輯底觀點來看，物自體問題底解決是很簡單的：應當從物體上剔除一切部份的、特殊的標徵，而經過這個手續之後的那個一般的東西便是一般的物體、物自體。恩格斯指出說，這樣的物體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正如不存在一般的果實一樣，果實總是同特定的、具體的果實形態（蘋果、梨等等）聯在一起的。因此物體只有依靠研究個別的物才能理解；當研究這些事物時，我們也便能認識物自體。

㊀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四三頁。

與分析物體底概念相聯，恩格斯又考察了物體底構造問題。『化學中的新時代，恩格斯寫道，——是從原子論開始（因此，現代的化學底父不是拉烏塞，而是達爾敦）；與此相適應，物理學上的新時代是從分子論開始（在另一形態之下，但這形態在本質上僅僅表現了這個過程底另外一方面，——是從運動形態底相互轉變底發現開始。）』㈠

可是恩格斯當時不能知道，在達爾敦以前六十年洛曼諾索夫就展開了化學原子論和物理學原子論底一切基本的原理，因此，毫無疑問，化學中的新時代底始祖不應該是達爾敦，而是洛曼諾索夫，並且就其理論思惟（恩格斯特別看重）底力量和展開上說，洛曼諾索夫也遠在達爾敦之上。

與舊的、機械的原子概念相對立，按照那種概念只存在着無質的差別的本源的物體底機械的細片，恩格斯提出了新的、辯證唯物論的原子論概念，按照這種概念存在着許許多多質上有差別的、不連續的物體形態，它們一種從另一種地相繼形成，它們表現爲一般物體底質上的錯綜底發展階段。

『新原子論，——恩格斯寫道，——與一切以前的不同之處是在於它（假如不是說到傻瓜的話）不肯定物體只是不連續的，而承認不同階段（以太原子，化學原子，質量，天體）底不連續的部份是各種不同的結節點，它決定一般物體底不同的質的存在形式，一直到這樣的形式，那裡沒有重量和那裡只有斥力。』㈡

這種新的原子論底第一個萌芽又是包含在洛曼諾索夫底著作中，他提出了物體細片底質上不同的形態，相當於原子和電子。因此洛曼諾索夫不僅是化學上的而且是物理學上的新時代底奠基者。因此把化學和物理學上的新時代同這樣的學者底名字（例如達爾敦）聯在一起是不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優先的發明權其實不是屬於他們的。

恩格斯對原子底複雜的構造，它們的可變性和破壞性底預見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原子，——恩格斯寫道，——決不是某種簡單的東西，不是一般的我們所看得見的物體底微小的細片。』㈢

恩格斯有力地批評了牛頓的自然科學底片面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物體只有引力。恩格斯寫道，『引力和斥力是這樣的彼此不能分開，正如正數和負數一樣……』，因此根據辯證法本身便能預言，眞正的物體理論應把斥力放到同引力同等重要的地位，『物體理論只建立在引力基礎上是虛僞的、不充分的、半截的。』㈣恩格斯底預見在二十世紀得到了光輝的證實。現代的物理學證明在原子底組成部份——核和電氣外殼——之間不僅有引力，而且有斥力，因此建立起固定的而同時又是非常流動的形成原子的物體細片相互發生作用的體系。對原子核的現代的概念大致也是如此，在原子核內引力和斥力底巨大力量也起作用。

我們看到，在恩格斯底著作中認識論問題是同辯證法問題交織在一起，承認自然界事物底眞實性、物質性是同承認它們的矛盾、它們的可變性交織在一起。

馬克思在數學領域內的研究，主要是按照微分學底哲學解釋的路線的研究直接採用於恩格斯底『自然辯證法』一著內。馬克思還在五十年代末就同他的經濟工作一起開始研究數學問題。在七十年代以前馬克思對數學的研究主要是限於掌握科學的材料和它的批判。在七十年代馬克思敍述了自己的獨到的概念，它在恩格斯底著作中得到很高的評價。在『資本論』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在一八七〇年後馬克思也從事於自然科學（地質學和生理學）底研究；這些研究，『而特別是獨立的數學的工作，構成了當時的馬克思底許多筆記簿底內容。』㈤馬克思認爲自己的任務是在於當探究數學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史時要闡明其間的聯系並且同時說明在數學家頭腦中的這個變革底實質，這個變革引起了由常數（代數學）數學過渡到不定的、可變的、流動的數（微分學）的數學。說明了數學史上這個飛躍底辯證法的內容，馬克思同時帶給數學上的唯心論以毀滅的打擊，唯心論試圖利用哲學對微分學解釋的困難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寫到關於高等數學底發生，指出它在形而上學地思惟的數學家中間引起了混亂和：『在一切知識底理論的勝利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認爲同十七世紀後半期無限小算法的發明這樣高的人類精神的勝利相比肩。假如在某處我們有著人類精神底純粹的和獨特的活動，那麼恰恰就在這裏。神秘色彩即在我們的時代還包裹着無限小算法——微分係數和無限小的差別的序列——中的數量，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證明至今還在傳播這樣的觀念，似乎在這裏我們只涉及人類精神底純粹的「自由的創造和構想底產物」，在客觀世界中沒有什麼同它相適應的東西。然而正義恰恰相反。自然界給我們以所有這一切被想像的數量底原型。』㈥

分析了數學發展上的這個變革，馬克思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說明微分學底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首先在函數上有連系的兩個數x和y底變化中找出最後的差別，以後，又考察這些差別如何化成零，馬克思强調找出其間的一定的最後的關係的重要性。他寫道：『開始時差別底確定，以後反過來差別底取消，這麼一來就引到字面上的烏有。微分學理解上的一切困難（如同理解一切否定之否定一般的困難一樣）恰恰就在於發現它同這個簡單的手續區別在那裡和如何因此引起實際的效果。』馬克思認爲這個特徵是在於找出最後差別底一定的關係。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完全按照馬克思底觀點，對微分學和積分學作了如下的辯證唯物論底論述：『例如，我在某一習題中，有兩個變數x和y，二者之中，一個變化之時，另一個也一定要按照情況所規定的關係發生變化。我把x和y化成微分，就是說把它們變成這樣的無限的小，使它比較任何最小的現實的量

㈠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二三六頁。
㈡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二三六頁。
㈢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二一六頁。
㈣同前書第二一六頁。
㈤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三頁。
㈥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二一四頁。

還要小些，使 x 和 y 只剩下相互的關係而沒有任何物質底基礎，只有數量上的關係而沒有任何的數量。所以 $\frac{dy}{dx}$，即兩個微分 x 和 y 底關係，等於 $\frac{0}{0}$，可是 $\frac{0}{0}$ 被當作 $\frac{y}{x}$ 的表現。現在只附帶的說及，這兩個變成零的數底關係，它們消失的這一確定的瞬間，是一種矛盾，可是這個矛盾並不能難住我們，正像它沒有難住二千年來的數學家一樣。但是，這難道不是說我否定了 x 和 y 嗎？只是其意義並不像形而上學者底否定那樣，說我與它們再沒有什麼關係，而是說我適應着事情底狀況，把它否定了。於是我在這些公式及方程式上，就得出代替 x 和 y 的，它們的否定，dx 和 dy。而後，我繼續計算這些公式，利用 dx 和 dy，把它們看作現實的量——雖然受幾個例外法則底支配——這樣，在某點上，我就否定着否定，就是說，把微分公式化成積分公式，於是代替 dx 和 dy 的，我又得出現實的數 x 和 y，這樣我不但回到出發點，而且解決了習題，對於這樣的習題，尋常的幾何及代數，或許想痛了頭也回答不出來。」㊀

在一八八五年「反杜林論」的序文裏，恩格斯指出他期望在將來有個機會允許他發表他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所取得的成果，『或許同馬克思所遺的重要的數學手稿』㊁一起發表。

可是恩格斯却來不及完成這件工作。馬克思底數學手稿是在他死後半世紀才第一次在蘇聯公佈。

在「自然辯証法」中恩格斯巧妙地運用了辯証唯物論的方法來解決當時的自然科學底一切基本問題。恩格斯首先粉碎了自然科學中的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形而上學和機械論；其次，他作出了自己的，完全依賴於辯證唯物論的對整個自然科學及其個別部門底最重要的具體的問題底解決；第三，他提出許多光輝的預見，非常勇敢的預言，它們以後都被光輝地証實了，這些預見在局限的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家不僅提不出而且甚至不能理解它們的意義，更不要說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了。恩格斯作了一個模範，如何具體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運用於自然科學和如何研究自然科學發現的材料。

「自然辯證法」沒有完稿。『……從馬克思死後，——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寫道，——我的全部時間都花在更重要的職務上，因此我不得不中斷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工作。』㊂

在恩格斯死（一八九五年）後，它的「自然辯証法」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文件庫中稿殘了三十年。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事業底叛徒掩藏了恩格斯底手稿，宣佈說它「過時了」；他們害怕恩格斯底革命的辯證法，害怕恩格斯對自然科學中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批評。這又一次証明，雖然在「自然辯証法」中有些個別的局部的原則已經過時，這在近幾十年科學底狂風暴雨般發展的情形之下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自然辯證法」中的主要的東西是活生生的和不朽的。

只是在一九二五年「自然辯證法」才首次在蘇聯出版問世。革命的辯証方法是被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如此敵視，它使恩格斯底著作對於共產主義者和我們時代的先進的自然科學家特別有價值，他們認識到掌握了辯証唯物論就掌握了解決現代自然科學所提出的哲學問題的鑰匙。

簡單的結論

當總結巴黎公社以後到恩格斯去世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底特徵時，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進一步發展底基礎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新的經驗底理論上的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底理論上的總結，同工人運動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底敵人鬥爭，自然科學、人種誌學等等底新的材料底總結。

理論底這種進一步發展底最重要的結論是：

一、在辯証唯物論領域內：（甲）在總結自然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建立起包羅萬象的辯証唯物論的自然底圖景——自然辯證法底闡明、一般的辯證法規律及其多樣的顯現底闡明；（乙）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應用於認識論——認識運動着的、發展着的物體底辯證法底闡明，認識中的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之間的關係底闡明，認識底辯證唯物論方法底根本特徵底說明。

二、在歷史唯物論領域內：（甲）生產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底進一步的奠定，勞動在社會生活發生和發展中的作用底說明，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特別是原始社會制度底說明，私有財產發生、階級和國家底說明；（乙）經濟基礎和由它而產生的政治的和意識的形態之間、『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的相互關係底闡明，『上層建築』特別是社會意識（意識形態）底積極作用底奠定，它們對經濟基礎底發展起反影響；（丙）運用歷史唯物論來說明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政治過渡時期底必要性底奠定，這就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關於共產主義兩個階段底英明思想底奠定，這兩個階段適應着共產主義底經濟成熟底不同的階段；對於作爲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底一般特點底闡明，共產主義社會掌握着社會發展底規律，規定了人對社會關係的統治和施行按能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原則。

因此，在巴黎公社以後的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底發展有着巨大的意義。適應着工人運動底需要和要求，繼續着全面發展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便以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裝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和帶給那些在歐洲工人運動中被機會主義者所宣傳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致命的打擊。

（第五章全文完）

㊀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中文版一六八——一六九•一九五〇年

㊁同前書第五一頁。

㊂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中文版第五一頁。

學術問答

（問）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雅可賓專政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當時對反革命分子是如何鎮壓的？後來雅可賓專政是怎樣覆滅的？

（北京 朱煥心提）

（答）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從雅可賓專政史例中，我們可以再一次吸取一些關於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教訓。

十八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說是最澈底最典型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法國的廣大人民，都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反封建的革命。

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巴黎人民經過了三次武裝起義，流血犧牲，才眞正打倒了封建君主政體和君主派的基朗特黨，樹立了革命民主的雅可賓專政。基朗特黨是代表工商大資產階級的，他們站在國王那一邊，反對人民革命，因爲它的頭目多是由基朗特省選擧出來的，所以稱爲基朗特黨。雅可賓黨則是代表革命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因爲他們開會會塲設在巴黎的聖·雅可修道院，所以稱爲雅可賓黨。當時巴黎的下層羣衆——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工人、店員等還不可能形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他們是跟着革命派資產階級走的，他們在反封建的鬥爭中支持並推動了雅可賓黨。雅可賓專政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最重要最輝煌的階段。

雅可賓黨執政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英國普魯士、西班牙、奧地利、荷蘭等歐洲封建國家結成了反法聯盟，他們害怕革命的火焰蔓延到全歐洲，所以組成以英國爲首的封建聯軍，想以武裝干涉來撲滅法蘭西共和國，來鎮壓法國人民大衆的革命運動。聯軍來勢洶洶攻入了法國，英國的海陸軍在反革命的季朗特黨徒的策應之下，已佔領了法國南部最重要的軍事港口土倫，共和國向人民宣佈「祖國在危殆中」。從巴黎逃出的基朗特黨徒又在萬第、波爾多、里昂、馬賽等大城市發動叛亂，在里昂逮捕了國民大會代表，殺死人民領袖之一沙利爾，在萬第更大殺革命者，萬第成了一片火海，血濺滿地、屍遍街衢！而且反革命的叛亂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正在日益擴展。當時法國八十三省中只有二十三省效忠國民大會，而且在這二十三省中還有英國派來的特務和便衣隊大肆活動。英國首相辟特撥出五百萬英鎊作爲特務在法國活動的經費，每個特務每月能領到兩千五百里弗爾津貼。一個奧國的特務名叫卜洛里的，他潛入雅可賓俱樂部偷聽，竊取了許多國家秘密決議；還有兩個奧國特務在斯特拉斯堡俱樂部專門迫害革命者。特務還在好多城市的兵工廠縱火破壞，巴雲的彈藥筒製造廠被燒毀了，舍米爾的大砲庫被炸毀了。特務還從事收購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使國內糧荒更形嚴重。在巴黎呢？基朗特黨徒夏綠蒂、柯戴用短剌刀暗殺了人民革命領袖馬拉，戲院中在上演反革命的戲曲。這些反革命分子一方面公開聚衆示威遊行反對共和國，另一方面却在巴黎富人區奇裝艶服擧行跳舞會，慶幸共和國在前線的失利。

總之，外國武裝干涉軍步步逼近，國內反革命分子到處策應活動，巴黎等地又處在饑荒的嚴重威脅中。革命的雅可賓黨要如何從這艱難險惡的情況中找出一條出路呢？顯而易見，要保衛革命勝利的果實，首先必須實行革命的恐怖政策，堅決無情地鎮壓反革命，另一方面再組織軍隊擊退敵人，並採取革命的經濟措施：如澈底消滅農民的封建義務，施行普遍限價等。雅可賓黨果然在下層民衆的代表——瘋人派和阿貝爾派逼迫之下這樣做了。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共和國頒佈了一個「嫌疑犯條例」，宣佈：凡是「誰的行爲，交往，言論和著作，表現出同情暴君和自由的敵人者」，一律屬於嫌疑犯，也是共和國的敵人，必須加以逮捕審訊。負責懲治反革命的社會保安委員會，公安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等機關建立起來了，一切可疑的敵人——拒絕宣誓服從憲法的僧侶，投機商，僞幣製造者，奸細叛徒等都被逮捕起來。秘密回國的貴族流亡者處以死刑，參加叛亂者予以槍斃，基朗特黨徒罪該砍頭。革命委員會偵察着全部國境，警戒着一切交通要道，檢查護照，巴黎與各地下層民衆都積極協助政府揭發、偵察反革命分子。

革命法庭與公安機關顯現出了專政的威力。國王路易十六早已被砍了頭，十月十四日，勾通外國製造反革命叛亂陰謀的王后瑪麗。安東尼特又被判處死刑。半個月後二十二個基朗特黨首要

分子也在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之下送上了斷頭台，其中最著名的有布里索，韋爾約等，煊赫一時的羅蘭夫人也被處死，基朗特黨徒已殲滅殆盡。

雅可賓政府一方面堅決鎮壓反革命，另一方面又組織軍隊戰勝敵人。革命軍解放了萬第、里昂等城，里昂解放後槍斃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國內各地的反革命叛亂大體上是肅清了。

雅可賓專政在人民大衆推動之下，斷然鎮壓了反革命份子，這樣就鞏固了革命勝利的果實並促進了前線的勝利。法國的人民大衆以革命的恐怖回答了反革命的恐怖，這種恐怖在組織資產階級革命戰勝其敵人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馬克思說：「全部法國的恐怖主義不外是以平民的手段懲處資產階級的敵人、專制制度、封建制度、市儈奸行」，「因此法國國內的恐怖統治、所能做到的不過是用可怕的鐵鎚底打擊，像魔術一樣一下子就掃蕩了法國身上的全部封建廢物」。列寧也說過：「那是眞正的、全民的、實際上使國家復興的恐怖政策。」

但是法國大革命終究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使得革命的恐怖政策後來不是符合人民大衆的利益。當前線開始轉機而反革命活動已被擊破時，革命陣營內部開始分裂了。瘋人派和阿貝爾派爲了保證工人貧民生活不受威脅，要求國民大會加强懲治投機者，並且要求把戰爭進行到底，使全歐洲變成共和國，然而代表資產階級的公安委員會主席羅伯斯庇爾（雅可賓黨魁）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終於脫離了從前支持他們的貧苦大衆，因此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走到了盡頭。羅伯斯庇爾把朋友當敵人，開始以恐怖手段對付異己，他首先就沒有接受阿貝爾派的要求，把七十六個應該處死的基朗特黨徒赦免，這時（一七九四年三月）更進而向瘋人派和阿貝爾進攻。一七九三年秋天，瘋人派的領導人都被逮捕了，瘋人派被最後地打垮了。一七九四年三月又審判了阿貝爾派，結果全體都被砍了頭。這樣雅可賓專政就削弱了它的社會基礎，漸漸失去下層羣衆的擁護。這樣就使得羅伯斯庇爾派與要求跟大資產階級妥協的丹敦派之間也失去了合作的可能，終於丹敦在阿貝爾被處死後幾天，也被砍了頭。羅伯斯庇爾既以對付敵人的手段來對付朋友，這樣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就破裂了！尤其在羅伯斯庇爾單獨執政後，恐怖更帶上空前未有的强烈性以至於「發瘋的程度」（恩格斯），六月十日又頒佈了一道法律，在這法律中廢除了對被告的預審，這樣就把細膩的審判工作不合理地簡單化了；並允許可以只根據法官「內心的確信」來判決，這樣就使量刑可以不要客觀眞實的證據了；而且規定對反革命者只用一種懲罰——死刑，這樣就不是對於「首惡」和「脅從」份子，按罪情輕重分別對待了。從這個法律公佈之日到雅可賓專政垮台之日止，共四十六天，法庭就處死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後來平均每天殺八十人。六月十六日一天殺五十四人，內中有三十九個工人，十個傭人和僱員。巴黎的工人貧民都非常憤恨雅可賓黨如此胡作非爲。從此恐怖已不再是大多數人民對少數反革命分子實行鎮壓的手段，革命的恐怖政策已改變了性質。羅伯斯庇爾既已敵友不分，以恐怖手段對付異己，並且錯殺亂殺一直支持他的人民羣衆，這樣斬除了革命骨幹，破裂了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削弱了專政的社會基礎，因而就大大加速了雅可賓專政的覆滅。

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使它不可能長期把千百萬被剝削的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週圍，資產階級反封建是爲着以新的剝削者集團來代替舊的剝削者集團，所以一旦它取得了政權之後，就一定背叛在革命中支持它的人民羣衆，並爲着鞏固它的統治，開始向人民的利益進攻，譬如雅可賓黨曾頒佈了一道法令：禁止工人建立組織、禁止工人罷工，違者以送交革命法庭審判相威脅。

當時法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還不具備，終於反革命重奏凱歌，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代表反革命資產階級的熱月黨陰謀奪取了政權，羅伯斯庇爾本人也被砍了頭，反革命並且開始對人民大衆實行狂暴的恐怖殘殺！雅可賓專政就這樣垮台了。

只有最有遠見、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貫徹始終堅決鎮壓反革命，才能正確地依靠羣衆澈底肅清反革命，以鞏固革命成果。只有最有遠見、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才能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於罪情較輕的反革命分子給以長期勞動改造的機會，使他們成爲新人。無產階級的這種寬容大度與偉大氣魄，是歷史上其他進步階級所不能做到的。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與今日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就在鎮壓反革命上創造了光輝的範例。

（高　放答）

（問）有人說，老子是中國古代具有唯物論概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道家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屬於唯心論的，這兩說是否矛盾？

（瀋陽　趙祖剛提）

（答）老子底宇宙觀，究竟是唯心論的或唯物論的，現在哲學史家有不同的說法。這是因爲老子書中的那個『道』字，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若照後來王弼注

所解釋的，老子底宇宙觀一定是唯心論了。要是照早一點的解釋，像韓非子淮南子中的解釋，老子底宇宙觀是唯物論。本刊三卷六期學術簡訊的報告，說蘇聯漢學家楊與順認爲老子一書是古代中國具有唯物論概念的最初哲學巨著之一。我還沒有看到楊與順同志的這部著作，但是我認爲他的說法是很有理由的。我贊成他的說法。

在我的「實踐論——馬列主義的發展與中國哲學問題的解決」一篇文章裡，我說『在中國哲學中的，在認識論方面的唯心論，在道家哲學中，更趨於極端。』這是不是與老子一書具有唯物論概念的說法相矛盾呢？我認爲是沒有矛盾的。

在宇宙論方面，肯定精神爲第一性的是唯心論，肯定物質爲第一性的唯物論。老子反對有『造物者』，以爲萬物皆從『道』生出。我們可以把老子書中所說的『道』，解釋爲原始的『氣』。這樣說，老子的宇宙觀是唯物論的。

在認識論方面，就實踐與認識底關係這一點說，肯定實踐爲第一性的是唯物論，肯定認識爲第一性的是唯心論。這是我在我那一篇文章裡已經先說明了的。這一點說明以後，我們來看道家哲學，在實踐與認識的關係這一點上，究竟是以實踐還是以認識爲第一性呢？

顯而易見，道家哲學底認識論是以認識爲第一性的。我們不討論道家哲學是否應以老子爲主。專就老子說，老子明白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毛主席在「實踐論」裡引了兩句老話，一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子底這一章顯然是主張前者，而不是主張後者。因此他底認識論是唯心論。

在本刊四卷二期，我答覆了楊柳橋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後來楊先生又提意見，說：認識論與宇宙觀是統一的。假若一個哲學家底認識論是唯心論的，他的宇宙觀也必是唯心論的。假若他底認識論是唯物論的，他底宇宙觀也必是唯物論的。楊先生底這個意見，也是值得討論的。

假使我們不是從實踐與認識底關係這一點來分別一個哲學家底認識論是唯心或唯物，而是從主觀與客觀底關係這一點來分別，楊先生的話是對的。若果一個哲學家認爲客觀不能離開主觀而獨立存在，他底認識論是唯心論的，他底宇宙觀當然也只能是唯心論的。

可是我那篇文章裡所說認識論上的唯心論與唯物論，是就實踐與認識底關係這一點上作分別的。爲甚麼注重在這一點呢？因爲那一篇文章底主題是討論「實踐論」。這一點說清楚以後，我想有些問題，可以自然解決。

（馮友蘭答）

（問）批判的馬列主義貨幣理論與資本主義（名目主義與金屬主義）貨幣理論有何不同？與貨幣數量學說又有何不同？

（桂林　徐永業提）

（答）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從馬列主義的觀點來批判資產階級的任何一種理論，但不能拿馬列主義某一部份的理論與相對於資產階級的某一部份理論來作比較研究，因爲二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都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因而，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不論它是貨幣名目說，貨幣金屬說，還是貨幣數量說，都不能和馬列主義的科學的貨幣理論相比擬。大體說來，各種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具有下列非科學的違反實際的三個基本特點：

一、它們不是從歷史的發展觀點，而是從作爲貨幣材料的物質效用與其他商品的交換關係來敘說貨幣的現象形態。這特別表現在「貨幣商品說」或「貨幣金屬說」。「貨幣名目說」自以爲克服了前者的缺點，但依然違反了歷史觀點，它同樣抹煞了貨幣是由商品發展而來的歷史事實。

二、由於這些貨幣理論不是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不是從貨幣的現象形態去認識它的本質再從本質去掌握它的現象，因之它們不能說明貨幣的發生與發展，不能說明貨幣的所有機能，不能說明貨幣流通的規律。它們的說明，不是因果倒置，便是「祇見樹木，不見森林」。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名目學派解釋不了貨幣的跌價；金屬學派解釋不了紙幣的流通；數量學派也解釋不了由於貨幣價值和商品價值的變動所引起的物價波動。

三、它們都不敢承認或故意抹煞貨幣的價值就是一定量的社會的抽象勞動。但是沒有這一共通的東西，貨幣是不可能作爲價值的尺度的，貨幣名目說和貨幣數量說乾脆否定了貨幣的價值而歪曲地把貨幣看作一種「記帳單位」。作爲價值尺度的機能是形成貨幣的社會的必要條件之一，否定了這一機能也就是否定了貨幣的存在。光就這一點而論，這二種貨幣學說的理論基礎就可不攻自破了。但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却要倒果爲因，說貨幣之所以有價值，因爲它能交換（或購買）商品。至於金屬學派，則以作爲貨幣材料的金屬本身的使用價值或其所謂邊際效用來決定貨幣的價值，也仍然不能解釋貨幣作爲價值尺度的機能，因爲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個人對於商品的邊際效用並無共通之點，是無法比較的。

（王烈望答）

評「政治經濟學教程」

趙靖

約翰・伊頓等集體創作 闞夢覺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定價一萬五千元

本書原著出版於一九四九年，是一本目前流行於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除了書中的第一章，對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形態，有些簡略的敘述，並在十一、十三兩章，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經濟作了一些扼要的說明外，全書主要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爲研究對象。這對目前還生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人民來說，是有它的實踐意義的。

本書譯者闞夢覺先生認爲這部集體創作具有五個主要優點：

(一)簡明、新穎、深入淺出。

(二)注意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三)幾乎在每一章中，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經濟「理論」，都有相當簡明銳利的批判。

(四)對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有簡要的說明。

(五)配合着當前的世界形勢，……揭發並誅伐了美帝國主義，證明其必然滅亡。

對譯者所說的這五大優點，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除此以外，我個人還覺得本書尚有下列優點：

第一，本書在編排體制上，獨具風格。例如第四章由剩餘價值和工資兩方面，來說明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使人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的根源，獲得深刻的、明朗的認識。第五章將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包括在資本積累這一問題中，使人對資本主義的積累與競爭的性質，可有更清楚的理解。

第二，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少談國民收入，特闢專章，而且分析得相當簡要，深入。

第三，本書將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收入，看作剩餘價值的一種特殊形態，這也是一般教科書所很少提到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地主——在生產及分配中的關係爲對象的。因而在談到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時，未曾特別提到國家財政。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忽略了國家財政，依照他的研究計劃，馬克思本來還要進一步研究「有產者社會之在國家形態中的集成。……『不生產的』諸階級，租稅，國債，……。」(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二八九頁)。本書能由剩餘價值分配的規律，去解釋國家財政，揭露資本主義國家財政的階級本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對本書的缺點，譯者指出：

(一)邏輯性不够嚴密。

(二)以「人對自然的關係」爲標準來區分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對資本主義來說，可能是錯誤的。

第一點我也大致同意。對於第二點，我認爲還須作進一步的說明。依我粗淺的了解，物質生產固然是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所同具的性質，但一種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却不能祇是這種共同性，主要還須看一種事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殊內容。在自然經濟中，生產誠然祇是使用價值的生產，但在比較高級的經濟形態中，生產便不能僅是使用價值的生產了。例如在簡單商品經濟中，生產除了是使用價值的生產外，還要同時是價值的生產；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除了價值及使用價值而外，更須同時爲剩餘價值而生產。作者祇以「人對自然的關係爲標準」來區分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實際上是把生產看作單純是物質生

產或使用價值的生產了。從這點說，作者並沒有從各個歷史階段來把握生產勞動一詞的具體內容。

除此而外，本書還嫌過於簡略，用語也有模糊的地方。例如在第二章中，對價值規律提得過分簡單，甚至沒有說到價值規律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又如第四章在談到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鬥爭時說：「十九世紀末，工黨成立了，以便在政治領域中促進職工會運動的目標。」（譯本九一頁）在第八章論到經濟危機學說時，把各種資產階級經濟學說都只抓住經濟危機的一兩種表面現象，說成「每一個人都抓住了整個眞理的一個片斷。」（譯本二〇六頁）用語的過分簡略或含混，很容易引起讀者的錯誤認識。第十二章把蘇聯的生產設備說成「資本設備」，沒有分淸「資本」是一個剝削社會的範疇，都是本書的疏忽之處。

由於客觀的困難，在寫這篇書評時，不能把原著和譯文對照來看，因此不能對譯文提出太多意見，但以下幾處，可以看出譯文似有相當的語病：

譯文三三八頁「德國和平生產的恢復，竟被英、美帝國主義者强制其政府所採取的政策，頑强地阻礙着。那種政策就是不顧波茨坦協定，硬把德國分裂爲二；並阻止西部佔領區中工人階級及職工會勢力的成長，俾能肅淸納粹主義的殘餘及其壟斷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並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去重建德國工業。」

·這種語法，竟和原意完全相反了。不懂英語的人，決不能從這裡看出原著的意思。

又如譯文三五三頁「捷克的二年計劃，規定了經濟的重建並於一九四八年底把生產量增加到一九三七年水平的百分之十以上。捷克於兩年計劃之後，又繼之以五年計劃，打算把生產增加到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增加到一九三七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增加到戰前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以上和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或者「……使生產量較一九三七年的水平增加百分之十以上。……使生產量較戰前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較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

本書雖有上述缺點，但一般說來，內容還有可取之處，譯筆大體上也相當流暢，是一本值得參考的書。特別因爲本書注重對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批判，對受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影響的人，尤其值得一讀。不過因本書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爲主要的研究對象，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經濟，論列較少，用作教本，似乎還嫌不够的。

學術簡訊

蘇聯「歷史問題」雜誌討論關於蘇聯史分期問題

蘇聯「歷史問題」雜誌組織了關於蘇聯史上封建形態和資本主義形態內部的分期問題。聯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特別召開了學術會議，進行討論這一問題。參加討論的有國立莫斯科大學、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院及莫斯科其他研究機關的歷史學家等。討論進程中，涉及到蘇聯史上的前封建時期的問題、封建主義的發生及封建割據性的本質問題、俄國資本主義與產業革命的發生問題、資本主義發展等一系列的重要問題。在這次討論中，有許多問題暫時雖還不能得到解決，但都已提了出來，這對蘇聯史學的發展，將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蘇眞理報發表專文介紹魯迅文集的俄譯本

蘇聯最近出版了魯迅短篇小說和論文集的俄譯本，眞理報特發表彼特羅夫的文章，加以評介。彼特羅夫指出魯迅作品貫穿着對人民的熱愛，和對壓迫者的憎恨。

彼特羅夫說：魯迅是一位偉大的，善於觀察的作家，他把作品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藝術形式光輝地結合起來，他被譽爲中國的高爾基。他又是蘇聯文學的熱情的宣傳者和繙譯者。他愛蘇聯文學，而且號召中國青年作家研究蘇聯文學的崇高思想和藝術技巧。

最後，彼特羅夫建議蘇聯國家文學出版局，出版魯迅選集，使蘇聯讀者進一步了解魯迅——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熱情的愛國者，爲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鬥爭的英勇戰士。

尼考拉也夫批評吉尼索夫的法律著作

哲學碩士尼考拉也夫在「眞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論關於國家和法律問題方面的書籍中的嚴重缺點」的書評，對吉尼索夫編著的「國家與法律理論」與「蘇維埃國家和法律史」二書作了嚴格的批評。蘇聯法學研究院學術會議與國家法學書籍出版社編輯會議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討論這篇書評。法學研究院學術會議並通過一項決定，承認這經書評是正確的。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

楊耳

武訓在偉大的農民革命浪潮中豎起降旗

武訓正處在這一百年來革命運動的前期，値得注意的，是從他降生到他三十一歲時（一八六八年）的捻軍失敗時期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農民的起義規模，眞是巨大極了。直接參加到革命的武裝鬥爭行列的農民，數量在幾百萬以上。當時社會矛盾已達極點。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階級，已無法照舊樣子生活下去，反動統治階級也日益無法繼續照舊統治下去了。

對於作爲當時歷史推動力的農民革命大起義，武訓，採取了熟視無睹，莫不關心和完全置身事外的態度。我們在武訓的歷史資料中，尋找不出任何材料，足以說明他多少接受了這個偉大革命運動的影響。在這樣驚天動地的浪潮而前，沉渣也會泛起，可是武訓不僅絲毫不受到波動，他反而以勞動人民的身份，用「苦操奇行」，向地主階級磕頭「行乞興學」這件醜事儼然當作社會「運動」來從事，這樣，在當時農民革命巨浪中，他的投降「興學」就起了極端反動的作用。而武訓這個人就被反動統治階級當作最好的欺騙工具。

武訓爲鞏固封建制度而鞠躬盡瘁

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眞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錢是殘酷地搞來的。所辦之學，並不是所謂爲了「窮孩子」，「爲窮孩子」只是一句空話，實際是爲富孩子。

目的：把少數「窮」孩子奴隸地位略予提高；手段：徹底的哀告和跪求。這就是「行乞興學」初期的武訓。

口號：爲了「窮孩子」與「義」學；實際：剝削勞動人民，以「義士」「異人」「奇行」的頭銜，參加到封建士大夫和官僚羣中去，爲富孩子興了不義之學。這就是「行乞興學」後期的武訓。

武訓並不是什麼從革命出發，由於歷史條件所限而出現了「事與願違」的大悲劇。他從開始，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基礎，以及封建的殘酷的剝削方式都是竭力擁護的。

爲了解決窮孩子唸書的問題，只能有一個出路，就是用革命的方法解放被封建的生產關係所束縛的生產力。生產力發展了，窮孩子才會有唸書的條件。

然而，武訓的道路，是合乎「邏輯」的。他投降並倚靠了地主階級，他就能辦成「義」學。地主出點錢辦它兩三個「義」學，訓練地主的奴才，這是可能的。他如果不以地主爲靠山，眞正變成了「無錢」的人，「義」學就一定辦不起來。

武訓，他正是被反動勢力所收買的一個，而且甘心充當了反動階級騙人的幌子和工具。

「孺子牛」呢，還是「萬劫不復的奴才」呢？

武訓的事業既是反對歷史前進的，因而他的苦行已經變成毫無意義的東西了。但是，實際情況比這還要糟得多哩！他以他的苦行，爲反動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個可以大大宣傳鼓勵的「楷模」。

對於武訓的屈服醜行，竟有人稱之爲「俯首甘爲孺子牛」，這實在是顚倒黑白的奇談。武訓的忍讓完全是澈底的「軟骨頭」。魯迅先生說到「俯首甘爲孺子牛」，是說對人民大衆和無產階級忠心耿耿，而爲了當人民的牛，就無可避免地要和人民的敵人作堅決的戰鬥。所以魯迅先生在這句話之前，先說了「橫眉冷對千夫指」。這是何種的敵我分明，何等的硬骨頭！

行爲——醜惡的奴才，外表——滑稽可笑的丑角，這就是武訓的畫像。

公開的反動宣傳，和掩蓋在「似是而非」的馬列主義外衣下的非無產階級思想

武訓披上「革命」的新裝來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迎接這一挑戰的不是憤慨和嚴正的駁斥，甚至連懷疑也幾乎少見，有的竟是一片喝采和讚美之聲，可驚異的是不少共產黨員也參加了讚美者的行列，許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擁護者自命的人，許多進步的革命的知識分子也一齊對着武訓歡呼。

難道用了一塊「歷史觀點」的擋箭牌，就可以無區別地把什麼是進步的東西和什麼是反動的東西從根本上翻轉過來麼？爲什麼這麼多的歡呼者，竟然不把自己從思想上和滿清王朝的皇帝、巡撫、學台、縣令、進士、舉人之流

稍稍分清一下界限呢？

難道僅僅想使「別人不再受苦」的願望，就算是有了若干程度的「階級覺悟」嗎？把社會不平的根源歸之讀書與不讀書；對敵對階級毫無憎恨，也絲毫不打算反抗；對本階級的地位毫無認識，對本階級的力量也毫無信心。這樣一點朦朧的「善心」，怎麼就可以算得「階級覺悟」了呢？

割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把它庸俗化，或者把它變成適合於非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修正主義」，這套把戲原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他們把馬克思學說中最主要的東西拋棄，反對政治鬥爭，反對工人階級革命，反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企圖把工人階級變爲資產階級的政治附庸」。使得工人階級隊伍因爲思想混亂而趨於軟弱，甚至根本瓦解。

「馬克思主義」的美麗外衣下掩蓋着非無產階級思想，甚至反動思想的實質，這就是許多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歌頌與贊揚的思想實質。

脫下這件不合體的「馬克思主義」的美麗外衣，停止散佈「似是而非」的假「馬克思主義」，澈底淸算自己思想中非無產階級的，甚至是反動的本質，從頭學起，是老實的態度。這種態度將被人民羣衆所歡迎。

號召大家對錯誤不採取自由主義態度，而是採取革命的鬥爭態度。這樣，就能使人民羣衆的愛國主義敎育增上了必要的一課。這就是一切戰鬥的、革命的思想工作者的嚴重任務之一。我們要認眞地學習和硏究；硏究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的近百年史）。更重要的，我們要認眞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學習」四卷五期）

貫澈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諸基本原則

王亞南

第一個原則性問題：怎樣才算在政治經濟學中體現着唯物論和辯證法

「在馬克思，祇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所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但他認爲重要的法則，不但是在一定時期具有完備形態，且保持相互聯系的現象之法則。他更着重的，是現象變化的法則，是現象發展的法則，是由一形態到他形態，由一系列關係到他一系列關係的推移法則。……所以，馬克思祇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由嚴密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的次序的必然性，並對於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種種事實，儘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認……馬克思認爲社會的運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支配它的法則，不僅與人的意志意識意圖相對而言時，是獨立的，並且是人的意志意識意圖所由以決定的。……馬克思的目標，既然是以這個見地研究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祇是嚴密的科學的把經濟生活的正確研究所必須有的這個目標，樹立起來，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闡明一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滅，以及由它進到高級社會有機體的演變，是受何種特殊的法則支配。」這是馬克思自己引述一篇專門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中的話。他說，那篇論文，「說明了他的方法的唯物論的基礎。」唯其「資本論」是這樣把資本主義經濟的事實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並從那裡闡明出不受人們意識意圖支配的存在法則和發展法則，那些法則，就必然會當作辯證的規律而表現出來，而被視爲資本主義社會的辯證法。列寧曾就「資本論」作過這樣的天才說明：「在馬克思，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祇是辯證法的部分的情形。」從這裡，我們就不難了解，政治經濟學該是如何與唯物論辯證法密切結合着。

第二個原則性問題：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爲什麼被規定爲是社會的生產關係？生產力不相並的看作研究對象，是不是貶損了它在社會經濟中的決定作用？

馬克思指示我們說：「在經濟範疇的討論中，就如一般的在每一歷史的社會的科學中一樣，應該牢記着的是：（一）無論在實際中或在頭腦中，總是有主體存在着的，這兒的主體，是近代有產者的社會，因此，（二）表現着這種既定的社會，這個主體之各種表相，各種存在所規定的諸範疇，總是個別的一些側面。」

既然一切經濟範疇，都是表現爲特定社會關係，特別是基於生產而發生的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的一個側面，當我們討論社會的生產關係的時候，所有那些經濟範疇，就分別當作那個社會主體的個別情況而被考察着。無怪列寧指示我們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就是把一定的被歷史所規定了的社會生產關係，在其發生發展和沒落過程加以研究。

社會的生產關係或生產諸關係，就這樣的被規定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了。

不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並的看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那並沒有貶損生產力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那只是表明，嚴密的科學的研究，需要確定他的最基本的對象和關節。必得把社會的主體、社會的生產關係把握住了，生產力才有可能顯出它的積極的能動的意義。

第三個原則性問題：自然是人類生活和生產的一般的經常的必要條件，它對於我們的經濟生活，從而，對於我們所研究的經濟法則，全有那樣的限制作用和影響？

我們要生活，要生產，儘管在任何情形下，都得同自然打交道，要依靠自然，但自然對我們經濟生活的限制作用和影響，卻依社會發展程度而不同。在比較原初的社會，人類勞動生產力低，靠天吃飯的成分極大，從而，提供現成生活資料的自然條件的豐嗇，就要對那種社會的居民，起着最有決定性的影響了；至若可供生產手段的自然條件是豐富還是貧乏，那倒是無關緊要的。反之，在進步社會中，在生產力較發達的的社會中，現成生活資料是否豐嗇，就不是那樣重要了，對它關係重大的，對它的發展發生較大影響的，卻寧是可作生產手段的自然條件。

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可以把那種主要由自然條件所範圍或所形成的各地域、各不同民族間的特殊性，大大的化除或減少。也就是說，那怕在同一社會階段，在不同國民間所顯示的彼此間的差別，在低級狀態下比較更大，在高級狀態下則是比較更小的。

一切經濟活動是離不開自然的。要從經濟現象中發現出它的法則，對自然因素的處理，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對於大大減少了它的決定影響的現代經濟說，既然如此，對於它還具有相當決定作用的前資本社會經濟說，尤其是如此。

第四個原則性問題：以有易無的交換是階級社會，是財產私有社會滿足慾望的特殊方式嗎？因為這種社會的發展，有交換關係在其中發生極大的掣動作用，才特別需要政治經濟學來探究其經濟運動法則嗎？有交換，就有生產物變成商品的事實存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探究，從商品開始，其他非資本社會的經濟法則的探究，該從那裡開始呢？

我們知道，交換是並不限定在財產私有社會存在的。在原始共同體尚未分解，財產尚未私有，階級尚未形成的社會，交換也會發生於各別共同體間。共同體間的交換的出現，已經是共同體趨於分解，私有財產將就形成，階級關係已在萌芽的信號。

交換既然是發生於原始共產社會解體過程中，又將消滅於現代共產主義社會完成過程中，我們應有理由斷定：交換是階級社會，財產私有社會的產物。儘管交換的性質和範圍，一般是受決定於生產形態，但在把生產看作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看作再生產過程的限內，它一開始，已經就被看作是交換的結果，同時在終結，又被看為是交換的原因。一般的講來，財產私有社會的勞動生產物，是通過交換方式上來進行分配的，是把交換作為集散手段的。

我想在這裡提出以次兩點尚不成熟的見解：

（一）政治經濟學是在社會交換關係開始的場合，開始其考察的任務。一旦交換關係終結，商品價值的概念，不復存在，每個人的勞動都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在那裡，一切經濟事象是非常單純而明白的，那再也不需要政治經濟學來特別加以探究了。

（二）在原始社會，在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由社會發展史或經濟史的研究，就足夠把它們的發展演變規律表達出來；但對於私有社會，對於以交換作為分配手段的社會，單在社會發展史或經濟史的名義下去講它們的經濟發展規律，那就顯嫌不夠了。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從它的細胞商品開始，是科學解析的必要步驟，但對於商品沒有這樣發達的前資本社會的經濟的研究，和對於商品已經變形變質了，且是佔着很重要地位的蘇聯經濟的研究，應當從那裡開始呢？我認為，研究非資本主義經濟，一定要按照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體系，那誠然是大可不必，但為了說明的便利，一定說不能從商品價值開始，那也恐不盡然。在資本主義經濟佔着極重要支配作用的現社會中，對於逐漸被捲入它的支配範圍的半殖民地經濟，如像舊中國經濟，乃至對於正在大力擺脫其支配影響的社會主義經濟，如蘇聯經濟，都從商品價值關係着手來作比較研究觀察，那確有不少的便利，雖然機械的拘泥「資本論」的體系，是顯不妥當的。至關於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乃至原始社會末期的經濟的分析，我覺得，即使不一定要從商品價值關係入手，至少也得從那種與商品價值有密切關聯的勞動形態入手。

（「新中華」十四卷十、十一期）

中國人民大學「系」的工作

何戊雙

一、中國人民大學沒有「院」的組織，系就是受校長直接領導的教學行政部門。

中國人民大學的「系」，是由各有關學科的教研室和各年級的學員組成的；各系都有明確的教育目的與完整的教育計劃，有些系並分設若干專修科目。

按現有教育計劃的規定，除俄文系外，各系學生均須學習二十門到三十門課程，其中政治理論課佔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業務課佔百分之五十至五十五，文化課佔百分之二十。

按照實際需要，有四系——貿易系、財政信用系、合作社系、經濟計劃系——設有二——五個專修科目。每個專修科目包括幾門課程。凡有專修科目的系，除系的共同課外，都按照不同的科目分班進行教學，以便培養在某一方面更專門的幹部。

為了教育計劃的實現，為了進行系的工作，系設辦公室，並有副系主任、級主任、秘書、統計員等行政幹部。系主任領導系的全部工作。

系主任由校長從教授和教員中指定之，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總的領導教學過程與課業進度。

二、總的監督，檢查與領導該系所屬之各教研室。

三、領導系委會的工作。

四、總的領導學生生產實習的工作。

五、總的領導與政府各機關及企業部門的協作事宜。

六、監督與檢查對於招收學生與研究生的保證。

七、總的監督與檢查考勤情況及統計表報情況。

八、草擬本系總的教學計劃。

九、總的監督與檢查教學大綱的編寫工作及其內容。

十、充任招收研究生委員會的主席與研究生的專業科目考試委員會的主席。

十一、領導副系主任、級主任及系辦公室的工作。

在系主任生病、休假及其他情況下，副系主任得代行系主任的職務。

副系主任由系主任從教師中推荐，由校長委任之，在工作中直接受系主任領導。

系的領導幹部，除系主任副系主任外，依據學生數目，各系每一年級指定一——二名級主任。級主任是由校長根據系主任的推荐指定的，在工作中直接受系主任的領導，而在日常事務工作中，受副系主任的領導。

系的秘書協助系主任處理系的日常行政事務工作，統計員專門管理系的登記統計工作與各種表册的塡寫。

系屬各教研室主任在系主任領導下領導各該教研室的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系」的工作採取個人負責制（其他部門的工作都是如此），在組織領導上就是單一負責制，或者說，系主任實行統一集中的領導。這種制度的優點：分工明確，責任專一，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有人負責，不能隱蔽，易於改正。

爲了發揮學工人員積極性與創造性，爲了聽取羣衆意見，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諮議性質的機構：校委會和系委會。

除校委會和系委會外，中國人民大學各級領導同志還經常以各種方式徵求學員與工作人員對領導的意見。

校長除經常有計劃、有重點地深入各系檢查與指導工作外，並在每週規定一定時間接見各系主任，商討與解決各系所發生的個別問題。校長按需要召集系主任聯席會議，交流工作經驗，研討並解決有關各系的特定問題。每月終了時，各系向校長作一綜合性的工作報告。遇有重大問題各系可隨時向校長請示，請求解決。可見，各系主任和校長的聯系十分密切。

總之，中國人民大學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專責，同時我們又是依靠集體和組織的力量進行工作，辦好學校。應當指出：中國人民大學各系的共產黨、青年團、工會、學生會的組織，都是密切結合系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在保證教學計劃與任務的完成上，都起了很大作用。

（「人民教育」三卷二期）

（上接52頁）這些地方，大家的意見很難完全一致的。因爲語法並不是加法，減法。

（七）繆先生對第十節注五的改動不太合適。繆先生認爲（1）「碰瞎了眼睛」改成（2）「把眼睛碰瞎了」，「碰瞎了」就從「外動詞」變成「補足語」。這個說法有缺點。說（2）的「把」字是主要動詞（這個主要動詞單不能作謂語用），有點勉强。「碰瞎了」在（1）（2）都是「動詞＋補足語＋了」，不必給他起兩個名目。

繆先生寫他的意見的時候，才看了譯文的四分之一（那篇譯文是從一本書裏抽出來的，本身已經不够詳細）。現在看完了全章的譯文，我們的意見也許可以接近一點兒。

再論古代中朝關係

常元敬

我在「新建設」第四卷第二期寫的研究古代中朝關係的一個新證據，當時祇是偶然想到了，遂匆匆寫出來。最近重閱顧炎武日知錄，在卷三韓城條已有很詳細的論說。又方言「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貊。我前引陸元恪解貔爲遼東人謂之白羆，這也可作爲一種證據。顧氏引王符潛夫論所云「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集釋引雷學淇曰：「路史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此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我原來很懷疑其後韓西亦姓韓一語，究竟作何解釋，至此才算得到解決。檢古今地名大辭典云：「韓古國名，在今河北固安縣東南，漢之三韓即其后。」又北史「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云云。」所謂「亡人」，正是受了當時統治階級殘酷壓迫的人民。他們到了實在忍受不了的時候，才相率一批一批地向隣國「避役。」又今河北盧龍縣東爲後魏朝鮮縣故城。當時徙朝鮮民於此置縣。陽固演頤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於此可見朝鮮人民移居中國的一定很多。所以他們的土風民俗，服飾裝束，爲當時北土所習見。我們只要打開歷史，就隨時可以看到中朝人民在過去關係上是如何地親密。

杜佑通典「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胡渭禹貢錐指謂嵎夷旣略的嵎夷，即今朝鮮。殷改青州爲營州，遼東朝鮮皆在營州域內。故傳說中的箕子封於朝鮮，雖然未必十分可靠；然就服色尙白一點來說，朝鮮與殷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一二九號

馬恩列斯經典著作

哲學底貧困　馬克思著　何思敬譯　10,800

哥達綱領批判　馬克思著　何思敬、徐　冰合譯　6,000

法蘭西階級鬥爭　馬克思著　6,700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1,800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著　博　古校譯★2,100

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　恩格斯著　何思敬譯　2,500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修訂本）　恩格斯著　曹葆華、于光遠合譯　1,900

『自然辯證法』導言　恩格斯著　曹葆華、于光遠合譯　2,000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第四分册）——東方戰爭　恩格斯著　曹　汀譯　10,400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第五分册）——意大利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普奧戰爭　恩格斯著　曹　汀譯　8,400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列　寧著★3,200

國家與革命　列　寧著★3,000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　寧著★3,300

論民族自决權　列　寧著　1,800

論民族殖民地問題　列　寧著　張仲實譯　6,600

土地問題理論（上卷）　列　寧著　曹葆華校譯　7,200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列　寧著　曹葆華譯　8,200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列　寧著　17,000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　列　寧著　曹葆華譯　20,600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　列　寧著　6,000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列　寧著　5,300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列　寧著　曹葆華譯　19,200

論列寧主義基礎　斯大林著★2,300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斯大林著　1,700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斯大林著　曹葆華譯　5,500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　斯大林著　曹葆華、張　企譯　3,000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斯大林著　3,300

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斯大林著　曹葆華、毛岸青譯　1,600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斯大林著　李立三、曹葆華等譯　2,800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10,000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解放社編★6,200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　解放社編★8,600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　解放社編★10,200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解放社編★4,800

有★者是普及本的定價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90—127

新建設 月刊

第四卷·第四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劃為序）

千家駒　向　達　＊沈志遠　＊吳　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　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　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　弘　＊鄭　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為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